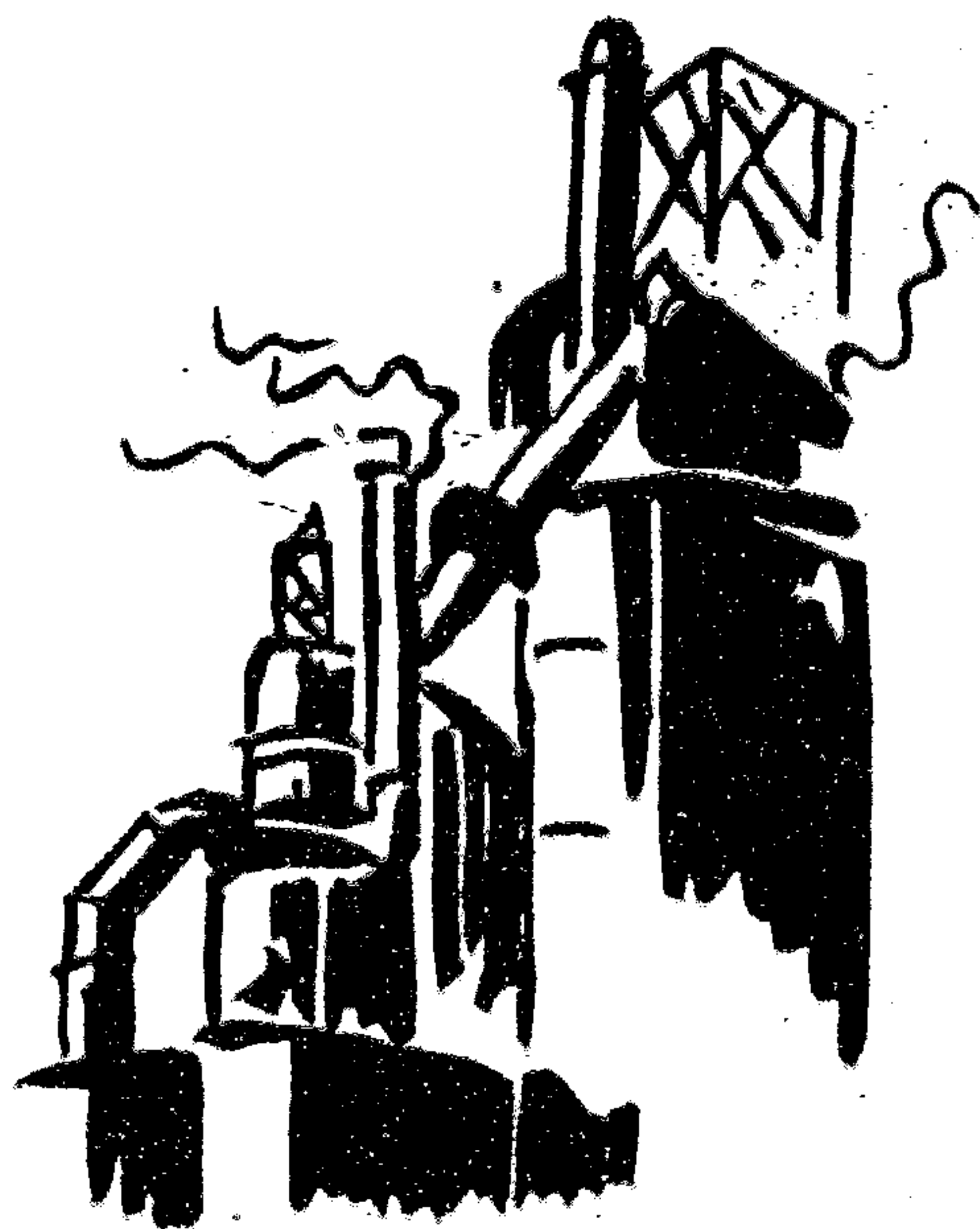


552.48

735

3

戰時蘇聯經濟



著基斯辛涅茲渥
譯賓 施

東北書店印行

譯者的話

渥茲涅辛斯基所著『蘇聯戰時經濟』一書，是根據了極其豐富的材料，加以科學地分析，從而找出社會主義經濟諸法則如何在戰時起其作用的，一部總結性的，提昇到理論水平的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論著。

作者於其引言中說：

『蘇聯戰時經濟的特點，即是在生產、分配方面有其特殊的經濟法則。蘇聯戰時經濟乃是政治經濟科學中的專門一章。社會主義的戰時經濟理論，乃是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創造出來的。』而本書即在於說明這些特殊法則，亦即對於斯大林社會主義戰時經濟理論之闡發。無怪乎該書出版後，獲得蘇聯經濟界的一致好評。

代瓦爾加主編的『世界政治與世界經濟』月刊而起的，蘇聯科學院經濟學系機關刊物『經濟問題』，於其第一期創刊號的批評與介紹欄中，首先以題為『論蘇聯戰時經濟法則的書』一文介紹了此書。該文評論道：

『渥茲涅辛斯基同志所著之書，乃是創造性地應用斯大林理論以全面研究戰時經濟諸特點的結果

。……在該書中，與分析戰時經濟同時，並研究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各基本問題，揭露了某些蘇聯經濟學家在資本主義戰時經濟問題上的錯誤。

許多新課題的深刻地理論探討，大量的新的實際材料之總結，經濟現象的嚴格地科學分析，以及所表現的布爾塞維克黨性，使得該書成了對馬克思——列寧經濟理論的寶貴貢獻。」

這就是對涅氏此書的權威評價。

X

X

X

鑒於此書之重要，故而得出以供研究者之參考。但因譯者對經濟學是門外漢，其中有若干有關工業技術的專門術語，尤為譯者所不熟習，故錯訛之處，恐所難免，尙望方家多多指正。

譯者

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五日

目錄

譯者的話	(一)
引言	(一)
衛國戰爭前夕	(六)
蘇聯戰時經濟的基礎	(一二)
國民經濟的改造	(一九)
擴大再生產	(二六)
戰爭過程中的經濟恢復工作	(三二)
國民經濟之平衡	(三八)
工業與軍工生產	(四五)
農業與糧食	(五三)
運輸與運輸組織	(六〇)
勞動組織與工資	(六五)
商品流通與物價	(七三)
預算、信用與貨幣	(七九)
生產的計劃性	(八五)
國民經濟底損失	(九五)
社會主義底經濟勝利	(一〇二)
戰後社會主義經濟	(一〇六)

引言

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的偉大的保衛祖國戰爭，根本改變了蘇聯國民經濟，改
勝利作戰，並創造了戰時特殊規律。在蘇聯歷史上，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底特殊時
期。它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底專門一章——衛國戰爭時期的政治經濟。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充分表現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族底民族利益之一致：社會主義
對抗法西斯主義，蘇維埃人民對抗為納粹主義毒化了的德國人。同法西斯德國作戰，成了蘇聯各族人
民保衛其民族生存，保衛祖國，保衛社會主義的神聖戰爭。

舉世驚佩的，蘇聯各民族在衛國戰爭中的偉大團結，是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底勝利和在蘇聯已消
滅了剝削階級這一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在衛國戰爭開始以前很久，寄生階級和寄生者羣即已自蘇維埃
社會被連根拔除，這就建立了蘇聯人民精神、政治統一之鞏固基礎。

法西斯德國選擇了掠奪戰爭作為實現其帝國主義目的之方法，這一目的就是佔領別國土地，侵略
他國，摧毀社會主義國家，變愛好自由的各民族為德帝國主義「紳士」底奴隸。因此就無怪乎，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族在同德帝國主義作戰中，其民族利益是一致的了。

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第二次危機而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乃是建築在現代壟斷資本
主義基礎上的世界經濟、政治力量發展的必然結果。」（斯大林語）各主要法西斯國家——德、意、
日，為了壟斷資本主義國家集團的利益，曾企圖以武力改變資本主義世界內部情況，使之有利於自



已。

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集團與法西斯國家集團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蘇聯抵抗背信進攻的希特勒德國的衛國戰爭發生了歷史的偶合。爲着粉碎法西斯國家的武裝力量，在戰火中組成了蘇、美、英反法西斯聯盟。

參加這一聯盟者，各自持有不同的戰爭目的。蘇聯認爲，戰爭的基本任務是摧毀德、日帝國主義，消滅法西斯主義，恢復與發展歐洲民主秩序。美國和英國則認爲，戰爭的基本目的是自世界市場上排除德、日兩競爭者，確立美國壟斷資本家的統治地位。雖然如此，但對抗德、日戰爭中的各盟邦，仍是相處於一個聯合陣營之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尖銳地表現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營壘中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集團與法西斯國家集團間的各種矛盾。這些矛盾乃是社會主義國家底特別後備軍，利用這些矛盾以對於粉碎希特勒德國，然後又利用這些矛盾以對於擊敗日本帝國主義，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勝利。

偉大的衛國戰爭，對於德帝國主義及其法西斯組織，對於實現於蘇聯的社會主義都是一種歷史的考驗。在殘酷的浴血戰鬥中，考驗了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生命力；這一考驗是以社會主義國家底政治、軍事、經濟勝利而結束的。

關於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無可避免的歷史搏鬥，列寧、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警告過社會主義祖國，蘇聯各民族人民對於這些搏鬥已作了準備。列寧和斯大林曾解釋說，戰勝了本國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所進行的戰爭，是爲了社會主義祖國的利益，是爲了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的，是正當的神聖的戰爭。

列寧的偉大戰友及列寧事業的繼承者斯大林教導我們說，保護與保衛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蘇聯，這是每個革命者的義務。只有無條件衛護蘇聯的人才是國際主義者，因為不衛護蘇聯，便不能解決世界革命工人運動問題。

列寧教導我們，一切革命的命運，直至今日都是由長期的多次的戰爭解決的，連內戰一起，我們僅只結束了戰爭的第一階段，但必須準備戰爭的第二階段。蘇聯與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必然伴隨着許多大衝突。只要資本主義包圍仍然存在，帝國主義國家進攻社會主義國家的危險也就存在。

一九四一年的反蘇戰爭，是最富掠奪性的帝國主義國家——希特勒德國掀起的。在衛國戰爭之初，斯大林即以反對德帝國主義的神聖解放戰爭綱領武裝了蘇聯人民。斯大林同志說：「德國現在正進行着，非正義的，旨在侵佔他國領土與奴役其他民族的侵略戰爭，因此，一切誠實的人應當奮起反對敵人，反對德國侵略者。」

與希特勒德國相反，蘇聯及其盟國正進行着正義的，旨在把歐洲被奴役各民族及蘇聯自希特勒暴政下解放出來的解放戰爭。因此，一切誠實的人應當支援解放軍，支援蘇軍，英軍及其他盟國軍隊。

斯大林號召蘇聯軍隊和人民摧毀德侵略者底軍事力量，驅逐那些爲奴役我國而竄入我國國土的德佔領者，把蘇聯土地和人民從德國法西斯枷鎖下解放出來，而後在其本土打死這條法西斯野獸。

根據斯大林同志的這些指示，蘇維埃軍隊和蘇聯武裝人民在布爾塞維克共產黨領導下爲每寸蘇維埃土地，每座城市，每個鄉村都進行了戰鬥，表現了偉大的英勇與堅定。

在衛國戰爭初期，當蘇軍部隊被迫撤退時，鐵路員工運走了可以移動的鐵路器材；工人，工程師，技師，搬走了裝備，並將它們運到東方；集體農莊莊員趕走了牲畜，把穀物運到後方地區去。

4
在衛國戰爭期間，在敵佔區，建立了許多游擊隊和襲擊組，和敵軍部隊鬭爭，到處燃起了游擊戰爭的烽火，這個戰爭為德佔領者及其幫兇製造了難以忍受的條件。希特勒德國佔領區蘇聯人民的這一功勳，留下了大無畏的英雄主義與對祖國忠誠的永垂不朽的紀念。

在衛國戰爭時期，前後方團結成一個統一而不可摧毀的營盤，工農的聯盟，多民族的蘇聯各民族間之友誼都更加鞏固了。斯大林同志說，任何其他國家，若遭受到像我國這樣的損失，定會經不起考驗，定會坍台。蘇維埃制度證明了它的鞏固性，這一鞏固性是建立在經過戰鬭考驗的我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勝利，工農的聯盟與蘇聯各民族之統一上的。

工人階級、集體農民和蘇維埃知識份子堅定而勇敢地熬過了戰爭所引起的貧困，在保衛祖國戰爭時期，他們以英雄主義的勞動建立了強固的戰時經濟，保證了紅軍和紅海軍的頭等軍事裝備，糧食，各種用品與燃料。蘇聯人民以其優秀子女不斷補充紅軍，擴展了紅軍的勝利。蘇聯人民在世界面前表現了自己是人民英雄，人民戰士。

在衛國戰爭最艱難的時期，斯大林同志鼓舞了蘇聯人民及其武裝部隊走向鬭爭，走向勝利。對德國獸獸鬭爭的堅定與對於我們正義事業勝利的信心，由偉大的斯大林散播至全國，團結了人民和軍隊，把蘇聯變成了堅不可摧的堡壘。

斯大林同志，在將衛國戰爭初期的我國情況與內戰時期相比較時說，我國目前情況較二十三年前好多了。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及農業經濟集體化，使我國在工業、糧食和原料上豐富了好多倍。在內戰時期，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聯合起來壓迫我國。而在保衛祖國戰爭時期，蘇聯則有盟國同我們一起進行反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蘇聯有以先進技術裝備起來的挺身防衛我國獨立與自由的紅軍。蘇聯軍民的英勇鬭爭獲得了所有愛好自由各民族的贊佩、同情與支援。

吸取了庫圖佐夫和蘇沃洛夫的經驗，爲斯大林的統帥天才所照耀，而以現代軍事技術豐富起來的斯大林戰略戰術，在衛國戰爭中得到了發展。斯大林的勝利科學，火力與機動結合底新戰術，賦予蘇聯紅軍以消滅敵人的偉大力量。斯大林的勝利科學將永遠是無數後代人的智慧、英雄主義與高尚鼓舞之源泉。

在蘇聯戰時經濟史上曾有這樣一個時期，當時，大部分軍事工業在東遷途中。上萬的車床、鍛鏈、壓榨機和渦輪在搬運中，成千的工人、工程師和技師在移動中。這就是蘇聯生產力東遷的特殊時期。撤至東部的工業，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工人階級和技術知識分子以其英雄主義的努力重建起來了。在烏拉爾、伏爾加、西伯利亞，建立起了偉大衛國戰爭底強大生產基地。

斯大林同志於總結蘇聯戰時經濟之發展時說：「後方蘇維埃人民底獻身勞動，同紅軍的英勇作戰一樣，是人民在保衛祖國戰爭中的無與倫比的功勳，都要永垂青史。」經過國民經濟的戰時改造，生產力的轉移及其在東方的重建，蘇維埃國家在衛國戰爭時期獲得了與戰爭協調而迅速發展的戰時經濟。

蘇聯戰時經濟的領導力量與指導力量，如同和平建設時期一樣，乃是列寧、斯大林底黨。人類社會史無前例的勝利之光榮與名譽是屬於布爾塞維克黨的。它的偉大的堅定性，領導戰時經濟的卓越才能，走向勝利的剛強意志，所有這些都保證了集中蘇聯各族人民一切力量予敵人以致滅性的打擊。

由此可知，衛國戰爭會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開闢了一個特殊時期，即戰時經濟時期。蘇聯戰時經濟的特點就是在生產、分配方面，有其特殊的經濟規律。蘇聯戰時經濟時期，應爲政治經濟科學底專門一章。社會主義戰時經濟理論是我黨領袖——偉大的斯大林同志創造出來的。

衛國戰爭前夕

衛國戰爭前夕蘇聯經濟的特點，即是社會主義在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勝利。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的集體化，已獲得了非常偉大的成就。蘇聯各族人民物質與文化生活，都迅速地上昇了。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已進入到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階段。

衛國戰爭前，在數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蘇聯生產力所已達到的發展水平，可由下列比較數字觀之。此即蘇聯國民收入（按不變價格計算）自一九二八年的二百五十億盧布，到一九三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五億盧布，到了一九三七年則增至九百六十億盧布，而到一九四〇年則已達一千二百八十億盧布了，也就是說在兩個半五年計劃期間，國民收入增至五倍多。

對蘇聯國民經濟的投資，一九二八年為三十七億盧布，一九三二年增至一百八十億盧布，而一九三七年則達三百億盧布，到一九四〇年幾乎達到四百三十億盧布。由於擴大再生產的結果，蘇聯社會主義企業的基金，（按一九四五年價格計算）一九二八年為一千四百億盧布，一九三二年則增至二千八百五十億盧布，一九三七年為五千六百四十億盧布，一九四〇年則為七千零九十億盧布，也就是說，已增為一九二八年之五倍（牲畜未折價算入）。

工業品總值（按不變價格計算）由一九二八年的二百一十四億盧布，增至一九三二年的四百三十億盧布，一九三七年增至九百五十五億盧布，一九四〇年則已增達一千三百八十五億盧布，即增達六倍半；同時，生產工具的生產則由八十五億盧布增至八百四十八億盧布，或說是增達十倍。國民消費

品的生產，則自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二十九億盧布增至一九四〇年的五百三十七億盧布，或說是增至四倍多。由於這些成就，蘇聯工業力量是空前增長了。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影響下，及由於社會主義在農村的勝利，蘇聯農業同樣是不斷上昇的。農產品總值（按不變價格算）一九二八年為一百五十億盧布，而到一九四〇年則增至二百三十億盧布。在同一時期內播種面積由一萬一千三百萬海克脫增至一萬五千萬海克脫。穀物總產量由一九二八年的四十五億普特增至一九四〇年的七十三億普特。

與集體農莊莊員們私用牲畜之增殖同時，集體農莊的牲畜也特別快地增加起來了。各集體農莊的公共牲畜增長情況如下：馬，由一九二八年的三十萬匹，增至一九四〇年的一千四百五十萬匹。集體農莊的牛，一九二八年為三十萬頭，一九四〇年則增至二千零十萬頭。羊，一九二八年為五十萬隻，一九四〇年則增至四千一百九十萬隻。集體農莊的豬，一九二八年為十萬口，一九四〇年則增至八百二十萬口。

蘇聯土地上迅速鋪設了新的鐵路網。這一建設，提高了蘇聯過去某些落後地區人民之文化、物質生活水平。鐵路運輸的運輸量自一九二八年的九百三十億噸公里，增至一九四〇年的四千一百五十億噸公里，或說是幾乎增達四倍半。

蘇聯從事國民經濟工作的職工數量，自一九二八年的一千零八十八萬人，增至一九四〇年的三千一百二十萬人。隨着總人口，特別是從事國民經濟工作的工人數量之迅速增長，藉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零售商品流轉也更迅速的增長起來。在兩個半五年計劃期間，國營和合作社經營的零售商品流轉，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一十八億盧布增至一九四〇年的一千七百五十一億盧布。

在國家生產力增長的基礎上，社會主義國家底財政無比地鞏固了。蘇聯國家預算收入，自一九二

八年的七十三億盧布增至一九四〇年的一千八百億盧布。而同時，國家預算支出，在一九二八年爲七十三億盧布，到一九四〇年僅增爲一千七百四十億盧布。衛國戰爭爆發前，當時蘇聯國家預算收入是超過當時的支出的。雖然生產和商品流通都增加了，但於戰爭前夕，流通貨幣却顯著縮減了，這是由於商品流通異常迅速，因而貨幣流通也異常迅速之故。蘇聯貨幣，由於實現了其作爲控制生產進程及分配社會產品的手段之機能，而提高了城鄉勞動者對於提高勞動生產率與增加自己的貨幣收入之關懷。

蘇聯人口也迅速地增加了，這就爲生產力的提高與蘇軍戰士、幹部的擴充創造了人力後備。城市人口增長得特別迅速，一九二六年城市人口僅爲二千六百萬，而一九四〇年，則已增至六千一百萬了。鄉村人口，在同一時期由一萬萬二千一百萬增至一萬萬三千二百萬。因此，在與鄉村人口同時增長的情況下，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之比例却由一九二六年的百分之十八增爲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二，這也反映了於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許多地區國民經濟繼續工業化的過程。

蘇聯第三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有三年半是在和平經濟時期（只能是相對的和平時期，因爲即在當時也會有些小戰事）進行的，其餘一年半，則已是衛國戰爭時期的戰時經濟年份了。在這三年半的和平經濟期間，蘇聯第三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完成得很好。衛國戰爭前夕，即迨一九四一年中期，工業產品總量已達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預定於一九四二年完成之生產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六，而生產工具之出產則達百分之九十，消費品生產達百分之八十。一九四〇年穀物總產量已達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預定於一九四二年完成之生產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鐵路運輸的運輸量，在一九四一年前半年已達百分之九十，而零售商品流通則達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預定於一九四二年所要達到之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二。蘇聯從事國民經濟建設的職工數量，於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已達第三個五年計劃預定於一九四二年所要達到之數量的百分之九十八，職工工資基金則達該預定水平的百分之九十六。

由此可知，衛國戰爭前所已達到的生產、運輸、商品流通以及國民收入的水平，是能無條件地保證完成聯共黨（布）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三八——一九四二年）的。只有現在，才可以充分地評價斯大林五年計劃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命運之歷史意義。斯大林的天才會體現於其數個五年計劃上。蘇聯人民用自己的勞動，化斯大林計劃為巨大物質力量，摧毀了德帝國主義強盜。

資本主義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情況，則完全異樣。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的特點，則是在週期的經濟危機中盲目的爬行。這一危機的增長是極端不平衡的。市場問題與殖民地問題，成為資本主義各國日益尖銳的問題了。法西斯各國瘋狂地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盡力儲備戰略原料，力求使其經濟轉入戰時軌道。

一九三〇年，德國工業生產，曾降低到一九二九年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八，一九三一年則降低到百分之七十二，一九三二年更降低到這一水平的百分之五十八。隨着德國法西斯的登台執政，德工業開始改為軍事生產，這就刺激了全部工業生產的活躍和上昇。一九三三年德工業生產上昇到一九二九年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五，一九三四年，上昇到這一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三，一九三五年上昇到百分之九十五，一九三六年上昇到百分之一百零六，一九三七年上昇到百分之一百一十六，而到一九三八年，受着軍事定貨之鼓舞的工業生產，甚至上昇至一九二九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由此可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前很久，德國即以增加軍事定貨的方法助長着工業生產的上昇。而各資本主義國家爭奪戰略原料出產地的鬭爭，也日益尖銳起來。因為沒有這種原料的儲存與後備，進行現代戰爭是不可想像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十年間，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生產水平的變動，則帶有另外的特點。由於經濟

危機，美國工業生產，於一九三〇年降低到一九二九年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三，一九三一，降到百分之六十八，一九三二年甚至降到百分之五十三。自一九三三年，美國工業生產才開始有些活躍，而達到了一九二九年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三，一九三四年達到了百分之六十八，一九三五年達到了百分之七十九，一九三六年達到了百分之九十四，僅只在一九三七年達到了百分之一百零三，即稍微高出於一九二九年的生產水平。可是到一九三八年，在週期經濟危機的打擊下，美國工業生產又下降到一九二九年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一了。由此可知，美國工業是處在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兩次危機之間的生產週期。美國的軍事生產水平仍是極低，不能夠作為提高整個工業生產水平之源泉。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以業已組成法西斯國家的德國壟斷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戰爭而開始的。德法西斯主義底『種族』理論，還在戰爭之初，便已證明是掩蓋其侵略性的，強盜式的帝國主義戰爭之烟幕。而當德法西斯主義進攻蘇聯時，就特別暴露了它的帝國主義掠奪性。反對各法西斯國家的世界戰爭則是解放戰爭。蘇聯保衛祖國的戰爭，賦與愛好自由各民族，首先是蘇聯各民族對抗法西斯各國的世界戰爭以反法西斯的解放戰爭的性質。

反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是正義的神聖的戰爭，因為德帝國主義盜匪的目的，是要消滅社會主義蘇聯，變蘇聯各民族為德國『紳士』的奴隸，建立奴隸主制度，以強盜方法取得糧食和石油，為德國壟斷資本主義『紳士』們獲取超額利潤。在法西斯黨魁的言論中，以及在德國經濟雜誌中所闡述的經濟計劃，是與其攫取東歐並變東歐為『大日耳曼帝國』的荒謬『理論』，是與其私有莊園和私有企業永遠連結在一起的。當然，這種『理論』是破產了。

日帝國主義對美國的挑釁進攻，則在太平洋掀起了戰爭，並使地球上大多數民族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漩渦。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兩個陣營終於形成了。這兩個陣營就是在戰爭中聯合對抗德、日

的民主國家陣營——蘇、美、英與法西斯國家陣營——德、意、日。

衆所週知，聯合對德、日作戰的各盟國，對於戰爭以及戰後和平建設各持有不同的目的。這種不同是由蘇聯的社會制度及其戰爭動力與美、英有原則上的差異而產生的。蘇聯的強大力量與世界愛好自由各民族給予它的支持，賦與聯合國陣營以解放性質。因此，與蘇聯共同對德作戰的美、英的軍事努力也成爲服務於解放戰爭事業的了。

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各國生產力之比較，表明民主各國聯盟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它們對於勝利作戰具有經濟上與技術上的優越後備與條件。這種優越性，從人口數量比較上也可看出：民主各國——蘇、美、英有三億七千二百萬人口，而法西斯諸國——德、日、意，只有一億八千六百萬。

在大資本與超等大資本壟斷統治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生產過渡到國家壟斷組織，使美國相當迅速地提高了軍工生產。根據美國的統計，美國軍工生產發展的速度如下：一九四二年軍械生產爲三百二十五億美元，一九四三年約爲六百億美元。各式飛機的製造，一九四二年爲四萬七千九百架，一九四三年爲八萬五千九百架。商船建造，一九四二年爲五百一十萬噸，一九四三年爲一千二百一十萬噸。新軍艦一九四二年爲八十五萬九千噸，一九四三年爲二百六十一萬噸。這些軍事機械均有助於粉碎德帝國主義。

一種不可征服的歷史力量保證我們粉碎與消滅了法西斯同盟諸國，這種歷史力量，首先是在反對德國法西斯的神聖戰爭中表現了前後方團結一致，工人階級和農民團結一致，國內各民族團結一致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其次，這種力量就是被希特勒帝國主義奴役的歐洲各民族的解放運動。再就是各民主國家聯合的可能性已經成熟，它們動用了自己的強大生產與人力後備。

但所有這些都只是勝利的條件，必須把它們變成實際的勝利。蘇維埃愛國主義和蘇聯人民消滅德

國法西斯主義的意志，蘇軍及其將領，指戰員所具有的非凡的戰鬥經驗，蘇軍最高統帥部底英明的戰略，戰術，把這些可以取勝的條件變成了對希特勒德國的真正勝利。

由此可知，蘇聯以其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所達到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之成功，創造了勝利保衛社會主義國家獨立的物質與精神、政治前提。各民主國家在反對希特勒德國及其衛星國的戰爭中之聯合，則是蘇聯政府外交政策的有歷史意義的勝利，它加速了法西斯國家集團的崩潰。

蘇聯戰時經濟的基礎

衛國戰爭要求蘇聯經濟立即轉入戰時軌道。遠在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之初，在聯共黨（布）、蘇聯政府的決議中，在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中，即已規定了將社會主義和平經濟轉為社會主義戰時經濟的計劃。

建立國家國防委員會，把國家蘇維埃執行機關，立法機關與黨的領導機關統一於這一委員會內，遂保證了動員一切國民經濟後備，以滿足偉大衛國戰爭需要這一工作的計劃性與行動之統一。

若把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革命前的俄羅斯戰時經濟與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的蘇聯戰時經濟作一比較，就可看出蘇聯戰時經濟的巨大優越性；這一優越性使蘇維埃國家，雖在暫時失去了很多工業與農業區的情況下，仍能保證前方的軍械裝備與糧食的供給。

蘇聯戰時經濟是建立在生產手段社會主義公有佔居統治地位的基礎上的。基本的生產手段集中於蘇維埃國家手中，這就保證了蘇聯國民經濟之迅速轉入戰時軌道。革命前的俄國，由於生產手段之私

有居於統治地位，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又低，再加上對外國資本之依賴性，因而就造成了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俄國進行戰爭的不可解決的困難。

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我國對外國資本的依賴性，根本改變了蘇聯居民的階級成分。如說一九一三年，革命前俄國的城鄉工人和職員，僅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弱，而一九三九年，蘇聯的城鄉職工已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八，即約近一半了。如衆所週知，在一九一七年社會主義革命前的俄國，是沒有集體農民，合作社手工業者的，而一九三九年，在蘇聯，這類人則佔總人口底百分之四十六，也就是說佔我國人口另外一半的絕對大多數。個體農民，未參加合作社的勞動者，手工業者，在一九一三年，佔俄國總人口底百分之六十五，而一九三九年，這類人只佔蘇聯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點六。

資產階級——地主，城市夫，小資產階級，商人，富農，在一九一三年，佔俄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十六。在蘇聯，還在祖國戰爭前很久，這些剝削階級——地主，城市資產階級，富農——即早已被消滅。與革命前俄國相比，蘇聯居民階級成分的這一變化，遂保證了蘇聯人民精神、政治的統一，保證了工人階級與農民的鞏固聯盟，並造成了偉大蘇聯各民族間牢不可破的友誼。

一九一三年的俄國，共有人口一億三千九百萬，其中城市居民二千五百萬，鄉村居民一億一千四百萬。俄國會是個農業佔優勢，而工業發展薄弱的國家。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許多城市與鄉村完全改變了它們的面貌。在幾乎是荒無人烟的地方，蘇維埃國家建設了三百六十四座新的城市——社會主義工業的強固基地。一九四〇年，蘇聯居民有一億九千三百萬，而城市人口則增爲一九一三年的二點四倍。

蘇聯社會主義企業的工業生產水平，無論是戰前或戰時，都無可比擬地高出於革命前俄國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的工業生產水平。一九一三年，俄國大工業生產總值爲一百一十億盧布，一九四〇年蘇聯

大工業生產總值則爲一千二百九十五億盧布。一九四三年，僅蘇聯東部地區工業產品，（按比較價格計算）即值八百三十億盧布，也就是說等於革命前俄國全國工業生產水平之七倍半。

一九四〇年蘇聯大工業總產量，爲一九一三年俄國工業生產水平之十一點七倍，而大工業中的機器製造業與金屬工業則爲一九一三年水平之四十一倍。上等輓金屬——軍械製造的基礎——的生產量則爲一九一三年水平之八十倍。而汽車、拖拉機、鋁、鎂、橡皮等，在革命前的俄國則完全沒有。

不受資本主義國家羈絆的蘇聯社會主義工業，與革命前的俄國工業不同，在衛國戰爭時期，儘管暫時失去了某些地區，它仍能依靠國內生產保證了戰時經濟一切必需的東西。到一九四三年，僅蘇聯東部地區的產品即比一九一五年整個俄國的產品還要多。如煤多二點三倍，鋼多二倍，黑色輓金屬多一點七倍，銅多四點一倍，鉛多五十九倍，鋅多十八點八倍。戰前蘇聯石油開採量，較革命前的俄國多三倍半。

社會主義社會底階級構成與其他社會底階級構成之原則上的不同，保證了蘇聯農業的大量生產，同時，商品穀物的主要部分又全集中於工、農國家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在革命前的俄國，穀物最高收穫量約四十九億普特。蘇聯在祖國戰爭前夕，穀物收穫總量則爲七十三億普特。此外，蘇聯在祖國戰爭前的商品穀物，較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國的商品穀物則幾乎加倍。

革命前俄國，商品穀物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二屬於地主，百分之五十屬於富農，僅有百分之二十八屬於基本農民大眾——中農和貧農。蘇聯戰前穀物商品，僅有約百分之十屬於國營蘇維埃農莊，而屬於集體農莊者，則幾達百分之九十。因此，在蘇聯，實際上，是全部商品穀物都在社會主義生產者手中。

在沙俄時代，三億六千七百萬海克脫耕地總數中，有八千餘萬海克脫爲富農佔有，有一億五千二百五十萬海克脫爲地主佔有。在蘇聯，戰前四億二千二百萬海克脫耕地中，有三億七千一百萬海克脫

屬於集體和個體勞動農民，有五千一百萬屬於國營蘇維埃農莊。所以，這就無怪乎千百萬蘇聯人民要如此英勇地爲保衛自己的土地、城市和鄉村而進行神聖的戰爭了。

若將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蘇聯戰時經濟，和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蘇俄戰時經濟作一比較，就可看出，在社會主義革命年份，蘇聯國民經濟是已經遠遠地前進了。生產力提高了，生產關係與階級變化了，社會主義知識份子幹部增加了。

一九一八年初，連被干涉軍與白匪暫時佔領的地區一起，蘇聯居民共爲一億四千二百六十萬。而在內戰時期，當干涉軍與白匪佔領地區最多時，即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蘇俄只有六千萬人口。但在衛國戰爭時期，縱當德軍佔領地區最多時，即一九四二年，蘇聯人口也不下一億三千萬，也就是說，比一九一八年增加了一倍多。

至於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蘇俄戰時經濟期間的工業生產水平，那簡直無法與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蘇聯戰時經濟期間之工業水平相比。一九四〇年蘇聯工業總產量爲一九二〇年蘇俄工業生產量之三十八倍，而機械製造業與五金工業生產甚至超達一九二〇年水平之五百一十二倍。

一九四三年，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僅蘇聯東方區工業生產總量即爲一九二〇年蘇俄全部工業產量之二十倍，其煤產則超達六十倍，銑鐵超達六十五倍，這就是說，在一九四三年，蘇聯東部地區的煤與銑鐵的生產較一九一八年整個蘇俄的生產還多。

一九四二年，亦即領土縮小得最多，因而也是在農業方面播種面積縮小得最多的時候，蘇聯穀物總收穫量仍比一九一九年整個蘇俄穀物收穫量多好幾倍。此外還應說明，蘇聯在祖國戰爭前，國家擁有大量穀物與糧食儲備，而這是一九一八年的蘇俄所沒有的。

社會主義生產在蘇聯工業總產量中之比重，由一九二三年的百分之七十六，增加到衛國戰爭前的

百分之百，在同時期，社會主義生產在農業總產量中的比重，則由百分之四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七，社會主義企業在零售商品流通中所佔比重，於同時期由百分之四十三增加到百分之百。所有這些，都意味着社會主義在城、鄉之完全勝利，並為蘇聯繼續提高其生產力創造了前提。

蘇聯國民經濟之工業發展基礎——熟練工人幹部的數量增長了。自一九二六年迄一九三九年蘇聯人口總數增加了百分之十六，而熟練工人幹部也增長了好幾倍：鑿工增至五點七倍，鋸工增至六點八倍，削截工增至十三倍，車床工增至十四倍，工具製造工增至十二點三倍，壓榨工和鑄工增至六點三倍，修械工人和電器修理工人增至六點四倍，機械工人增至九倍半，火車司機增至三點三倍，輪船司機增至三點二倍，汽車司機增至四十倍，拖拉機司機增至二百一十五倍。

蘇聯知識份子同樣增加了。於一九三九年（受過中等教育的熟練工人不計在內），蘇聯知識份子數達一千一百八十萬人。工程師由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九年期間，增達七點七倍，農學家增達五倍，農藝工作者增達八點八倍，科學工作者增達七倍，教師增達三倍半，文化教育工作者增達八點四倍，醫生增達二點三倍。蘇聯國民文化的提高與各具專長的城鄉幹部之增加，遂改造了紅軍底成分而保證了它在衛國戰爭中，獲得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

為說明衛國戰爭時期蘇聯戰時經濟的特點，還必須把蘇聯戰時經濟與平時期的經濟作一比較。蘇聯和平經濟時期的特點，是我國各地生產社會財富的社會主義再生產之全般擴大。蘇聯戰時經濟期間，也有其社會主義再生產之擴大，但只限於某些地區。蘇聯東方區域，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是以極大速度進行了。衛國戰爭時期，這一擴大再生產，首先保證了由於某些地區之暫時被德寇佔領，及其於佔領時所進行的破壞而造成的財富損失之補償。

蘇聯戰時經濟期間擴大再生產之特點，乃是改變了資本積累和私人消費的比率與規模，使之有利

於特殊的軍事需要。因此，大部社會產品會用之於軍工生產，但這種生產是不能直接再生產出國家的基本基金的。可是，如果沒有專門的軍用品，就不可能有國防，所以保證軍事需要又是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本身存在和發展的條件與前提。

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資本積累與消費間的對比也改變了，有一個時期——在戰時經濟初期，它們各自的絕對數量也都減少了。由於德寇佔領了許多工業區，一九四二年蘇聯社會產品總量比戰前一九四〇年減少了。雖然比重未變，但生產的消費之絕對數量，却減少了。國民私人消費基金也縮減了一些。雖然整個戰時經濟期間，資本積累一直繼續着，但資本積累的比重與數量則暫時降低了。

在蘇聯戰時經濟史上，一九四三年是發生了根本轉變的一年，其特點是蘇軍的巨大勝利，是具有擴大再生產之明顯特點的戰時經濟的鞏固與發展。與一九四二年相比，社會產品總量是大大地增加了。生產的消費增加了，國民收入增加了，勞動者的私人消費與儲蓄增加了，國民經濟的基本基金與周轉基金也都增加了。

一九四四年，在蘇軍完全肅清了境內德寇的這一年，蘇聯戰時經濟的擴大再生產過程，仍繼續有所增進。一九四三和四四年，軍費的增加，是與生產的消費，私人消費及資本積累的絕對增長同時並進的，而不是如一九四二年那樣，軍費的增加要依靠後者的絕對縮減。這就是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各階段擴大再生產的特點。

如同社會主義再生產法則不同於資本主義再生產法則一樣，蘇聯的戰時經濟，與資本主義各國的戰時經濟有着根本的原則上的區別。這只要將蘇聯戰時經濟與美國的戰時經濟作一比較就可明白。

第一、蘇聯的戰時經濟是建築在生產手段社會公有之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經濟。美國的戰時經濟則是資本主義經濟，而且是處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資本主義獨佔與財政資本佔統治地位的階段。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資本的繼續集聚與集中的基礎上，美國資本主義壟斷統治急劇加強了。那些天真幼稚的人們（往往是惡毒的撒謊者們）底關於美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說法，只是愚弄傻瓜的神話。這只須舉一件事實就足以駁倒了。這就是一九四四年，美國全部軍事定貨的百分之七十五，是由一百個大資本壟斷集團承辦的，而三十個超等壟斷資本集團則承受了全部軍事定貨的百分之四十九。它們就是美國戰時經濟的全權主人。

第三、蘇聯戰時經濟的動力，是有蘇聯人民的愛國主義與精神，政治之統一為依靠的社會主義國家。美國戰時經濟的動力，則是資本主義壟斷集團。對於它們說來，戰爭是最有利的買賣與奪取世界市場的方法。美國壟斷資本家們的利潤，由一九三九年的六十四億美元增為一九四三年的二百四十五億美元，而在四年戰爭期間，利潤達八百七十億美元。某些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們，關於「國家在資本主義各國戰時經濟中的決定作用」之論斷，是不值注意的胡說。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們」一天真地想，壟斷資本盜賊利用美國國家機關以獲取超額利潤，似乎就是國家在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證明。美國資產階級國家的特點，乃是國家機關，首先是其整個上層機關與壟斷資本及財政資本的主腦與代理人的結合。美國壟斷資本家的力量就在於他們能使美國國家機關為自己服務。那些關於美國戰時經濟由國家計劃的論斷竟是如此幼稚。美國資本主義壟斷集團向國家承受高利定貨，這並不是國民經濟的計劃性。在美國，那怕是極可憐的從事「計劃」經濟的企圖，只要它一超出便於壟斷家們獲取利潤的範圍，就會馬上遭受破產。

第三、蘇聯在其戰時經濟期間，由於軍費開支及許多地區被德寇暫時佔領，會有巨大耗費。資本主義美國則與此相反，它避免了週期性的戰前經濟危機，為壟斷資本家保證了空前未有的利潤與新的世界市場，而在戰爭中發財了。可是，戰時美國所達到的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水平，勞動生產率與生

產技術水平，却使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矛盾尖銳化起來，並為新的掃蕩性的經濟危機與長期失業遺下了基礎。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的不平衡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更加强了，且正製造着新的矛盾與衝突，使資本主義總危機更形尖銳化。所有這些都說明，正如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相反一樣，蘇聯戰時經濟的基礎與美國戰時經濟的基礎也是截然不同的。

由此可知，蘇聯戰時經濟的基礎，乃是生產手段之社會主義所有的統治，它保證了蘇聯國民經濟一切物質力量的集中，以便勝利進行保衛祖國戰爭。把國民經濟轉入戰時軌道，轉移生產力並將它們重建於東方地區，這就為蘇聯戰時經濟的全盤上昇作好了準備。

國民經濟的改造

蘇聯國民經濟的戰時改造計劃，在斯大林同志的歷次講演中，首先是在其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向人民所作之廣播演說，及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四週年紀念日的報告中，已被詳盡地規定了。

以斯大林同志為首的國防委員會，為了進行國民經濟的改造；曾採取了如下的措施：

第一、動員社會主義工業生產動力，動員工人、機械師，技術幹部服務於祖國戰爭。有些工業企業已轉為軍工生產。軍事生產由於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若干企業之轉交與它而加強了。為了抽出生產動力，工人與物資以應軍事經濟之需，有許多種民用生產被停止了。工業產品種類配比也起了根本的變化。五金工業中的特等帳金屬，石油工業中的汽油，化學工業中的特種化學品等生產之比重提高

了。而在食品工業與輕工業方面，則軍糧與軍用品的生產比重提高了。在原料與物資方面也進行了有利於軍事工業的重分配。五金、燃料、電力及其他原料物資的消耗標準也都有嚴格的規定，並被集中分配。工人技術幹部與基本基金都被遷移到我國東部地區；並在這些地區加速進行了新的生產動力的建設。改善生產過程的工作也廣泛開展起來，特別是掌握了馬丁爐上的特等鋼生產，巨大軋鐵機上的裝甲鋼板生產，鼓風爐上的含磷鐵和含錳鐵的生產等方法；此外在機械製造中，流轉式生產法也獲得了廣泛的發展。

第二、動員農業物資後備與集體農民勞動以保證蘇軍及為前綫生產軍械的城市之需要。把牲畜、農業機械、拖拉機等自德寇佔領區及臨近前綫地區轉移到東部地區，首先在烏拉爾、伏爾加、和西部西伯利亞擴大了穀物、洋芋和菜蔬播種面積。技術作物也移於東部地區種植。鞏固了集體農莊的勞動紀律，特別是增加了經集體農民製定的最低勞動日。改訂與提高了肉類與毛的徵收定額。並對軍用穀物、肉類進行了補充徵收。在各工業企業中組織了副業生產。職工私營菜園獲得了充分的發展。

第三、動員運輸力並予以戰時改造。採用了運輸順序表，以保證軍用快車儘先與儘速地通過。限制了客運，增加了集中計劃下的運輸量。烏拉爾鐵路和一些最重要的鐵路聯結點，如車里雅賓斯克、斯維爾德諾夫斯克、塔吉斯克、諾沃西比爾斯克、基洛夫等地的吞吐力都加強了。在我國東部和北部地區，沿伏爾加河建設了許多鐵路。沃爾庫金鐵路建築起來了。從南高加索至阿斯特拉汗的一條新鐵路也建設起來了。鐵路及水路運輸都實行了軍事管理。在交通運輸方面，採用了戰時紀律條例。

第四、動員工程幹部與建築機械以建造軍火工廠及其所屬各企業。把基本建設工作集中於軍事工業、黑色五金、發電廠、燃料工業、鐵路運輸等事業上，而首先還是集中於後方區域各遷移企業的恢

復工作上。建築標準會重行修訂，以便使之適合於戰時條件。有許多建築是暫時性的，只打算作較短期間的利用。因此建築期限縮短了，未完工的建築工程數量也減少了。

第五、動員勞動力，在工業生產中提高工人技術，培養新幹部，以代替應召參軍者。軍事工業及其所屬各企業工人於整個戰爭時期都被動員從事軍工生產。在各企業中都實行了義務加班勞動制。沒有從事生產的居民也都被吸收參加勞動。各工廠、工場所屬學校，工藝學校，鐵路學校的學生大批地畢業離校了。並直接在生產中培養新的工人幹部。但爲了培養技術幹部，高級學府與技術專科學校網仍舊保存。

第六、動員我國糧食儲備，以便不間斷地供應城市。國營零售商品的流通曾經重行組織。對居民的糧食與工業商品實行定量供應，在工業和運輸部門都組織了工人供給科。保持了日用必需品的，穩定的，較低的國定價格。保證了國民經濟主要部門之工人、技師、技術幹部的主要物品之供給。

第七、動員國民資財與國民經濟後備以供衛國戰爭之需。國家預算中的軍費比重增加了。會利用了發行紙幣的辦法，作爲戰時經濟底財政補充來源之一。

第八、改組國家機關，使能保證動員一切力量以應衛國戰爭之需。建立了新的各種軍事生產人民委員部，其中有坦克工業人民委員部和迫擊砲裝備人民委員部等。爲完成軍需定貨，國防委員會對此會實行了有效的監督。並改組了軍事經濟的計劃與供給系統。

蘇聯國民經濟中的所有這些戰時改造工作，都是在我們勝利底組織者——偉大的斯大林領導下，於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及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完成的。列寧——斯大林黨所創造與教育出來的重要經濟幹部與政治幹部，會保證了國民經濟中的這一戰時改造。（沒有這一改造，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獻身勞動以供應蘇軍的蘇聯人民，也就有了自己的，始終忠實於人民，忠實於黨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蘇聯國民經濟底這一戰時改造，可見之於各個戰時經濟計劃。衛國戰爭開始後一週，蘇聯政府即通過了第一個戰時計劃——一九四一年秋季『國民經濟動員計劃』。這一計劃乃是改造蘇聯國民經濟，和把社會主義經濟轉入戰時軌道的首批試驗步驟之一；它代替了衛國戰爭開始前政府所決定的，關於相對和平情況下的，一九四一年秋季國民經濟發展計劃。

在一九四一年秋季國民經濟動員計劃中，軍械生產計劃，較戰前規定者擴大了百分之二十六。基本建設的範圍縮小了。這一縮小，首先是由於在五金方面作了有利於軍工生產的再分配。在此次批准的各主要建設計劃中，有軍工企業，發電廠，燃料企業，五金，化學工業和鐵路建設。在這一計劃中規定，把基本建設工作與物資後備集中於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和西部西伯利亞地區，建設國防企業。在鐵路運輸方面，只有煤、石油產品、五金、穀物等仍保持戰前運輸規模，因為由於軍運的增加，要保證完成其他貨運計劃是不可能的。零售商品流轉計劃也降低了百分之十二，這是因為軍需使得市場商品減少了。預定作為秋季生產用的二萬二千架鐵機中，約一萬四千架讓與軍械、彈藥、及航空工業等部所屬各企業了。於是一九四一年第三季動員計劃，會使國民經濟轉變而為偉大的衛國戰爭服務。但經驗證明，這個轉變是不夠的。因為戰爭日益斷然而普遍地滲入了整個經濟。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六日，蘇聯政府通過了根據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而製定的，一九四一年第四季與一九四二年度，沿伏爾加流域，烏拉爾，西部西伯利亞，卡薩赫斯坦和中亞西亞各地區的『戰時經濟計劃』。該計劃規定，把工業遷移至蘇聯東部地區，並在這些地區，加強衛國戰爭所必需的軍工生產。蘇聯東部及後方地區的戰時經濟計劃確定組織並擴大步兵裝備與大砲的生產，其中包括高射砲，反坦克砲，團砲，師砲與坦克砲，迫擊砲，重砲，步槍，自動式衝鋒機關槍，坦克用與步兵用各種機槍，飛機用機槍與砲等。該計劃規定了蘇聯東方區域各種彈藥生產分佈計劃。並規定在東方組織新的

航空生產基地與發展已有的航空發動機與飛機之生產，其中包括衝擊機、驅逐機、轟炸機等。規定建立生產坦克用鋼甲、輕重坦克，和大砲曳引機的新基地。規定在後方組織小型軍艦——潛艇搜索艦，巡洋艦，魚雷艇等生產。戰時經濟計劃還規定了東方區域增加煤、石油、航空用汽油、汽車用汽油、生鐵、鋼、鑛金屬、銅、鋁、硫酸、阿摩尼亞硝、強烈性硝酸等的生產。

爲迅速發展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部西伯利亞、卡薩赫斯坦、中亞西亞等地區的軍工生產並予以物質保證，戰時經濟計劃規定把成百的機器製造企業，彈藥、軍械、坦克、飛機等生產企業，連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轉交與它的各種企業，建築遷移至東部地區。規定一九四一年第四季與一九四二年度在蘇聯東方地區修竣並開動發電量達一百三十八萬六千瓩時的發電機建設計劃，和將鍋爐及渦輪遷移至東方地區的計劃。並確定了於上述同一時期，在東方地區修竣並開動五座新鼓風爐，二十七座馬丁爐，和巨型鑛鐵機，五座焦炭爐和五十九個煤坑的計劃，同樣也規定了具有軍事意義的，其建設規模於一九四二年爲一百六十億盧布的，各種基本建設計劃。

爲加強鐵路運輸力與保證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部西伯利亞、卡薩赫斯坦，和中亞細亞各區的運輸量，戰時經濟計劃規定改建與擴大各主要鐵路聯結點，車站，綫路。爲便於遷移生產力，戰時經濟計劃對鐵路運輸提出了迅速發展東方鐵路運輸力的任務。

爲保證軍事經濟之需要，戰時經濟計劃又規定在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部西伯利亞、卡薩赫斯坦和中亞細亞各區增加國家資源後備，其中包括燃料、石油產品、五金、糧食與工業商品，其來源則依靠當前的生產和各種物資後備自蘇聯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的遷移。

在把生產力向東部地區轉移的工作中，在恢復與發展蘇聯東部後方地區的生產，特別是軍械生產上，這一戰時經濟計劃會起了巨大組織作用。把東遷各企業有組織地建設起來並立即開工，這就加速

了它們在新地區的恢復工作。因此，蘇聯東部地區一九四二年的軍械生產計劃，不僅得以完成，而且有許多是超過了。

衛國戰爭的頭半年（即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乃是蘇聯生產力進行偉大的東遷的半年，這一工作是由斯大林國家國防委會所領導的。當時千百萬人在流動着，成百的企業，成千的車床，碾鐵機，壓榨機，鍛鏈，渦輪，摩托，在遷移着。在一九四一年為時三月的期間內，東遷了一千三百六十個大企業，主要是軍工企業。其中遷至烏拉爾者四百五十五個，遷至西部西伯利亞者二百一十個，遷至中亞細亞和卡薩赫斯坦者二百五十個。雖然存在有許多戰時困難，但上述各地區的基本建設規模，仍自一九四一年前半年（即和平建設的半年）的三十一億盧布，增為下半年（即進入戰爭時期的半年）的五十一億盧布。

一九四二年的最後兩月，曾是蘇聯戰時經濟史上，首先是蘇聯工業史上最危機最困難的時期。因為在此期間，東遷之各企業，已經停止其在原地區的生產，而在後方新地區的生產又還未恢復起來。同時，由於若干地區被希特勒德國暫時佔領，蘇聯國民經濟也遭受了異常巨大的損失。

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被德寇佔領的蘇聯領土上，其居民於戰前佔蘇聯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左右，煤產佔戰前全部煤產量的百分之六十三，銑鐵佔百分之六十八，鋼佔百分之五十八，鋁佔百分之六十八；穀物出產佔戰前全部穀物出產的百分之三十八，糖佔百分之八十四；牛佔百分之三十八，豬佔百分之六十。在這些被希特勒德國暫時佔領區域內的鐵路之全長，佔蘇聯全部鐵路長度的百分之四十一。

迄一九四一年年底，蘇聯軍工生產所受損失之大，僅舉一例即可說明，此即自一九四一年八月到十一月這一期間，由於德寇的佔領和工業由接近前綫地區轉移至後方，曾有三百零三個生產軍火的企業

停工了。上述各企業每月產量計爲八百四十萬枚砲彈，二百七十萬枚地雷，二百萬枚炸彈，七百九十多萬個雷管，五百四十萬包燃燒器材，五百一十萬個砲彈殼，二百五十萬顆手榴彈，七千八百噸火藥，三千噸黃色炸藥，一萬六千一百噸阿摩尼亞硝。

由於戰爭損失和成百的企業遷移，自一九四一年六月到十一月，蘇聯工業產品總量減少了二點一倍。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蘇聯沒有從頓尼茲和莫斯科附近地區得到一噸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黑色軋金屬的生產（這是軍事工業的基礎）較一九四一年六月減少了三點一倍；有色軋金屬的生產（沒有這種生產，軍工生產同樣也是不可能的）在同時期則減少了四百三十倍；滾軸生產（沒有它，無論是飛機、坦克、大砲都無法生產）減少了二十一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斯大林同志底不屈不撓的意志，使得蘇聯人民堅定下來，而後轉入進攻並贏得勝利。

由於偉大的斯大林的獨出的才能，和聯共黨、蘇維埃政府、及工人階級之巨大努力，使我國軍事工業，還在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即不僅業已恢復了其失去的生產力，而且大大超過了它。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起，工業生產的低落即已停止，而自一九四二年三月，生產又重新迅速上昇。一九四二年三月，僅我國東部地區之軍工生產，即已達到衛國戰爭初期全蘇軍工生產的水平。

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當時，幾乎全世界都認爲，這是蘇維埃國家的末日了，但領導我國戰時經濟的斯大林同志，却在這時，提議製定與通過一個在烏拉爾與西伯利亞區建設新的黑色五金生產動力的巨大計劃，以作爲軍工生產之基礎。在斯大林領導的這一特點中，表現了偉大的堅定性和勝利的信心，但這是需要鍛鍊的，要獲得它，需要斯大林式的意志與英雄主義的勞動。

由此可知，蘇維埃經濟之社會主義性質及由此而產生的計劃性，會保證蘇聯國民經濟迅速地進行了戰時改造。將前綫與接近前綫地區之生產力轉移至蘇聯東部後方地區，這就使得德國佔領

者不能利用這些生產企業，而保證了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的，蘇聯戰時經濟之不斷鞏固與發展。

擴大再生產

由於東遷各工業企業之恢復，特別是由於我國東部地區許多新生產力之建設，在蘇聯人民英雄主義的勞動基礎上，軍工生產以及保證衛國戰爭之需要的一切戰時經濟部門都迅速成長起來。戰時生產與投資之不斷增長，這就是蘇聯戰時經濟期間高速度擴大再生產的證明。

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這首先就是意味着社會產品總量的增加，其次就是現有生產手段（即勞動工具與勞動對象）的擴大，再次就是工人階級與工資基金的增長，最後便是將一部分社會產品（利潤）用作社會主義資本積累與基本建設。

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擴大再生產法則仍舊完全有效，雖然這只是在有限的國土上。

當一九四一年底，生產低落已達頂點後，在一九四二年整個一年，蘇聯工業生產是逐月繼續上升的。自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十二月，蘇聯工業各部門產品總量增至一倍半以上。一九四三年，一切有決定性的工業部門，運輸以及戰時經濟所有部門的生產又重新增長了。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二年相比，工業產品總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七。如若回憶一下，第三個五年計劃於其和平時期的三年中，每年生產增長之平均速度僅為百分之十三的話，那就可以了解一九四三年工業生產增長速度之意義了。

衛國戰爭三年來（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蘇聯基本建設的規模，約值七百九十億盧

布（東遷之各企業裝備尙未計算在內）。在同一時期，在蘇聯領土上開工的新建與恢復的生產動力，總值七百七十億盧布。在東部各區新建開工之大企業爲二千二百五十個，在解放區修復之企業在六千個以上。開動了十萬架截鐵機，二十四座熔鐵爐，一百二十八座馬丁爐，四座鼓風爐，七十座電氣爐，五十六架軋鐵機，六十七座焦炭爐；已開工的各煤坑年產煤七千三百萬噸，已開工的發電廠，其動力爲三百四十萬基羅瓦特，新修之鐵路綫長達五千八百六十公里。

蘇聯東方各區生產力迅速發展起來了。在我國東方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基地，這是蘇維埃國家在配置生產力方面的既定政策。遠在一九四一年初，僅烏拉爾一地各發電廠之動力，即爲一九一四年大戰初期革命前整個俄國發電廠動力的一點二倍，一九四〇年僅蘇聯東部各區煤產即爲一九一三年革命前整個俄國煤產的一點七倍。一九四〇年蘇聯東部各區鋼產爲一九一三年全俄鋼產的一點四倍，而蘇聯東部各區的金加工業與化學工業的生產則比革命前整個俄國多好幾十倍。

到衛國戰爭之初，蘇聯東方各區工業發展所達到的高水平，已成爲戰時工業迅速發展之鞏固基礎。與恢復東遷各企業同時，蘇聯東部各區在廣闊的戰綫上展開了新建設，特別是五金工廠，發電廠，煤坑，和軍工工廠之建設。

對蘇聯東方各地區——烏拉爾，伏爾加，西伯利亞，卡薩赫斯坦，中亞細亞——恢復東遷企業與新建設之投資，在實行戰時經濟的四年內，僅集中投資即達三百六十六億盧布（按其預定價格數字計），或說是比戰前這些地區國民經濟投資每年平均數多百分之二十三。

在衛國戰爭的四年間，蘇聯東部各區新開工的煤坑生產力爲二千九百八十萬噸，渦輪動力爲一百八十六萬基羅瓦特，熔鐵爐生產力爲二百四十萬五千噸生鐵，馬丁爐生產力爲二百四十七萬四千噸鋼，軋床生產力爲一百二十二萬六千噸軋金屬。隨着蘇聯東方各區工業之增長，工人階級與城市居民

數量亦同時增加了。到一九四三年初，蘇聯東方各地區城市居民數目，已達二千零三十萬，而一九三九年初還僅為一千五百六十萬。

衛國戰爭改變了蘇聯生產力之配置。東部各經濟地區已成為前綫供給與戰時經濟之主要基地。一九四三年，伏爾加流域，烏拉爾，西部西伯利亞，外高加索與中亞細亞各地工業生產，曾增為一九四〇年的二點九倍，而它在蘇聯整個工業生產中的比例，亦提高了兩倍多。

戰時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建立了特等冶金工業，保證了軍事工業之需要。一九四三年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區的生鐵生產（折合成鍊鋼用之銑鐵），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鋼產（通通按普通鋼折合）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軋金屬生產（通通折成普通軋金屬）在同時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

現將戰時經濟期間蘇聯各經濟區域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之總結，分述如下：

伏爾加河流域 一九四二年沿伏爾加河各地區工業生產規模，總值一百二十億盧布，一九四三年，——一百三十五億，但一九四〇年，僅為三十九億。其在蘇聯全部工業中之比重，在此期間增達四倍。

在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二年初，遷至伏爾加區之工業企業約有二百所，其中在一九四一年恢復起來者有六十所，一九四二年一百二十三所，在衛國戰爭的四年間，對伏爾加區國民經濟之投資額達六十億盧布，用於國防建設與機器裝備之遷移費尚未計算在內。

伏爾加區工業機構，戰爭期間曾有根本改變。五金加工工業之增長特別顯著。一九四二年伏爾加區五金加工工業的總產量為八十九億盧布，一九四三年為一百零五億盧布，但在一九四〇年，還只是十二億盧布。在一九四二年伏爾加區所有工業中，五金加工工業之比重佔百分之七十四，而在一九四

○年則僅佔百分之三十一。伏爾加區，於戰時又出現了許多新的工業部門，如：飛機摩托、飛機、滾軸、汽車、海底電纜工業和機關車生產等，並建立了足以徹底解決伏爾加區燃料問題的瓦斯工業。

烏拉爾 在戰爭時期，烏拉爾基本上已變成了我國最強大的工業區。一九四二年烏拉爾工業總產量增至二百六十億盧布，一九四三年增至三百一十億盧布，但在一九四〇年尚不過九十二億，這就是說，其工業生產已增至三倍。烏拉爾在全蘇工業中之比重，於一九四三年增為一九四〇年的三點八倍。

遷至烏拉爾的企業共四百五十五所，其中有四百餘所至一九四二年底，即已恢復。在衛國戰爭的四年間，對烏拉爾國民經濟投資總數為一百六十三億盧布，或者說平均每年較戰前對烏拉爾國民經濟投資多百分之五十五。

如說一九四〇年烏拉爾機器製造業與五金加工工業生產總值為三十八億，那末在一九四二年，烏拉爾機器製造業與五金加工工業生產，則較前者多一百七十四億盧布，或者說是多四倍半。機器製造業在烏拉爾工業中所佔比例，一九四〇年為百分之四十二，一九四二年則為百分之六十六。

軍工生產部門乃是衛國戰爭時期烏拉爾機械製造業中之最重要的部門。在戰時經濟期間，烏拉爾的軍工生產，約佔全國軍工生產的百分之四十。戰時烏拉爾出現了許多新的工業部門，如坦克、汽車、摩托卡、滾軸、電器機械、唧筒、壓縮機、和車床製造等工業部門。

戰爭時期，烏拉爾與庫茲巴斯都變成了我國五金生產的主要基地。戰時烏拉爾冶金工業，已成為一切機器製造業部門的特等鋼產的主要基地。烏拉爾的冶金工業保證了坦克工業所需的鋼甲。烏拉爾鋼管生產獲得了廣泛發展，保證了有名的噴射彈的生產。

作為我國有色冶金工業基地，烏拉爾的作用增長了，一九四三年，烏拉爾和西部西伯利亞所生產的鋁和鎂，比一九四〇年全蘇生產還多。在烏拉爾新建立了有色五金加工工業，有色軋金屬工業和生產

硬性合金之工業，衛國戰爭時期，烏拉爾有色鑛金屬之生產，超過了戰前全蘇生產水平。

戰爭期間，烏拉爾燃料工業會有巨大增長。如果說一九四〇年所有烏拉爾產煤區的煤產總量為一千二百萬噸，那末在一九四二年此地煤產已達一千六百四十萬噸，而一九四三年，已為二千一百三十萬噸了。

戰爭期間，烏拉爾工業的電力基地大大鞏固了。一九四二年電力生產為九十億瓩時，一九四三年為一百零五億瓩時，而一九四〇年則僅為六十二億瓩時，足以減少烏拉爾煤炭赤字的中水水力發電廠建設也發展了。

西部西伯利亞 戰時西部西伯利亞區在蘇聯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亦大為增長。在一九四二年，其工業品之生產為八十七億盧布，一九四三年為一百一十億盧布，而一九四〇則僅為三十七億盧布，即增至三倍。西部西伯利亞在蘇聯全部工業中的比重，一九四三年已增為一九四〇年的三點四倍。

遷至西部西伯利亞區的企業約近二百一十所。在衛國戰爭的四年間，對西部西伯利亞國民經濟的投資數達五十九億盧布，即超過戰前投資水平百分之七十四。

一九四二年西部西伯利亞五金加工工業與機械製造業生產，曾增為一九四〇年的七點九倍，至一九四三年，則增達十一倍。戰時西部西伯利亞新建立的新工業部門有飛機、坦克、車床、拖拉機、摩托卡、滾軸、機械、電機生產等部門。

衛國戰爭時期，在西部西伯利亞會組織了特等金屬與合金的生產。有色冶金工業大為增長了，鋅的生產力提高了。新建立了鋁與錫的生產部門。

中亞細亞與卡薩赫斯坦 中亞細亞區與卡薩赫斯坦區戰時在蘇聯工業生產中的作用亦大為增加。一九四二年，在這些地區，各聯邦共和國的工業生產總值為五十七億盧布，一九四三年為六十六億盧

布，而一九四〇年則僅爲四十八億盧布。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初，遷至上述兩地區的企業有二百五十餘所，這些企業在短期內均被恢復起來。在衛國戰爭的四年間，用於基本建設之費用達六十七億盧布。

中亞細亞和卡薩赫斯坦的工業機構，於衛國戰爭期間，發生了基本改變。在五金加工業方面達到了巨大增長。其年產總值，於一九四二年爲十七億盧布，一九四三年爲二十三億盧布，但在一九四〇年僅爲六億盧布。

上述兩地區的燃料和冶金工業也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一九四二年煤產爲九百四十萬噸，一九四三年爲一千二百萬噸，但在一九四〇年則僅爲八百七十萬噸。此外，還建設了許多規模不大的冶金材料製造廠，建立了發展工業的基礎——黑色冶金業。

要恢復遷移至卡薩赫斯坦和中亞細亞各工業中心之企業，需要大大地發展電動力基礎。僅塔什干一地的電力系統，一九四二年的電力生產即爲七億二千八百萬瓩時，一九四三年則爲八億八千二百萬瓩時，而一九四〇年則僅爲二億一千萬瓩時。此外，中小水力發電廠也大批建設起來了。

在中亞細亞和卡薩赫斯坦各區，有色冶金工業大大地增長了，建立了許多新的有色冶金工業部門。戰時開動了新的，開採與發展鉛、鋅和銅的動力，增加了水銀的生產動力，水鉛工業亦獲得繼續發展。

外高加索 戰時經濟期間，不僅在蘇聯東部地區擴大了再生產，而在外高加索各加盟共和國，如格魯茲，阿塞爾拜然和阿爾明尼亞等共和國也是如此。這可由下列數字來證明：格魯茲的機器製造業與五金加工業產量，自一九四〇年的一億八千一百萬盧布增至一九四三年的四億七千七百萬盧布，阿塞爾拜然則自一九四〇年的四億二千八百萬增至一九四三年的五億五千五百萬盧布。

同樣也可以證明這點的是，在衛國戰爭的四年間，對格魯茲，阿塞爾拜然和阿爾明尼亞國民經濟

的投資共達二十七億盧布，結果，是外高加索各加盟共和國內的，許多新的機器製造業建立起來了，而許多大的黑色冶金企業也正在建設中，對石油工業的投資還正在增加着。蘇維埃巴庫不斷地供給了前方和蘇聯國民經濟以石油產品，並使空中地上成千上萬的摩托開動起來。

由此可知，蘇聯戰時經濟期間的特點，就是蘇聯東方各區社會主義再生產之迅速擴大。這表現在工人階級數量的增長，工業生產之擴大與保證蘇聯生產力發展的新投資之增加。

戰爭過程中的經濟恢復工作

如果說在蘇聯東方各區戰時所經歷的，是一個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的過程，那末在蘇聯西北，西部，中央，東南，南部各經濟區，在衛國戰爭過程中所經歷的，則是一個英雄主義的恢復過程，恢復被希特勒德國破壞的社會主義經濟。

這一恢復過程是在那些自德國佔領下解放出來的區域，在那些於粉碎敵人後，重新豎起了蘇維埃紅旗的區域內進行的。同樣在接近前綫的地區也進行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在那裏，由於敵人的轟炸和砲擊，部分企業被毀壞或遷至我國東部各區，但當西境戰綫向西方遠伸過去後，這些企業便又重新恢復起來。

衛國戰爭期間，解放區和接近前綫區國民經濟之恢復，乃是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功績。在蘇聯整個戰時經濟中，接近前綫地區與解放區生產之恢復與增長，對於保證前綫需要，首先是對於提高解放區居民底政治，物質水平上有着巨大意義。

爲着了解蘇聯人民在恢復被德佔領者破壞的經濟方面作了如何英勇的努力，我們可以對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各區被佔領後之蘇聯國民經濟狀況作一簡短的說明。

在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被希特勒德國暫時佔領之各區內，由於德佔領者對蘇維埃城市與工業的破壞，存留下來的工人僅僅爲戰前數目的百分之十七。工業企業於被佔領後，僅剩下戰前數量的百分之十三，或者說是減少了七點七倍，牲畜減少的數量如下：馬僅餘下戰前數目的百分之二十三，牛僅剩下百分之四十，山羊和綿羊剩下了百分之三十，豬僅剩下百分之十。解放後的被佔領區，拖拉機僅剩下百分之五十，複式收割機只剩下百分之五十八，而且這些拖拉機和複式收割機大多是被破壞了的。除開一些特別貴重的裝備和牲畜已被遷移至我國東部各區外，其餘一切均被德寇摧毀，盜劫與破壞無遺，部分有勞動力的居民被奴役並被驅赴德國。

同樣，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各被希特勒德國佔領之區域內，於蘇軍解放後，工人僅剩下戰前數目的百分之十七。工業企業僅剩下百分之十九，或者說是較戰前減少了五點三倍。牲畜減少數目如下：馬僅剩下百分之三十，牛剩下百分之四十三，山羊與綿羊剩下百分之二十六，豬僅剩下百分之十一，拖拉機與複式收割機庫被毀，拖拉機僅剩下百分之三十九，複式收割機僅剩下百分之四十。因之在這裏，除開被遷移至蘇聯東部地區的部分裝備與牲畜外，其餘一切也都被德寇掠奪盜劫一空，部分有勞動力的居民，被驅至希特勒德國作奴役。

在白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被希特勒德國暫時佔領各區，由於德佔領者對蘇維埃城市與工業所作之令人難以置信的破壞，工人僅剩下戰前數量的百分之六。工業企業減爲戰前數量的百分之十五，或者說是較戰前減少了六點八倍。牲畜之減少如下：馬匹剩下百分之三十九，牛剩下百分之三十一，山

羊與綿羊剩下百分之二十二，豬僅剩下戰前數目的百分之十二。拖拉機數目較戰前減少了十倍，複式收割機減少了二十倍。如同俄羅斯和烏克蘭一樣，這裏除開小部份財產被轉移外，其餘所有一切財產，均被德寇劫掠與毀滅，部分居民被殺死，餓死或被奴役。

根據上述材料，可知德寇在其佔領蘇聯某些地區的期間，曾野蠻地破壞了蘇維埃城市，虐殺了蘇聯居民，摧毀了蘇維埃工業、農業和文化。可是，德寇始終未能使被佔區經濟爲自己服務，尤其未能誘使蘇聯人民從事這一工作。爲了消滅這些野蠻摧殘之遺跡與恢復蘇軍解放各區、各城市的社會主義經濟與文化，需要蘇聯各族人民作巨大的努力。

德法西斯企圖利用蘇維埃被佔各區的『計劃』破產了。德寇連一個小作坊，一個農莊都沒有恢復起來，更不用說大工業了。這一任務，只有粉碎了德帝國主義強盜的蘇聯人民才能担負起來。蘇聯戰時經濟的經驗證明，在衛國戰爭進行過程中，恢復被佔領者破壞了的社會主義經濟，與恢復自接近前綫地區遷移出來的企業，是不可能的與必需的。蘇聯戰時經濟史上許多事實證明了這點。

莫斯科近郊產煤區的煤產恢復工作，乃是圖拉與莫斯科布爾塞維克生活中英雄的一頁，也是全體工人階級英雄的一頁，從各方面說來，它都是蘇聯其他各區的榜樣。莫斯科近郊產煤區曾被德寇全部佔領，鑛坑和住宅區均被破壞，一九四一年底，採煤已完全停止。可是，在一九四二年一年內，莫斯科近郊產煤區恢復了。煤產已達戰前水平，一九四三年並超過了這一水平。衛國戰爭前，這一產煤區一晝夜約產煤三萬五千噸；一九四二年正月，該區剛自德寇佔領下解放後不久，一晝夜僅產煤五百九十噸，一九四二年五月，煤產量已提高到二萬二千噸，而一九四二年十月，則已達三萬五千噸，達到了戰前水平。一九四三年莫斯科近郊產煤區的煤產量，超過一九四二年戰前水平百分之四十五。

一九四一年，莫斯科市的工業，大部遷移出去。二百一十餘所大企業全部遷走了。因此，這一九

四二年正月，莫斯科企業生產水平便急劇降低了。如果說一九四一年六月莫斯科工業總產量爲十九億三千萬盧布，那末，一九四二年正月，當莫斯科很多企業遷走後，莫斯科市工業總產量則降爲六億二千一百萬盧布，或者說是較戰前水平減少了三倍多。隨後由於各工業企業陸續重新遷回及恢復，遂使莫斯科工業又重新迅速上昇。一九四二年七月，莫斯科工業生產已爲九億四千五百萬盧布，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爲十三億零七百萬盧布，到一九四三年七月，爲十三億六千五百萬盧布，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爲十五億四千二百萬盧布，而到一九四四年底，莫斯科市工業總產量，在軍事生產增長的基礎上，已超過一九四〇年的水平。

長期處於敵人大砲射程內的列寧格勒，在工業方面表現了真正超等英雄主義的範例。雖然遷走了九十二個大企業，雖然受着長期的封鎖，轟炸與大砲轟擊，列寧格勒工人供給了前方大量軍工產品。一九四二年列寧格勒工業的總產量約爲十四億盧布，一九四三年爲二十五億盧布，而一九四四年，則已達三十六億盧布了。

頓巴斯許多產煤區，在衛國戰爭進行過程中曾恢復過兩次。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當時，頓巴斯各解放區域之煤產量，曾恢復到一晝夜出產三萬五千噸。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三年，在某些區域第二次被解放及頓巴斯區最後全部解放後，煤產量又重被恢復到三萬五千噸，到衛國戰爭末期，它已達到一晝夜生產九萬六千噸以上。

衛國戰爭期間頓巴斯煤區恢復工作之速度，遠超過內戰之後蘇維埃國家進行恢復工作之速度。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五年間頓巴斯煤產僅提高了四倍，要恢復到革命前的產量，需費時九年。但在衛國戰爭困難條件下，頓巴斯煤產在其恢復工作之第一年，即自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却已提高到七倍，而要恢復到戰前產量，大約需時五年。

衛國戰爭期間，在恢復重工業各企業與使重工業各企業開工方面，曾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在蘇聯各解放區域內，在自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間，修復了動力共達一百萬基羅瓦特的各發電廠，年產煤四千四百萬噸的大小煤坑計一千零四十七個，年產鐵二百七十萬噸的熔鐵爐十三座（要知道德寇在其佔領頓巴斯期間，連一座熔鐵爐也未能修復起來），年產鋼二百八十噸的鍊鋼爐七十座，年產軋金屬一百七十萬噸的軋鐵機二十八台。於是在受盡摧殘的頓巴斯上空，又昇起了冶金工廠的火焰。

各解放區裏的鐵路員工，在衛國戰爭兩年內（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修復並已通車之鐵路在四萬三千公里以上，計佔戰前蘇聯鐵路全長的百分之四十。鐵路員工的勞動大軍緊跟在蘇軍先頭部隊的後面鋪設鐵軌，恢復橋樑，把運輸綫路推移向前。

在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戰爭年份內，蘇聯對各解放區域國民經濟恢復工作之投資約一百七十億盧布，其中一九四四年為一百四十億盧布。為便於比較，我們可以回憶一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對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投資，那時平均每年投資約為一百億盧布。重新恢復自由勞動的各解放區的蘇聯人民，正是以如此的速度恢復了自己的生產力。

社會主義工業，在生產力迅速恢復的基礎上，在蘇聯各解放區重新建設起來了。如果說一九四三年，各解放區工業生產為二十七億盧布（按不變價格計），那末，一九四四年，則已達八十三億盧布，或者說是增達三點一倍。應當承認這一速度對於當時的我國也是特殊的；因為在這些年份內，我國正進行史無前例的軍事進攻。

在衛國戰爭期間曾表現了其生命力與鞏固性的，各解放區集體農莊之迅速恢復，也應認為是蘇聯人民底最大成就。在蘇聯各解放區內，各集體農莊於一九四四年春耕運動中，耕種了一千六百九十萬海克脫耕地。在恢復集體農莊經濟中有決定意義者是：

第一，拖拉機庫與機械拖拉機站之恢復，其數目，在各解放區由一九四三年初的三百九十四個增至一九四四年初的一千七百零二個，此外，於同一時期，在各個被完全解放的區域內，機器拖拉機站網已恢復到戰前水平。

第二，各集體農莊過去轉移至他地的牲畜大批趕回原地，僅在一九四三年，回到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各解放區域之集體農莊的牲畜計有七十四萬四千頭牛，八十一萬八千隻羊，五萬五千口豬，六萬五千匹馬和四十一萬七千隻家禽。

爲城鄉勞動者重建了許多住宅，這也應認爲是衛國戰爭進行過程中各解放區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一大成果。成千上萬的工人、集體農莊莊員和職員，從土房，窖洞搬進了新修復的住宅。蘇聯各解放區於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在鄉村修復與新建了八十三萬九千幢房屋，在城市則修建了共合一千二百七十七萬七千平方米面積的住宅區。在這些修復與新建的房舍中有五百四十一萬八千人移居進去。法西斯主義使被佔城鄉居民回復到有史以前的生活，毀壞了住宅，用恐怖的鞭笞把自由的人們重新趕進窖洞去，熄滅了電光，讓人們回到點松枝火的境地去，把城市破壞了，驅使我們的兄弟，姊妹們爲德國奴隸主作苦役。但隨着我國受難的土地之解放，蘇聯人民開始重新建起了自由人所應有的生存條件。

在蘇聯各解放區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中，蘇聯政府於一九四三年根據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而製定的，『關於各解放區恢復經濟緊急措施』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決議，起了偉大的組織作用。這乃是恢復自德法西斯枷鎖下解放出來的各州各邊疆區的，第一個廣泛的工作綱領。這一決議，於一九四三年，曾被勝利實現，並超過預定計劃，爲廣泛的恢復工作奠定了基礎。

在偉大的保衛祖國戰爭緊張搏鬥的時期，各解放區恢復工作的規模就是如此。蘇聯東部各州工

人，集體農莊莊員，知識分子，對自法西斯奴役下解放了的兄弟們，給予了自我犧牲的幫助。這只需舉出一九四四年，曾自東方各區移置約三萬五千件各種機器裝備到解放區，以恢復其工業、交通運輸與農業這一事實，就足說明。

由此可知，德佔領者在其侵佔之蘇聯各地區，既未能組織生產，也未能誘使被佔區的蘇聯人——那怕是一部份蘇聯人——站在自己方面。在保衛祖國戰爭期間，雖然蘇聯各族人民的主要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都用之於戰爭，但在各解放區，仍對被佔領者破壞了的國民經濟進行了英勇的恢復工作。對戰時蘇聯國民經濟之平衡，各解放區人民貢獻了自己一分英雄主義的勞動。

國民經濟之平衡

蘇聯戰時經濟底需要，是在有計劃的再分配生產力，以應衛國戰爭之需的基礎上，得到了保證的。生產力與物資基金之再分配，從一九四〇年（和平年份）蘇聯國民經濟平衡與一九四二及一九四三年（戰爭年份）蘇聯國民經濟平衡之比較上，亦可看出。

作為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之標幟的國民經濟平衡包括：

- 一、社會產品之生產與分配；
- 二、基本基金之生產與分配；
- 三、勞動力的平衡與分配；
- 四、國民收入的生產與分配；

五、國民貨幣收入與支出的平衡；

六、物資基金的平衡與分配；

蘇聯戰時經濟平衡，就是服務於衛國戰爭的國民經濟之平衡，而非其他。由於我國許多工業區之被敵佔領，使一九四二年的戰爭年份內蘇聯物資生產之全部社會產品，較一九四〇年和平年份之水平降低了。同時，社會產品之組成也有如下的改變：

一、一九四〇年和平年份與一九四二年戰爭年份，生產的消費水平都是百分之四十三；

二、國民私人消費自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三十八；

三、資本積累自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十一降到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二；

四、軍費支出（服軍職者之私人消費未計在內）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四，增至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十七。

因此，軍費的增加，遂使社會產品中用作資本積累與勞動者私人消費的部份減少了。一九四三年，在消費、資本積累與軍費數額均絕對增長的條件下，蘇聯社會產品總值較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三百二十億盧布。生產消費之比重仍保持一九四二年的水平，而私人消費則減少了一分用之於軍費，又減少了兩分用作資本積累。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由於很多地區被希特勒德國佔領，社會主義企業的基本基金減少了二千一百五十億盧布（按一九四五年價格計算），而在一九四二年差不多仍保持這一水平。一九四二年蘇聯東部各區基本基金的擴大再生產，只是補償了同一期間戰爭給予國民經濟的損失。然而在一九四三年，社會主義企業的基本基金，雖未達戰前水平，但却較一九四二年增長了六百三十億盧布。

隨着蘇聯部分國土之被希特勒德國佔領，一九四二年，適合勞動年齡的工人、職員、集體農莊莊

員、手藝工人數目亦較一九四〇年減少了。但到一九四三年，其數量則較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五百萬人。此外，在蘇聯從事生產的有勞動力的居民總數中，工人、職員與從事原料生產的合作社手工工人所佔比例，也自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四，增至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七。文化機關與行政機關的工人數目，在一九四二年較一九四〇年幾乎減少了一倍，而他們在蘇聯有勞動力的居民總數中所佔比例，則自百分之十二減至百分之十一。有勞動力的集體農莊莊員總數同樣也減少了，他們在從事生產的有勞動力的蘇聯居民總數中所佔比例，自百分之五十三點五，減至百分之五十二。

雖然在蘇聯有數的幾個地區（東方各區），一九四二年的國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三，但由於部分居民和生產動力的損失，一九四二年（戰爭年份），蘇聯國民收入，如同全部社會產品一樣，也較一九四〇年減少了。但一九四三與一九四二年相較，蘇聯國民收入則增加了百分之十三。此外，一九四二年國民收入組成有如下改變：

- 1、資本積累的比例由一九四〇年（和平年份）的百分之十九，降為一九四二年（戰爭年份）的百分之四；
- 2、消費所佔的比例，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七十四，減為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六十七；
- 3、軍費比例（服軍職者之私人消費尚未計算在內）則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七，增至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九。

社會產品與國民收入組成之變更，在蘇聯國民貨幣收入與支出平衡上也表現了出來。一九四二年國民貨幣收入較一九四〇年減少了。然而一九四三年即發生了轉變；與一九四二年相較，社會主義企業裏的國民貨幣收入增加了三百一十億盧布，其中工資增加了一百八十億盧布；從事農業的國民貨幣收入增加了八十億盧布，撫卹金、對多子女的母親之補助金和公債償付金等增加了四十四億盧布。

一九四二年國民貨幣支出同樣較戰前一九四〇年減少了。但一九四三年在這方面也有改變：即貨幣支出較去年增加了三百億盧布。因此，一九四二與一九四三年蘇聯國民貨幣收入與貨幣支出之對比幾乎未變。

戰時經濟期間，國民貨幣收入與支出之平衡，較之戰前時期，則有基本變化：如果說戰前一九四〇年，國民貨幣支出部分地超過了貨幣收入，即意味着國內貨幣流通的減縮，那末在戰時一九四二年則相反，由於零售商品流通的縮減，國民的貨幣收入超過了其貨幣支出，這就意味着流通中的貨幣增加了。這一變化反映在國民貨幣收入與支出之平衡上，也反映在國家預算上。

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在各種物資（電力、燃料、五金、機器裝備）平衡構成上，發生了更爲巨大的變化。蘇聯戰時經濟初期最大的問題，就是蘇聯東部各區急劇增長的生產力與顯然供應不足的電力供給基地之間的不平衡，因此便不得不限制若干國民經濟部門的電力消費，以利軍工、冶金和煤炭工業之生產。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特別是一九四三年，以增加發電廠動力與加強燃料生產的方法，在克服蘇聯東部各區工業需要與電力生產水平間不平衡現象之鬭爭中，獲得了巨大成功。一九四二年，在蘇聯東部各區曾開動了動力達六十七萬二千基羅瓦特的渦輪，一九四三年又開動了動力達七十六萬二千基羅瓦特的渦輪；其中在烏拉爾一九四二年開動了動力達四十四萬三千基羅瓦特的渦輪，一九四三年開動了動力達三十六萬八千基羅瓦特的渦輪。由於發電力的這一增長，使東方各區——其中也包括烏拉爾——的這一不相適應狀態，於一九四三年基本上被克服了。

燃料平衡問題也是蘇聯戰時經濟的相當尖銳的問題，這一問題之緊張程度是與工業與交通工具之東遷，莫斯科附近產煤區之被暫時佔領，頓巴斯——蘇聯主要產煤區之被希特勒德國較長期佔領與破

壞等事件聯繫着的。一九四二年對蘇聯國民經濟各種燃料的供給，較一九四〇年減少了兩倍以上；即自一萬八千八百噸減為九千二百噸。鐵路運煤距離由一九四〇年的六百九十四公里延長到一九四二年的八百五十七公里。所以爭取燃料，爭取煤的鬥爭，便獲得了特別重要的意義。一九四三年蘇聯燃料後備，較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二千二百萬噸適用燃料，一九四四年，又增加了二千五百萬噸，主要是增加煤產。由於鑛工——工人階級先進部隊之一——的英勇勞動，使蘇聯戰時經濟在燃料方面得到了保證。

戰時經濟期間，在煤炭分配方面也發生了基本變化。雖然煤炭消費的絕對數量減少了，但在煤炭消費總量中工業所消費的比例，仍為百分之五十三。在工業部門煤炭消費總量中，發電廠所佔比例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二，增為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九。在煤炭消費上，軍工機器製造業所佔比例，同樣也增大了。用於交通運輸的煤炭消費，在一九四〇年佔煤炭消費總量的百分之三十一，而一九四二年則增為百分之三十四。隨着蘇聯南部各焦炭化學工業區之被暫時佔領，焦炭工業在工業的煤炭消費總額中所佔比例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四降為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三，因此便大大減少了煤炭之消費。由此可知，在燃料總消費額中，鐵路運輸、發電廠和軍工機器製造業所佔之比重是增加了。

蘇聯戰時經濟期間物資基金之再分配，在五金平衡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現代戰爭是以五金進行的。五金——這就是坦克、飛機、大砲、彈藥。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為爭取五金而鬥爭也就是為爭取勝利而鬥爭。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當由於薩坡羅什與頓巴斯之被暫時佔領，戰時經濟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黑色冶金業動力的情況下，經濟領導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增加黑色冶金業的動力與將五金實行有利於軍事工業的再分配。

為保證軍事工業之需要，曾要求將黑色鐵金屬生產根本改造，使之生產軍械生產所必需的特等鐵

金屬。因此，一九四二年，僅在蘇聯東部各區，特等鑛金屬的生產，即較一九四〇年全蘇生產（包括南方冶金工業在內）還多百分之六。一九四二年蘇聯東方各區砲彈材料與鋼甲的生產，爲一九四〇年蘇聯全境生產之一點八倍。一九四二年特等鑛金屬生產在全部鑛金屬生產中所佔比例，增至一九四〇年的二點六倍，而普通鑛金屬於同時期則縮減了二倍。建築用五金材料縮減尤多，一九四二年它在全部鑛金屬生產中所佔比例，較諸一九四〇年減少了二點五倍。戰時經濟期間，約有百分之九十一的黑色鑛金屬，是被用於生產目的的，其中直接用於軍事生產者（與之有關各企業尙未計在內），一九四二年約佔全部鑛金屬的百分之七十。

蘇聯戰時經濟會要求堅決節約五金，要求以不太缺乏的各種黑色與有色鑛金屬代替其所缺乏者。蘇聯戰時期間，曾掌握了大馬丁爐溶鍊裝甲鋼的方法，以代替二重過程鍊鋼法，這樣便使得裝甲鋼的儲備在戰爭的兩年半期間增加了三十五萬噸。以不含有鑛與水鉛或含有很少量的鑛與水鉛的代用鋼，代替砲類生產中所常用之鑛與水鉛高度合金的鋼，使我們可以每年節約三千餘噸鑛和六百餘噸鐵水鉛。穿甲彈的生產，不用鑛鋼合金而改用鉻鋼合金，使得在衛國戰爭兩年半期間，節約了七千噸鑛。衝鋒機槍彈殼生產，不用黃銅而改用合金，於衛國戰爭兩年半期間，保證節約了一千五百噸黃銅。步槍子彈部分地改用鐵製造，而不用合金，使得在衛國戰爭兩年半期間節約了一萬二千噸合金。由於飛機上的許多零件之改用代鋁木製造，使飛機的生產於衛國戰爭兩年半期間節約了三萬噸鋁板。

戰時經濟期間，軍事企業生產動力增加之最大來源，就是把機器裝備，特別是車床作了有利於軍械生產的再分配。機器裝備的大規模再分配之所以成爲可能，是因爲社會主義經濟之存在與消滅了生產手段之私人所有。蘇聯戰時經濟的這些特點，使蘇維埃國家能集中強大生產力，從事頭等軍械製造。如果說革命前俄國工業中只有七萬二千台鐵機，那末在蘇聯，一九四〇年則已有七十一萬台裝

置最完善而有高度生產力的截鐵機了。革命前俄國總共只有七千台壓榨機與鍛錘，而蘇聯於一九四〇年已有八萬台。社會主義工業這一機器裝備，於衛國戰爭期間，大部是用於軍械生產了。

在鑄造與鍛冶平衡方面，同樣也進行了大大有利於軍事工業的再分配。在戰前，很多機器製造業的最大缺陷，就是自己沒有發達的鑄造場，鍛冶場與壓榨場。在戰時經濟期間，由於蘇聯東部各區之發展，製造彈藥、坦克、飛機和大砲等用的鋼葉鋼板等問題，都被順利解決了。烏拉爾的鍊鋼能力於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間，由十九萬五千噸增至三十八萬九千噸；在同一時期，銑鐵生產力由五十五萬六千噸增到七十三萬三千噸，鍛冶與鑄造能力由九十五萬二千噸增至一百二十三萬四千噸。西伯利亞鍊鋼能力於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間，由三萬一千噸增至九萬九千噸，銑鐵生產力由十八萬二千噸增至二十九萬五千噸，鍛冶與鑄造力由二十五萬噸增至四十四萬四千噸。中亞細亞和卡薩赫斯坦，在同一時期，鍊鋼能力由六千噸增至二萬三千噸，銑鐵生產力由二萬九千噸增至十五萬噸，鍛冶與鑄造能力由五千五百噸增至一萬六千七百噸。熔煉、鍛冶與鑄造能力之增長，證明東方各區機器製造業之發展，證明各經濟區域內各企業合理合作之組織性。

戰時經濟期間，入口資材在蘇聯國民經濟平衡中，同樣也起了某些作用。蘇聯的對外貿易，保證國民經濟獲得了補充資源，使蘇維埃國家得以增加其再生產的速度。祖國戰爭期間，蘇聯之貨物入口，由一九四〇年的十四萬四千六百萬盧布，增至一九四二年的二十七萬五千六百萬盧布，而至一九四三年，則增至八十四萬六千萬盧布。在同一時期，蘇聯之出口貨物，則由一九四〇年之十四萬一千二百萬盧布，減至一九四二年的三萬九千九百萬盧布，而至一九四三年，則更減為三萬七千三百萬盧布。因此，戰時經濟期間，蘇聯對外貿易差額劇烈改變了：即入口幾乎增加了五倍，而出口則縮減了三倍多。

所增加之入口貨物（主要是原料與物資器材），係由對德、日戰爭中蘇聯盟邦租借而來。但若把自

盟邦租借之工業品數量與同一時期內蘇聯社會主義各企業所生產的工業品數量相較，那就顯示出戰時經濟期間，這些租借物資在蘇聯本國生產中所佔之比重，充其量也不過是百分之四左右。

國民經濟之有計劃地平衡，乃是蘇聯戰時經濟最突出的特點。這是計劃國民經濟中最複雜的一個階段，這是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方能達成的。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資本主義的美國只能對戰略物資之分配保證了極有限度的管制。但隨着戰時定貨的終結，這一戰時管制亦即告終了。

由此可知，戰時經濟期間蘇聯國民經濟平衡之突出特點，乃是對國民收入，社會產品，物資基金，勞動力等進行了有利於衛國戰爭的，有計劃的再分配。社會主義工業化勝利的結果，使得蘇聯戰時經濟在其受考驗的最嚴重的時期，保證了自己的獨立性。

工業與軍工生產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利用其生產力底全部威力，以頭等軍械武裝了蘇軍。雖然大量軍工企業遷移了，雖然許多高度發展的工業區，已經暫時不在蘇聯戰時經濟底平衡範圍以內了，但衛國戰爭期間，僅蘇聯東方各區和中央各區的軍工生產，即為一九四〇年蘇聯全國生產水平的兩倍半。

社會主義工業，這是蘇維埃人民可以引為自豪的。它是蘇聯工人階級與蘇維埃知識分子根據列寧、斯大林計劃創造起來的。這裏必須提到保證了蘇聯之獨立及其戰時經濟力量的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幾項基本總結。

第一，是工業高速度的成長。一九四〇年蘇聯各大工業生產手段的生產，增為革命前一九一三年的一十七倍，而消費品的生產，則增達七點六倍。與一九二〇年相較，一九四〇年生產手段的生產增至該年生產水平的九十一倍，消費品的生產，增至五十九倍。

第二，是建立了高度發展的生產手段的祖國工業，特別是機器製造與五金加工業。一九一三年，俄國生產手段的生產，僅佔全國工業生產的百分之三十三點六，而機器製造業與五金加工業則僅佔百分之八點九。革命前俄國工業，曾是依賴於工業發展的強大資本主義國家的，其機器裝備大部依賴於外國的輸入。俄羅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曾無法依靠祖國生產保證其軍隊的裝備。而蘇聯，遠在一九四〇年，生產手段的生產，在全部工業生產中所佔比重即為百分之六十一點二，機器製造業與五金加工業則為百分之三十六點三。蘇聯社會主義工業乃是不仰仗資本主義各國，而能完全保證國民經濟的機器裝備與蘇軍的軍械裝備的。

第三，是改變了工業的地理分佈與在蘇聯東方各區建立了新的工業基地。列寧和斯大林所製定的，蘇聯生產力的分佈計劃，改變了蘇維埃大地的經濟面貌。由於這一計劃的實現使得東方工業生產在衛國戰爭期間有高速度增長的可能。僅蘇聯東部各區工業產品總量，即由一九四〇年的三百九十四億盧布，增至一九四一年的四百八十一億盧布，一九四二年，增至七百四十九億盧布，一九四三年，增至八百五十六億盧布，一九四四年更增至九百一十二億盧布。

第四，是工業生產的技術革命。工業生產的電氣化與自動機械化，使社會主義工業，變成最先進的，最近代化的物資生產部門了。機器製造業與冶金業的頭頭技術裝備，保證了對蘇軍的最近代化與最完善的大砲，飛機，坦克的供給。

第五，是蘇聯工人階級的增長。蘇聯的工人階級已不是沒有生產手段的無產階級了。蘇聯工人階

級——蘇聯生產力的主人翁——在物質生活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提高了。蘇聯工人階級由無產階級變為生產手段的主人，遂使衛國戰爭時期，蘇聯工人的愛國主義具有不可摧毀的力量與堅定性。所有這些，就保證了蘇維埃國家在裝備蘇軍的軍械生產方面獲得偉大成績。

衛國戰爭期間，大部軍械裝備，都是在蘇聯東部各區生產的。烏拉爾的軍工生產，於一九四二年增至一九四〇年的五倍多，一九四三年增為六倍。西部西伯利亞各地區軍工生產，一九四二年增為一九四〇年的二十七倍，一九四三年，增至三十四倍。伏爾加流域各區軍工生產，一九四二年增為一九四〇年的九倍，而一九四三年，則增至十一倍。對於蘇聯領袖斯大林同志關於以先進軍械武裝蘇軍的號召，蘇維埃後方就是這樣響應的。

根據斯大林以先進的新式軍械裝備改裝蘇軍的計劃，改造了蘇聯的軍工生產。航空工業已能生產裝有大口徑機槍，航空砲和噴射彈的新式快速驅逐機，衝擊機和轟炸機。坦克工業已能生產新的（現已成為舉世皆知的）T34式中型坦克和斯大林式現代頭等重坦克。軍械工業則加速地大批出產了自動武器，迫擊砲和現代大砲，並掌握了噴射砲的生產。

衛國戰爭爆發時，蘇聯軍事工業尚在掌握新技術過程中，而大量出產現代化軍械的工作尚未組織就緒。衛國戰爭前，當希特勒德國反蘇威脅日益加劇時，蘇維埃政府作為預防步驟通過了一個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與一九四二年度關於軍需的『動員計劃』，其目的在於一旦發生戰爭即將工業實行戰時改造。該動員計劃製定了軍需生產方案，並確定了在法西斯侵略者一旦進攻蘇聯時，將工業，特別是機器製造業進行改造的方案。

蘇維埃政府採取了許多措施，使某些企業準備於戰爭爆發時，按照動員計劃改變其生產。為此目的，對某些企業會規定了下列任務，即研究利用現有裝備生產軍需品的技術改裝辦法，按照動員方案

準備軍需生產的器械與裝備，添置軍工生產所必需的物資與半製成品，以增加各企業之動員儲備。

還在衛國戰爭之初，這一動員計劃就已經變成了絕大多數與最重要的軍工部門開展其生產——即軍需品生產的行動任務。機器製造業、冶金工業和化學工業已開始加緊自和平生產轉入軍事生產。蘇聯一切工業部門根據衛國戰爭的需要進行了根本改造，保證了軍工生產的增長。依靠我國一切生產動力，軍事工業迅速地掌握了現代戰鬥機械的生產，並改變了生產底技術過程，使之走向大批生產飛機、坦克、武器、彈藥的流轉式生產。

為適應衛國戰爭需要，蘇聯工業曾在改變工業產品分類，建立新的生產合作社與全力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經由廣泛地以軍事生產代替和平生產的途徑實行了改造。因此，蘇維埃工業的構成，於衛國戰爭期間大大地改變了。軍事生產及與軍事企業有聯繫的各工業部門之比重增加了。所有機器製造業與五金加工工業在蘇聯工業生產中的比例，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六，增為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七，在此期間，輕工業與食品工業的比例則由百分之三十四，減為百分之二十。在黑色冶金業方面發生了更深刻的，有利於軍工生產的工業改建；黑色冶金業已經能出產多種新的費勞力較多的高度合金的鋼，以供軍械生產之用，並於衛國戰爭期間，將黑色五金軋金屬中的特等軋金屬增至二點六倍。

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戰時經濟最危急的時期，斯大林同志確定了新的冶金動力建設計劃，並堅決付諸實施。到一九四三年，烏拉爾和西部西伯利亞的五金生產，與戰前一九四〇年相較，在銑鐵方面（折成煉鋼用銑鐵）增長了一百六十萬噸，鋼（折成普通鋼算）增長了二百三十萬噸，軋金屬（折成普通軋金屬計算）增長了一百八十萬噸。一九四四年，蘇聯東方各區生產，與一九四〇年同一地區的生產相較，銑鐵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六，鋼增長了百分之四十四，軋金屬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二。

衛國戰爭時期，軍工生產所消耗的五金，異常地增加了。彈藥生產所費黑色五金，一九四〇年為

八十三萬噸，一九四二年爲一百八十三萬八千噸，一九四三年已爲二百四十三萬七千噸。雖然南方冶金業暫時已不在蘇聯戰時經濟平衡範圍以內，但一九四三年，供彈藥生產用的黑色五金，仍爲一九四〇年水平的三倍。在一九四三年，爲要給侵入蘇聯，位於蘇德戰場第一綫的每個德寇以迎頭痛擊，貧不得不費去蘇軍與蘇聯工人階級半噸以上的，用於彈藥生產的五金。

爲適應軍工生產而進行的機器製造業之改造，是靠取締與限制某些民用機器的生產而完成的。機器製造業底鑄鋼場與鑄鐵場會進行改造而生產砲彈體與地雷體。摩托卡的生產會改造爲生產步兵裝備，拖拉機生產則改造爲生產坦克，鐘表生產則改而生產砲彈炸藥。並重新檢查了各機器製造廠的生產分玉和各企業在鑄造、鍛冶和半製成品方面的生產合作。

化學工業同樣也改組了自己的企業以適應軍事生產的需要。氮氣工業會獲得了最大發展。氮與五金一樣，乃是現代戰爭的基礎。當作阿摩尼亞與氮酸用，氮乃是火藥和爆炸劑生產之不可或缺的材料。雖然頓巴斯及其發展的化學工業會暫時喪失，莫斯科與列寧格勒許多化學企業已經遷移，但一九四二年蘇聯東方各區則產生了二十五萬二千噸強性氮酸，一九四三年生產了三十四萬二千噸，而一九四〇年蘇聯全境之生產僅爲二十三萬二千噸。

軍械製造會大大影響了工業技術的發展。這只須舉出下列事實即是說明：航空工業會使新的電機製造部門，即能在高空視、聽、與進行活動的無線電設置勃然興起。坦克工業則將特等冶金術與改進鑄造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彈藥與軍械工業則創造了具有高速度與巨大爆炸力的新的噴射機械。

在殘酷的搏鬥中，蘇聯軍械裝備不斷地改進着，並遠遠地超過了自吹自擂的德軍之軍械裝備。希特勒軍事指揮部，滿想以其坦克與迫擊砲粉碎蘇軍，但它對於現代戰爭的主要打擊力量——野戰砲兵，顯然沒有足夠的估計。蘇軍在其裝備與利用砲兵作戰方面的優勢是很顯著的。而蘇軍在利用空

軍，特別是利用軍隊中有強大打擊力量的雷電般的衝擊機隊方面所達到的優勢，也是同樣顯著的。蘇聯的坦克，在質量方面，特別是在戰場中的機動能力，就是說在其打擊力量方面，是勝過德國坦克的。蘇聯軍械裝備之所以能够不僅在質量上而且在數量上勝過希特勒德軍，這乃是蘇聯工人階級艱苦勞動與蘇軍戰鬥成績的結果。一九四一年戰爭開始四個月後，斯大林同志曾指出蘇軍暫時失利的原因之一，即是坦克及某種程度上的空軍之不足。因此，必須於最短期間消滅德軍在這方面的優勢。衛國戰爭初期的這一艱巨任務，是被勝利完成了。

由於工人階級、聯共黨（布）和蘇維埃政府的英雄般的努力，斯大林同志的每日的親身領導，由於對軍工生產的精心地頑強的組織，於是戰鬥裝備的迅速增加，已成為蘇聯戰時經濟發展的規律了。在蘇軍與蘇聯人民領袖發出號召後不過一年的功夫，亦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飛機生產已增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三點三倍。而航空發動機——飛機製造業的基礎——之生產，則在同一時期增加尤為迅速，其產量增達五點四倍。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坦克生產，幾增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即經過一年）的兩倍，雖然由於遷移之故，哈爾科夫的坦克生產已經停頓了，斯大林格勒的坦克製造廠也停工了。但坦克內燃機之生產，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却增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四點六倍。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各種砲的生產，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一點八倍。機槍生產，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二點九倍。雖然圖拉生產步兵裝備的各大工廠已經遷移，但步槍生產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一二〇公厘口徑的大迫擊砲生產，幾乎是重新建立的，其產量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亦幾乎增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五倍。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陸軍砲彈之生產幾乎增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即一年前）的兩倍。空軍用砲

彈之生產在同時期，增至六點三倍。地雷生產增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三點三倍，其中一二〇公厘迫擊砲彈之生產，則增爲十六倍。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噴射彈之生產增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一點九倍。飛機用炸彈在此時期增至二點一倍。手榴彈的生產增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一點八倍。普通口徑的子彈與大口徑子彈之生產，增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一點八倍以上。

自那時起，軍工生產即繼續不斷地發展。若將保衛祖國戰爭時期蘇聯軍械生產的水平及速度，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國軍械生產水平及速度作一比較，（是項材料見A·A·馬尼科夫斯基所著『世界大戰時俄軍之軍事供應』一書）是極有意義的。

要想把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俄國軍械生產水平與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衛國戰爭時期蘇聯軍械生產水平作一比較，只要列舉幾項生產數字就夠了。例如在衛國戰爭時期，蘇聯大砲的生產，爲革命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俄國所有各公，私工廠生產的二十九倍。在同時期內，蘇聯迫擊砲之生產則爲革命前俄國的八十九倍。

衛國戰爭時期，蘇聯所有機槍的生產爲革命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俄國機槍生產的七十八倍，衛國戰爭時期，蘇聯步槍生產則爲革命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俄國步槍生產的六點四倍。

衛國戰爭時期，蘇聯各式砲彈生產爲革命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俄國各種砲彈生產的八點二倍，各種彈藥生產則爲其六點九倍。

除開武器與彈藥生產有如此的數量增長外，還必須指出，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衛國戰爭時期蘇聯軍事裝備較革命前，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俄國軍事裝備有着完全無法比擬的質的變化。比如噴射彈和噴射砲的生產，頭等重砲和高射砲的生產，現代化的最具威力的坦克，快速飛機與衝擊機，大迫擊砲，速射機槍，衝鋒機關槍，自動步槍等的生產，都是足以使蘇聯軍隊自豪

的，而這些都是革命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軍隊所沒有的。

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大戰時俄軍砲政總局領導者——A·A·馬尼科夫斯基，在其著作中，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俄國組織軍工生產的教訓，曾作了極有教益的說明。他寫道：『根據以上所引證的材料看來，毫無疑問，關於戰時準備彈藥的必要性，只是當事情已經很明顯時，人們才懂得。我們的主要過失與不幸，就在於我們認為，僅僅依靠平時準備好的武器彈藥儲備就可以進行現代戰爭；從而便對於發展公、私工廠，不給予應有的關心，不擬定技術（工廠）動員計劃。結果，使我們不得不於戰時採取許多匆忙而寡效的臨渴掘井的措施。』

應當承認，由革命前俄國私有制度本身以及工業的落後性所造成的這一重大錯誤，蘇維埃國家在衛國戰爭時期，是完全避免了的。遠在戰前，蘇聯即建立了軍事工業，其中航空工業，坦克工業，造船工業，軍械裝備與彈藥工業等都是各自分工的，都有專門的製造廠。在此基礎上，蘇聯軍事工業的動力於衛國戰爭期間又增加了。唯其如此，所以雖然戰爭初期，曾損失了祖國戰爭前軍械儲備的大部份，但蘇軍最高統帥部仍能保證前綫的軍械供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等國用了一百二十七個師對抗俄國，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羅馬尼亞，芬蘭，意大利和匈牙利，則用了二百五十七個師在東綫對付蘇聯，（其中德軍為二百零七個師）即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之二點四倍。可是這些德國師及其僱傭師都被蘇軍粉碎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整個時期內，沙俄軍隊僅獲得了五千五百六十萬噸砲彈與各種口徑迫擊砲彈。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蘇軍則由社會主義工業獲得了七萬七千五百六十萬噸砲彈與迫擊砲彈，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沙俄軍隊所獲得砲彈與迫擊砲彈的十四倍。這一五金與砲火的海洋，就包藏着蘇

維埃人民的憤怒及其戰勝希特勒帝國主義強盜的不可摧毀的鬪爭力量。

由於工人階級與蘇聯社會主義工業的英勇奮鬥，蘇軍獲得了頭等戰鬪裝備。迄反對希特勒德國的祖國戰爭結束時，蘇軍數量較平時大為增加了，步兵和騎兵師增為平時之四倍，砲兵增為五倍，坦克增為十五倍，飛機增為五倍。

蘇軍的進攻力量，於一九四五年四月柏林之戰這一最後戰役中，曾充分地發揮了。參加此最後一役的，有四萬一千尊大砲和迫擊砲及自空中配合砲兵打擊敵人的八千四百架飛機，有六千三百餘輛作突破用的現代化坦克。

所有這些制勝的武器，都是由蘇聯人民之手及其智力與勞動創造的。蘇軍之摧毀希特勒德國，是用蘇維埃祖國的武器與祖國的軍事裝備實現的。

由此可知，衛國戰爭期間，蘇軍是以祖國工業所生產的頭等軍械裝備起來的。而軍工生產之所以能够增長並能充分供給蘇軍以軍械，其保證，就是蘇聯於戰前建立的鞏固的工業基礎與戰時經濟期間軍事工業的強大發展。

農業與糧食

如果說蘇聯工業供給了蘇軍以戰鬪裝備，那末農業則保證了前後方糧食與工業原料的供給。糧食問題，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帝俄戰時經濟期間，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蘇俄戰時經濟期間與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現代祖國戰爭中蘇聯戰時經濟期間，是在各自完全不同的基礎上解決的。

蘇聯糧食生產的社會機構已較革命前有了根本的改變。革命前，商品穀物的百分之七十二是集中在地主和富農之手。而在蘇聯，如衆所周知，商品穀物的生產，基本上是集中於社會主義企業——國家農莊和集體農莊手中。

在商品穀物生產水平上，三個時期的區別尤爲巨大。穀物的徵收與購買，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革命前的俄國，只能徵、購到十三萬九千九百萬普特，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在蘇俄初期只能徵、購到九萬二千普特，而在蘇聯，在一九四一——一九四四年，雖然蘇聯最富的穀倉——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已被德軍佔領，但其穀物的徵、購仍達四十二萬六千四百萬普特。農產物商品產量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增長，只因爲它是建立在社會主義農業之大規模機械化的基礎上。

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曾特別嚴重地影響了俄國農業。穀物播種面積，由一九一三年的九千四百萬海克脫，減爲一九一七年的八千五百萬海克脫，穀物的生產，在同一時期內則幾乎減少了十五億普特。

這第一次世界大戰初，在俄國全部穀物儲備中，來自烏克蘭者爲百分之二十五，來自北高加索者爲百分之十二點六，來自伏爾加流域者爲百分之十二。而來自西伯利亞、烏拉爾、卡薩赫斯坦各地者僅佔全部糧食儲備的百分之十八。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烏克蘭成了接近前綫地區，隨後又成了戰場的時候，俄國糧食情況就特別尖銳化了。

在內戰時期，正常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蘇俄會面臨着真正的糧食危機。但蘇維埃國家以其最大的努力預防了這一危機。如果說一九一七年，蘇俄徵糧僅爲七千三百四十萬普特，那末一九一八年，則已增至一萬萬零七百九十萬普特，一九一九年——二萬萬二千二百五十萬普特，一九二〇年——三萬萬六千七百萬普特。可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外國武裝干涉的結果，到一九二一年，各鄉村播種

面積與穀物收成又都銳減了。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戰時經濟期間，蘇聯對商品穀物的需要，曾無比地增長了。城市與軍隊對於糧食的需要增長了。而且糧產豐富的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又暫時失去了。但蘇聯仍然勝利地解決了糧食問題。衛國戰爭時期，蘇聯之所以能解決糧食問題：

第一、是由於集體農莊制度保證了商品穀物的高度生產率與穀物總收成的良好；

第二、是由於商品穀物的絕大部分集中於國家手中，由國家組織了正確的計算與分配；

第三、是由於我國穀物生產的新配置，增加了蘇聯東方各區的穀物生產。

蘇聯境內穀物產地配置方面的變化，可自下列與革命前一九一三年的比較材料中看出。烏克蘭在全國穀物總產量中的比重，由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五，減為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三；北高加索的比重則自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十二點六，減為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十點六，伏爾加流域的比重，在同一時期則保持着百分之十二的水平。烏拉爾在穀物生產中的比例，在同一時期，則由百分之八點四，增至百分之九點七；西伯利亞由百分之七，增至百分之十一點七，卡薩赫斯坦由百分之二點八增至百分之三點四。

由於社會主義農業的增長，蘇聯東方各區穀物生產，於一九四〇年已增為十八萬三千八百萬普特，而一九一三年革命前俄國東方各區的穀物生產，則僅為十萬零三千四百萬普特。這就是說，在蘇聯東方各區已建立起了強大的穀物基地，保證了衛國戰爭時期國家所需之穀物。

社會主義農業的勝利，保證了蘇聯於衛國戰爭開始時，擁有巨量的國家糧食儲備。這就造成了軍民糧食供應上的穩定性，而不怕因戰時困難與因某些區域之暫時被佔領，而引起戰時（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糧食徵收的減少。雖然一九四二年供消費的糧食較一九四〇年減少兩倍，但由於對糧食後

備的嚴格計算與分配，使蘇聯仍組織了對軍民經常不斷的糧食供給。

在我國受到偉大考驗的年份內，集體農莊農民保證了我國軍民的穀物與食糧供給。衛國戰爭，乃是集體農莊制度鞏固性的歷史考驗。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各集體農莊內社會主義勞動紀律鞏固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湧現了許多新的集體農莊知識份子幹部，他們代替了過去那些應召參加蘇軍的集體農莊幹部。在這一新舊幹部的更替中，蘇維埃婦女起了決定的作用。

下列數字，很清楚地說明了婦女在拖拉機師，複式收割機司機，機器拖拉機站的機師與隊員中，以及集體農莊領導幹部中所佔比重之增長。婦女在機器拖拉機站底拖拉機司機中所佔比重由一九四〇年初的百分之四，增至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五，在機器拖拉機站底複式收割機司機中所佔比重，由百分之六，增至百分之四十三，婦女在機器拖拉機站汽車司機中的比重，由百分之五，增至百分之三十六，婦女在機器拖拉機站拖拉機隊隊員中的比重，由百分之十一，增至百分之二十。

集體農莊的勞動紀律鞏固了。蘇維埃政府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曾建議各集體農莊提高每個有勞動力的男女集體農莊莊員一年內所必需完成的最低限度義務勞動日，並確定春耕、鋤草、侍弄莊稼及收割過程中必需完成的勞動日數量。每個有勞動力的集體農莊莊員所完成的勞動日總數，自一九四〇年的二百五十四日增為戰時一九四二年的三百五十二日。有許多不只是個別集體農莊，而且是整個整個的地區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即沒有任何一個有勞動力的集體農莊莊員是完不成他們規定的最低勞動目的。

同時，集體農莊的勞動生產率也提高了，這表現在集體農莊中每一家庭，每個有勞動力的集體農民及每具曳引力的平均播種面積之增長上面。戰爭時期，集體農莊中每戶平均播種面積，由一九四〇年的六點三海克脫增為一九四二年的七海克脫，而每個有勞動力的集體農民的平均播種面積，則由一

一九四〇年的三點三海克脫增爲一九四二年的四點三海克脫，集體農莊和機器拖拉機站的每具曳引力的播種面積則由七點三海克脫增至八點八海克脫。

可是勞動生產率與勞動紀律之增長，並不能完全彌補因農業機械基礎之削弱所招致之損失；這主要是在各解放區，由於拖拉機、複式收割機、農業機器和農用汽車之減少，使農業面臨嚴重困難。這些困難之克服，是以限制農村勞動力的動員，盡量提高現有機械與人力的生產力，恢復戰時經濟初期中止了的拖拉機與農業機器生產等方法進行的。

雖然農業機械基礎大大地削弱了，農村勞動力減少了，但蘇聯未被佔領各區——如中部地區，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伯利亞、外高加索、中央亞細亞、卡薩赫斯坦，遠東及北部地區——集體農莊總播種面積不僅未縮小，而且擴大了。上述各地區集體農莊播種面積由一九四〇年的六千二百六十萬海克脫增爲一九四二年的六千六百三十萬海克脫；其中穀物播種面積則由五千一百六十萬海克脫增至五千三百九十萬海克脫。可是東方各區播種面積的擴大，並不能補償因富庶的產糧區——烏克蘭和高加索之暫時被德寇佔領所造成的損失。

衛國戰爭初期蘇聯戰時經濟的特點及困難，要求繼續鞏固與發展穀物生產。一九四二年東方各區集體農莊之穀物播種面積，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了二百三十萬海克脫。如果說在中部及伏爾加河流域各區集體農莊中，穀物播種面積於一九四二年稍有縮減，那末在西伯利亞，中央亞細亞，卡薩赫斯坦，外高加索及遠東各區，穀物播種面積則大爲擴大了。擴大最速者爲遠東（擴大了百分之三十）和中央亞細亞（擴大了百分之二十。）而絕對數量增長最多者，則爲中央亞細亞，卡薩赫斯坦和西伯利亞。

在穀物播種面積中，秋季作物面積特別擴大了。這些作物的面積於一九四二年較一九四〇年擴大了百分之十八。秋季作物面積擴展最速者爲西伯利亞，（其面積於一九四二年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

分之六十四) 卡薩赫斯坦和中亞細亞。(其面積，一九四二較一九四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 秋季作物面積的擴大，使我們克服了那些戰時因勞動力、曳引力及機器不足而引起的困難。在各種穀物中，黍子的播種面積，於衛國戰爭時期，曾大為擴展了。黍子乃是伏爾加流域、卡薩赫斯坦以及較乾燥的西伯利亞地區的主要作物。黍子是一種耐旱而保險的作物，它於春耕和收割時，能減輕集體農莊勞動力與曳引力之緊張程度。

戰爭時期，蘇聯在其技術作物的分佈方面，也有了巨大的改變。榨油作物和糖蘿蔔的種植面積，在西伯利亞、卡薩赫斯坦和中央亞細亞各地區擴大了。技術作物的種植面積已向蘇聯東部各地區伸展過來了。技術作物擴展最速的是在遠東各地區(其播種面積於一九四二年較一九四一年擴大了百分之三十七)和西伯利亞(其播種面積於一九四二年較一九四一年擴大了百分之二十七)。衛國戰爭期間，在中部地區、伏爾加河流域、西伯利亞、中央亞細亞和卡薩赫斯坦各區糖蘿蔔的種植面積擴大了。但整個說來，一九四二年全蘇糖蘿蔔種植面積則較一九四〇年縮小了，這是由於種植糖蘿蔔各地區——烏克蘭、北高加索、庫爾斯克州和部分渥洛涅茲等地區暫時被敵佔領的緣故。

一九四二年，蘇聯東部各區集體農莊蔬菜與洋芋種植面積，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菜蔬與洋芋的種植亦推及東方各區，如烏拉爾、西伯利亞、中央亞細亞和卡薩赫斯坦。大城市與工業中心市郊區種植蔬菜與洋芋的比重增大了。蔬菜和洋芋種植面積擴展最速者為西伯利亞(其面積於一九四二年較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四)，烏拉爾(其面積於一九四二年較一九四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遠東(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中亞細亞和卡薩赫斯坦(增加百分之三十二)。

如衆所共見，在播種面積構成上變化最大者為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若說這些變化在中亞細亞，是帶着很大程度上的暫時性，那末在西伯利亞，就是較為固定的現象了。在西伯利亞所採取的一些措

施，如擴大小麥播種面積，恢復休耕田，擴大秋翻地等，都是根本改善西伯利亞農業的措施。目前的首要任務，就是盡量採用先進農業機械，恢復與鞏固農業拖拉機和機器庫。

在戰時農業發展中，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在各方面都是大轉變的年份。自一九四三年下半年開始，各解放區農業恢復工作即迅速進行起來。由於播種面積和穀物收成的增長，一九四四年，蘇聯獲得了較一九四三年多十一億普特的穀物。與恢復及發展農業同時，恢復與發展畜產問題亦被提到議事日程上。

戰爭期間，牲畜總數及其分佈曾發生了巨大變化。就整個蘇聯說來，由於許多農業區之被暫時佔領，一九四二及一九四三年的牲畜（其中包括馬、牛、羊、豬等）較一九四一年減少了。而在同一時期內，蘇聯東方各區集體農莊，則在戰時困難條件下，增加了繁殖力較強的牲畜；其中牛由一九四一年初的一千一百四十萬頭增為一九四三年初的一千二百五十萬頭，山羊與綿羊則由二千八百一十萬隻增至三千四百二十萬隻，只有豬的數目依然未變，這首先是由於集中的飼料儲備有限之故。

在發展畜產上，一九四四年也是轉折年。牲畜減少現象停止了。最低水平已成過去了。蘇聯牲畜數量於一九四五年初，較諸一九四三年，即在二年之內，有了如下的增長：牛增加了一千五百八十萬頭，羊增加了八百四十萬隻，豬增加了二百八十萬口，馬增加了一百七十萬匹。牲畜之增長不僅發生於解放區，而且發生於後方各區，不僅見之於集體農莊，而且見之於個體農民，儘管如此，但一九四四年的牲畜數量，還遠未達到戰前水平，並且在馬與豬的繁殖方面，其已恢復之水平還很低。

恢復與擴大牲畜之再生產（首先是在集體農莊與國營農莊中）乃是社會主義農業最困難的任務。增加畜產的基本前提就是要解決飼料問題，這一問題不獲解決，就不能擴大牲畜再生產。為加速牲畜增長，必須盡力發展繁殖力最強的牲畜，這樣，才能將全國的需要與各地農民的利益結合起來。國家

對於集體農民在其恢復屬於私人所有，但却符合農業組合章程之牲畜方面的幫助，對於發展畜產亦有巨大作用。

由此可知，蘇聯雖暫時喪失了豐富的農業區，但在戰時經濟期間，社會主義農業仍保證了蘇軍及蘇聯居民的糧食供給。蘇聯穀物商品儲備之所以能較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大為增加，乃是由於集體農莊制度在農村中勝利的結果。

運輸與運輸組織

沒有發達的，暢行無阻的交通運輸，國家戰時經濟的進行乃是不可想像的。在蘇聯二千二百三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蘇維埃經濟之協調，全賴乎交通運輸之發展。交通運輸在蘇維埃國家經濟中的作用之所以特別重大，是因為在那裏，預定作為生產用與消費用的各種商品，由其生產地區到其消費地區，平均需要經過約七百公里的路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內戰之後，蘇維埃俄羅斯所剩下的都是一些完全被破壞了的而且是技術落後的交通工具。三個五年計劃，在社會主義的改建交通運輸的基礎上，使它變成了蘇聯國民經濟底先進部門之一。一九四〇年與一九二〇年相較，蘇聯鐵路運輸量已增達三十六倍。內河運輸增達七倍。海上運輸增達十一點六倍，汽車運輸則增達八十九倍。

革命前俄國僅有鐵路五萬八千五百公里，而蘇聯鐵路全長，至一九四〇年，已增至十萬五千三百公里。並且經過技術上的改造，其運輸能力亦增長了。平均每晝夜之運輸量由一九一三年的二萬七千

四百節車廂增爲一九四〇年的九萬七千九百節車廂。改造後的蘇聯交通運輸於衛國戰爭時期，已成爲戰時經濟的鞏固基礎。

在衛國戰爭時期，由於蘇聯許多經濟地區之被德寇暫時佔領，可資利用的鐵道網之長度，於一九四三年初，已較一九四一年減少了百分之四十。雖然被佔鐵路網內的車頭、車廂等，都曾移至蘇聯東部地區，但車頭總數在同一時期內仍減少了百分之十五，而貨車車廂總數則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由於許多河運系統之被佔領，一九四二年的小汽輪較一九四〇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十，而在同一時期內，其他船隻也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海上運輸艦則減少了兩倍。

由於衛國戰爭時期生產力和運輸力之新配置，蘇聯戰時經濟的中心任務，就是克服發展交通運輸上的，特別是發展鐵路運輸上的地方窄狹的困難。在蘇聯戰時經濟中，首先是在烏拉爾和西西伯利亞鐵路運輸中的這些特殊困難，是以增加各重要鐵路聯結點與各車段的吞吐力，加強烏拉爾、伏爾加河流域和西部西伯利亞各區新建之工業運輸支綫的作用等方法克服的。

戰時經濟期間，在幾乎完全停止了新機車與新車廂出產的條件下，修理各種運輸工具與艦隊，生產一些補充零件，恢復被希特勒德國破壞了的交通工具——機車、車廂，河上及海上艦隊等問題，也是發展鐵路及水上運輸的重要任務。

衛國戰爭期間，在戰時困難條件下，也曾進行了被德寇破壞的各鐵路之恢復工作。這一經常是在敵人掃射下進行的恢復工作，乃是鐵路員工生活史上最光輝的一頁。這只要舉下面一個例子來說明就夠了。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在紅軍冬季攻勢中自德寇佔領下解放的各地區內，蘇聯鐵路員工在兩三個月內，即恢復了六千六百公里鐵路，而於一九四三年全年內，在各解放區修復通車的鐵路，則達一萬九千公里。在衛國戰爭條件下，組織鐵路和水路運輸，首先是組織軍運和各種戰時經濟運輸的經

驗，是有特殊意義的。在戰時經濟期間，蘇聯交通運輸順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並保證了前綫需要與戰時經濟運輸。

在德國戰爭初期，鐵路及水路運輸會嚴重的減少了。一九四二年鐵路運輸的晝夜平均運輸量，較一九四〇年全蘇鐵路網運輸水平減少了一點三倍。內河運輸於同一時期減少了一點八倍。鐵路和水路運輸量的減少，是與大部鐵路網、河運系統和大部波羅的海及黑海領海之被德寇暫時佔領有關。同樣，也與鐵路運輸及水路運輸工具因德佔領者之破壞與掠奪而減少有關。

一九四三年，蘇聯交通運輸工作有了重大的改進。通車鐵路長度一年間增加了一萬九千公里，機車增加了兩千台，貨車廂增加了五萬六千節。一九四三年，各鐵路的晝夜平均運輸量，較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三千節車廂。內河運輸於一九四三年增加了五萬五千六百噸公里。

鐵路運輸之所以能夠增長，首先是因為克服了隨生產力配置與運輸力配置之改變而產生的，列車通過方面的地方狹窄困難。通車各鐵路運輸力的發展，是依靠下列各綫路來實現的：

第一，依靠山西西伯利亞通烏拉爾的鐵路，使經由秋雷木斯克車站的鐵路運輸力增達一點四倍，經由瓦蓋車站者增至一點二倍，經由山西那爾斯克車站者增達一點四倍；

第二，依靠山南烏拉爾通北烏拉爾的鐵路，使經過烏克蘭的運輸力增至一點五倍；

第三，依靠從烏拉爾通中央地區及伏爾加流域的鐵路，使經由克洛巴切沃和基洛夫的運輸力增至一點二倍。

第四，依靠自中亞細亞通蘇聯歐洲部分的鐵路，使由克拉斯諾沃斯克經過阿雷西的鐵路運輸力增至一點三倍，而經過埃兌爾里雅者則增至一點四倍。

在戰時經濟時期，鐵路運輸力的發展同樣還由於新的鐵路綫之建設。衛國戰爭時期新修通車之鐵

路，長達一萬公里，其中有北別却爾斯鐵路，索洛克斯至奧波茲爾鐵路；斯維日斯克——烏里揚諾夫斯克——包爾斯克——薩拉托夫——斯大林格勒鐵路，大莫斯科環城鐵路，阿克摩林斯克——卡爾塔雷鐵路，奧爾斯克——坎達哈赤——古里耶夫鐵路，基茲里雅爾——阿斯特拉罕鐵路，科姆李摩爾斯克——蘇維埃加宛鐵路。

若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革命前的俄國鐵路運輸工作水平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蘇聯交通運輸工作水平相比，那是很有意義的。一九四三年（戰爭年份）蘇聯運輸量較一九一五年（同樣是戰爭年份）革命前的俄羅斯增達二點八倍，但二者鐵路長度差不多是相等的。衛國戰爭時期，鐵路運輸工作之順利進行，這說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組織性與技術——經濟上的優越性。

但還不能說，蘇聯戰時經濟期間，鐵路運輸已經利用了它所有的資源後備。若能動員鐵路上的這些未被利用的資源後備，就可使軍事運輸與經濟運輸晝夜平均運輸量再增加數千節車廂。若把祖國戰爭前與戰時鐵路運輸中車廂迴轉次數相比較，那末這些未被動員的後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此即蘇聯鐵路上貨車車廂的迴轉在一九四〇年曾是七點四晝夜迴轉一次，但一九四二年却是十三點八晝夜迴轉一次，一九四三年車廂迴轉所需時日雖略有減少，但仍停留在十二點六晝夜迴轉一次的水平。如同在工業方面產品生產時間之縮短即可增加產量一樣，車廂迴轉所需之時間減少，即可增加鐵路運輸量。衛國戰爭時期，車廂迴轉之遲緩，是由下列原因決定的：

第一、經濟上的原因，即由於生產力的東移，使運輸距離增大了；

第二、技術上的原因，即交通工具之使用標準惡化了。

由於貨車車廂迴轉的遲緩，要完成先前蘇聯東部和中部鐵路運輸量，一九四三的貨車車廂總數，不得不增至一九四〇年的一倍半左右。改善交通工具使用之技術標準，減少車廂在一地停滯的時間，

增加貨車速度，取消過遠的不合算的運輸，用這些方法減少貨車車廂迴轉所需時間，這就是鐵路運輸的一大後備力量。

蘇聯鐵路員工的任務，就是動員這些後備力量。爲此，必須恢復交通工具的技術狀況與改善其使用。必須加緊恢復與發展蘇聯各經濟地區的商品生產，滿足地方需要，以避免從遙遠的地區運進這些貨物。如果把貨車車廂迴轉時間減至七點四晝夜迴轉一次，也就是說至少回復到戰前水平，那末與戰時各年相比，蘇聯國民經濟即可再動員約二十六萬節車廂以增加鐵路運輸，這就是說，可以使晝夜平均運輸量再增加三萬五千節車廂。

保證滿足前綫及蘇聯戰時經濟運輸需要的決定條件之一，就是將交通運輸改爲戰時狀態。於戰時經濟期間會改爲戰時狀態的蘇聯交通運輸職工紀律條例規定，交通運輸中的戰時紀律，就是職工自覺地完成其職務，絕對與準確地完成上級的命令與指示；這一戰時紀律的目的，在於鞏固每個交通運輸工作者對勞動，對『誠實、光榮、勇敢與英雄事業』的自覺態度。

該條例所規定的戰時紀律，即要求蘇聯每個交通運輸工作者一定準確地完成其職責；堅決遵守交通運輸上的各種法令，指示與規則；很好地了解並經常改進其業務；愛護國家財產——各種交通機械、器材，與屬於交通運輸方面的貴重物品；完成工作標準和生產規定，遵守交通工具的使用標準與限度，嚴格保守國家祕密與軍事祕密。

根據改爲戰時狀態的蘇聯交通運輸職工紀律條例，交通運輸部門首長的命令，乃是對下級的法律。必須毫無保留地、準確地，按期完成。任何違犯交通運輸紀律者，都要受到紀律制裁，或交付軍事法庭審判。交通運輸工作者的失職，要與蘇軍中軍事人員之失職同樣看待。在交通運輸上所犯之一切罪行，都要在軍事法庭上按戰時法規受審。根據軍事法庭的決定，失職的交通運輸職工，如果不受更嚴

峻的懲罰，也要撤職，押赴前綫罰工隊去。

在蘇聯交通運輸部門的首長方面，則必須是完成自己職責之模範，清楚地傳達命令和指示，堅決要求下級準確執行，檢查執行程度並對下級採取適如其份的紀律制裁或獎勵。

由此可知，儘管戰時存有許多巨大困難，但蘇聯交通運輸仍順利地服務於蘇軍及蘇聯戰時經濟之需要。為保證各鐵路網的車輛，蘇聯鐵路職工會必須依靠加速車廂的迴轉，以抽出成萬的車廂，服務於蘇聯國民經濟日益增長之需要。

勞動組織與工資

蘇聯社會主義社會所特有的，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勞動組織與工資底基本法則，在戰時經濟期間仍舊適用。這些法則就是：

第一、根據國家企業與集體農莊工人支出勞動的數量與質量，按勞取酬。

第二、根據上述法則，實行同工同酬制度；所謂同工，包括勞動時間與質量兩方面。

第三、由於國家企業和集體農莊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不同，因之二者勞動報酬形式也不同。

第四、提高勞動者生活水平，消滅失業和貧困，提高國家企業工人的實際工資和集體農莊莊員勞動日的價值等。

65

第五、隨着工人階級之增長及其文化、技術水平之提高，在生產中實行勞動的機械化與電氣化。

第六、實行社會主義競賽和獎勵制度，以獎勵在完成與超過計劃方面表現優異者。

澈底執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法則，乃是增加生產的有力源泉。由於祖國戰爭時期蘇聯戰時經濟的某些特點，在各企業勞動組織方面，工資制度方面，以及在我國各經濟區域和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勞動力平衡問題上，都發生了嚴重的變化。

雖然產業職工在國民經濟職工總數中的比例，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增為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三十九，但由於徵兵和若干工業區被德寇暫時佔領，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職工總數，於一九四三年却比一九四〇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八。

上述關於職工數量的一般統計材料，在蘇聯各個經濟地區，有各自完全不同的情況。在北部，西部，中部，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各區國民經濟部門內，一九四三年的職工，較一九四〇年減少了。而在同時期，烏拉爾各國民經濟部門的職工數量則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在其工業部門則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在伏爾加河流域，國民經濟各部門職工增加了百分之十六，而在其工業部門內則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在西部西伯利亞，職工總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其工業部門內，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一；在卡薩赫斯坦和中亞細亞，職工總數增加了百分之七，在其工業部門內，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

生產力重新配置的結果，蘇聯東部地區職工的比重大大增加了。伏爾加河流域工業區職工對全蘇工業職工總數的比例，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增為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七·五，烏拉爾工業部門職工的比例，在同時期內由百分之八·五，增為百分之二十點五，西部西伯利亞工業部門職工的比例，則由百分之四增為百分之九，卡薩赫斯坦和中亞細亞工業部門職工則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點五，增為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八。

戰時經濟期間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勞動力的補充來源，就是動員城鄉未參與社會勞動的有勞動能力的居民從事生產。這一動員工作是根据衛國戰爭初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頒布的指示進行的。

僅在一九四三年，即動員了七百六十萬九千居民從事勞動生產，其中從事工業與建築業者一百三十二萬，從事農業工作者三百八十三萬，從事林業者一百二十九萬五千人。

蘇聯戰時經濟期間，由於大部份男子應召入伍，在生產部門中女工比例增加了，童工的採用也增多了。在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職工中，女工的比重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八，增為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三，其中在工業部門者，由百分之四十一增為百分之五十二，在鐵路運輸部門內，由百分之二十五，增為百分之三十六，在郵電部門內，由百分之四十八增為百分之六十七，在市政經濟部門內，由百分之四十二增為百分之六十四，在貿易部門內，由百分之三十七，增為百分之五十五，在公共食品部門內，由百分之六十七，增為百分之八十三。在教育機關，婦女比重亦由百分之五十八增為百分之七十三，衛生部門的婦女則由百分之七十六，增為百分之八十三，國家機關內的婦女工作人員則由百分之三十五增為百分之五十五。

在工業部門內，熟練工人中的婦女比例同樣增加了。女蒸氣機司機由一九四一年初的百分之六，增為一九四二年底的百分之三十三，壓縮機女司機由百分之二十七增為百分之四十四，鍋爐工人中的女工由百分之六增為百分之三十七。在同時期內，女鑛工由百分之十六增為百分之三十三，女鉗工由百分之十七增為百分之三十一，手造模型的女工由百分之十二增為百分之三十二，機製模型的女工由百分之二十九增為百分之三十九。女銅工由百分之三點九增為百分之十二，女鐵工與鑄工由百分之十一增為百分之五十，各電力站的女電器修理工人由百分之三十二增為百分之五十。在同時期，女汽車司機由百分之三點五增為百分之十九，女運輸工人由百分之十七增為百分之四十。

為減輕女工的勞動，恢復與發展了幼稚園，兒童之家以及其他保護母親，兒童的機關。在未被佔領的蘇聯國土上，幼稚園的兒童數目，由一九四一年的六十八萬三千增為一九四四年的一百二十一萬

人，托兒所的兒童數目，在同時期則由五十萬九千增爲六十四萬五千。蘇聯政府對於兒童的關懷，保證了女工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便利了吸收女工從事生產。蘇聯實行的同工同酬制也特別有利於吸引婦女參加生產。

祖國戰爭時期，蘇聯沒有流浪兒，也應當認爲是戰時經濟底一大成績。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國飽嘗了流浪兒的悲劇。年輕的蘇維埃俄羅斯，在許多年內，才治癒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以後的內戰所帶來的創傷。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衛國戰爭期間，蘇聯政府採取了許多措施，以教育喪失父母的兒童。這只須舉出組織了許多蘇沃洛夫學校，擴大各習藝所，組織兒童團隊等事就足說明。在兒童團隊裏的兒童，完全由國家保證其一切需要。這些兒童於學校內經過國家教育，成長爲男女青年後，便參與社會勞動。

衛國戰爭時期職工成分，就年齡方面說，會有極大變化。十八歲以下的職工在一九三九年佔全部產業職工的百分之六，而到一九四二年，則增至百分之十五。而年在十八以上至四十九歲以下者則由一九三九的百分之八十五減爲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七十三。在工業部門內，年齡在五十以上的職工數目增長了，即由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九增爲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十二。

在農村有勞動力的居民成分中，發生了更爲巨大的變化。婦女勞動力成分由一九三九年初的百分之五十二，增爲一九四三年初的百分之七十一。在衛國戰爭期間，如同在工業部門內一樣，婦女和青年在農業中的作用也急劇增長了。他們肩負了戰時重担的大部份。在農業中也如同在工業中一樣，同工同酬制大爲便利了吸引婦女參加生產。

儘管吸收了許多訓練較少的新工人從事生產，但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各個生產部門內，社會主義勞動紀律鞏固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在勞動中表現出獻身精神，已成衛國戰爭時期的一般現象。

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一九四二年較過去一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九，而一九四三年，又較一九四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七。在機器製造業與軍火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得最快。在這些工業部門內，一九四二年的勞動生產率較上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一，而一九四三年又較一九四二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一。

煤產、石油工業、紡織工業、輕工業、食品工業和木材工業等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於一九四二年，較諸戰前水平曾是暫時降低了。紡織工業、輕工業、食品工業等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之暫時降低，主要是由於電力、燃料、原料供應之中斷，以致發生較大的生產停頓所引起。一九四二年，煤產、鑛產、石油工業與木材工業等部門產品之暫時減少，則是由於許多新工人，還未習慣於重工業部門的體力勞動之故。但當時在燃料、鑛業與林木工業中，工人的體力作用却一直是很大的。

衛國戰爭時期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首先是依靠以生產合理化的方法，增加每個工時的產品，再則是依靠以減少停工與歇工的辦法增加工作時間，並且還採用了加班工作的辦法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在衛國戰爭兩年期間，每個工人，每月平均加工工作鐘點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而在此期間，每個工人每小時出產量亦增加了百分之七。

勞動生產率之增長，保證每件成品，首先是軍工生產成品所費之勞力減少了。航空工業各工廠，每架И·П·4式驅逐機的生產，從一九四一年費兩萬小時人工，減為一九四三年的一萬二千五百小時人工；一架И·П·2式驅逐機生產，由一九四一年的九千五百小時人工，減為一九四三年的五千九百小時人工；生產一架И·П·2式飛機所費勞動由兩萬五千三百小時人工減為一萬三千二百小時人工。大砲工廠，生產一門一五二公厘口徑的曲射砲所費勞動力，由一九四一年的四千五百小時人工，減為一九四三年的二千四百小時人工；生產一門七六公厘口徑的團砲所費勞動力則由一千二百小時人工減為八百小時人工；生產一門師砲所費勞動力由一九四一年的二千二百小時人工，減為一九四四年的六

百小時人工。在軍械工廠，大口徑機槍生產所費勞動，由六百四十二小時人工減為三百二十九小時人工；步槍生產由十二小時減為九小時，生產手發T T子彈由十三小時減為十點八小時人工。在坦克工廠，生產一輛T 34式坦克所費勞動由一九四一年的八千小時，減為一九四三年的三千七百小時，生產一輛B B式坦克則由一萬四千六百小時人工，減為七千二百小時人工。

蘇聯於戰時經濟期間，其勞動生產率之所以能够增長，是由於培養了大批新的技術工人幹部。勞動幹部之再生產——戰時經濟之最大難題被蘇維埃國家勝利解決了。爲了培養生產幹部，曾經過訓練班、短期學校與私人帶徒弟等辦法，於一九四一年，大批訓練出了二百七十六萬五千熟練工人，一九四二年訓練了三百七十七萬三千，一九四三年訓練了五百一十三萬四千人。此外，又經過各工廠、工場附設學校，工藝講習所，鐵路學校等，於一九四一年訓練了四十三萬九千人，一九四二年又訓練了五十六萬九千人，而一九四三年，則培養了五十九萬八千熟練工人。

戰時經濟的增長及戰後恢復與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任務，都會將擴大培養具有高度技術修養的知識分子幹部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雖然戰時有許多困難，但蘇聯政府仍是提高與增加了高級學府的獎學金，改善了大學生們的營養，免除了他們大部分人的兵役。這就保證於衛國戰爭時期保持並增加了高級學府和技術專校的數量。如果說一九四二年秋，在高級學府學習的大學生，曾減少到十萬零八千人，那末到一九四三年，便又擴大到十六萬七千人。一九四二年秋，技術專校的學生數目亦會減少到十七萬人，而到一九四三年，又重新增加到二十五萬三千人。

大批吸收新幹部參加生產，同時又需要迅速精通與擴大軍工生產，所有這些，都要求改善勞動組織。這一改善工作是循下述途徑進行的。

第一，徹底執行計件累進工資制與計時獎勵工資制。

第二、對完成與超過計劃的工程師、技術幹部給與勞動獎金，並發展這一獎勵制度。

第三、對完成與超過生產任務的工人，給與物質獎勵。

在爭取完成國家戰時經濟計劃的鬭爭中，憑藉這一物質獎勵制，使社會主義競賽獲得了廣大規模。對於工程師、技術幹部與工人獎勵的範圍也擴大了。獎金在工程師、技術工作者工資總數中所佔比例，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十一，增為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二十八，而在工人工資中所佔比例，則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四點五，增為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八。

廣泛採用獎勵制，以獎勵完成與超過生產計劃者，曾是刺激戰時經濟上昇的一個極端重要的補充因素。顯而易見，戰時經濟中的這一良好的經驗，在戰後時期，也作為提高生產的一個補充來源而被採用着。

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了鼓勵各主要生產部門，戰時經濟期間，在工資水平方面，會有巨大改變。首先是煤業、石油工業、黑色和有色五金業及軍事工業部門的提高工資水平了。這就保證了這些重工業部門內有較高於國民經濟其他生產部門的工資水平。煤業、黑色五金工業、和軍事工業等部門的工資水平，戰時經濟期間曾是最高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全體工業工人每月平均貨幣工資，曾由一九四〇年的三百七十五盧布，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五百七十三盧布，或說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而在蘇聯採煤工業內，則增加到了七百二十九盧布，在黑色五金工業部門，則增加到六百九十七盧布。在全蘇工業部門內，工程師與技術工作者每月平均工資，由一九四〇年的七百六十八個盧布，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一千二百零九個盧布。而在蘇聯採煤工業部門則增加到二千五百零二個盧布，在黑色五金工業部門內，甚至增到一千七百二十五個盧布。

衛國戰爭時期，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特別是工業部門工資提高得最多者，是在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和西部西伯利亞等地區，這些地區肩負了前綫軍械供應的主要重擔。這些地區的人們，勞動最緊張，勞動生產率也更高，工資水平因而也較高。如說整個蘇聯工業部門工人每月平均貨幣工資，一九四四年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的話，那末在伏爾加流域在同時期就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在烏拉爾地區就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在西部西伯利亞就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

與資本主義各國不同者，蘇聯工人階級的實際收入，或者說它在社會產品分配中所得者，並不單是貨幣工資。有些人企圖將蘇聯工人階級生活水平與資本主義國家，譬如說英美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僅從貨幣工資的數量來作比較，這是完全的無知，而經常是純粹的誹謗。

在蘇聯工人底貨幣工資上，至少必須增加上列各項費用：如療養疾病時期、婦女產前產後假期、輪流休假時國家給予的費用，從廠長支配下的基金中支付的費用，免費受教育和獎學金，為提高其技術的學習費用，免費醫療，和組織休息，國家給予兒童機關的費用及對多子女家庭的補助費等。所有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的費用，就使得蘇聯工人的貨幣工資，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

此外，在資本主義各國——英美在內——，工人階級的工資是極不穩定的。在美國和英國，經常存在的，而於經濟危機時期則周期增加的失業，就會不幸地降低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與工資。如把戰前美國失業人數計算進去，那就必須將美國公佈的貨幣工資材料減低百分之三十二來計算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而且在經濟危機時期，這一工資水平還要大大下降。

戰時經濟期間穩定而低廉的糧食及其他必需品的配售價格和穩定低廉的公共交通運輸費與郵電費等，都保證了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水平。此外，蘇聯工人用於住宅、交通運輸上的開支，較之美國工

人用於同樣目的者要少五六倍。

在蘇聯，工資的多少，不僅依據勞動底熟練程度，而且依據勞動的輕重來規定。在燃料五金工業等國民經濟部門尤其如此。正因為如此，所以蘇聯政府在戰前，而尤其在戰時，總是把採煤工業和黑色五金工業工人底工資水平提到第一位。而在資本主義各國則不然，在那裏，黑色五金工人和鑛工的工資水平則是列於末位。這是長期失業的後果。由於長期失業的存在，這就使資本家企業主在工資問題上只根據一個原則，即勞動熟練程度，而對勞動的輕重程度則置之不顧，並迫使工人在失業底打擊下，同意在苛重條件下接受低廉的工資而從事工作。甚至在戰時，失業雖然減少了，但資本主義各國企業主並沒有改變這些重勞動部門工人底工資水平。

由此可知，在戰時困難條件下，蘇維埃國家仍然保證了高度生產的勞動組織和職工工資的增長，而在重工業中則保持了最高的工資水平。由於有訓練與分配勞動力的組織機構，蘇聯戰時經濟沒有遭受因勞力缺乏而來的任何嚴重困難。

商品流通與物價

蘇聯社會主義社會有它自己的商品交換形式——即沒有資本家與投機者的蘇維埃貿易。它有許多與資本主義貿易原則上不同的特點。

蘇維埃貿易，乃是以社會主義企業所生產的商品為主並佔居優勢地位的一種商品交換形式。商品——貨幣或貨幣——商品之交易，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各社會主義企業間（其中包括國家企業與

集體農莊間)的商品交換，或工、農、知識分子實現其自己的一份社會產品價值之形式。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不知商品價值與其使用價值間之牴觸爲何物的；這種牴觸乃是生產手段私有制的產物，是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牴觸，乃是生產的社會方式與產生危機的私人佔有形式之間的矛盾之最初形態。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蘇聯，商品價格是根據商品的價值，或說是根據商品生產費用決定的。但蘇維埃國家可以根據鞏固社會主義與提高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利益，由自己具體確定國家企業所生產的或國家貿易中每件商品之價格，因此，也就是確定商品零售價格與其實際價值之相差程度。

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既沒有資本主義生產週期所特有的，商品價格之自發的波動，也沒有如在美國已成爲規律的，獨佔資本對於物價的投機操縱。由於蘇維埃國家握有商品的絕大部份與國家商品儲備，因而它就可以降低國定價格，並予合作社商業及集體農民市場之降低物價以經濟影響。

實行對外貿易壟斷的蘇維埃貿易，是不容許外國資本壟斷侵入國內市場的。經由國家貿易孔道而進來的入口商品，要服從於國內貿易所服從的同一物價構成法則。蘇維埃經濟底獨立與自主，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法則。

蘇維埃貿易將主要的生產手段與勞動力排除於私人買賣範圍之外，這就反映出蘇聯已消滅了剝削階級與人剝削人的制度。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力不是在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上出賣的商品。

在貿易方面，蘇維埃經濟是允許國家企業與合作社企業間的『競爭』的。這種『競爭』，是爲爭取改善商品質量與更好的爲蘇聯消費者服務的，是一種進步現象。如同在生產方面一樣，各企業間在商品流通方面的社會主義競賽，加上獎勵制度，這就是蘇聯貿易不斷發展的有力源泉。

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商品流通的形式與居民供給組織曾有重大變化，這表現在：

第一、採用了糧食與日用必需品的定量配售制（即憑券購物的配給制）；

第二、規定了各種軍工生產部門勞動者糧食配售條件與標準的差別；

第三、在各企業中組織了工人供給科。

由國家供給麵包及其他食糧的居民數目，於戰時經濟期間，增長到七千六百八十萬人。糧食的定量供應制，乃是使消費服從於生產底利益，保證對戰爭有決定意義的各生產部門——如軍工、燃料、冶金、電力及鐵路運輸等部門之工人消費得有較高的水平。

各企業內工人供給科的組織與大量蘇維埃農莊及其副業之轉交與它們，遂改善了工業部門內工人、技術工作者們的供給，並使之較為穩定。各工業企業之貿易網在蘇聯零售商品流通中的比重，於一九四二年期間，由百分之四增為百分之二十八；而在烏拉爾，在同一時期內，則增為百分之四十五。零售商品流通之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保證工人供給的廠內商業部門之工作。工業及交通運輸業附設農場之播種面積，自一九四〇年的一百三十六萬五千海克脫增為一九四三年的三百一十萬四千海克脫，牛由一九四〇年的五十八萬六千頭增為一九四三年的九十萬零四千頭。

在增加我國食糧後備方面，職工私人菜園，起了重大作用，它保證了洋芋和菜蔬的一筆額外收入。組織這些菜園的經驗，證明發展勞動者在改善其物質狀況方面的個人積極性與創造性是必要的。

但戰時經濟期間，居民的主要供應，仍是食糧及其他主要日用必需品的國家定量分配。各種產品與其他廣泛必需品的供給標準，在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是不同的。其基本原則，是保證提高突擊勞動手與緊張生產者之消費。根據此一原則，蘇聯政府曾提高了那些完成與超過生產定額的工人之糧食供給標準。提高的方法是對完成與超過生產標準者規定給予補充食品。衛國戰爭期間，在各重工業與軍

事工業部門內，享受這種補充食品的工人，佔全部工人的百分之六十。此外，蘇聯政府還規定了提高一切從事重勞動與有礙健康之勞動的工人與工程師、技術工作者之供給標準，這類勞動包括冶金業中的溶鍊，地下掘煤採礦，各種化學工業與石油工業中的勞動，以及鐵路運輸方面機車上的勞動等。

由於糧食定量供給制之實行，公共膳食設備（如公共食堂，食品店）在戰時經濟期間曾有廣泛發展。這一設備成了許多職工伙食的主要形式。在整個零售商品流通中，公共飲食的比重，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十三，增為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五。

雖然公共食堂增加了，但整個零售商品流通量，一九四二年却較戰前的一九四〇年減少了。一九四二年零售商品流通量的減少，是由於若干地區之被德寇暫時佔領之故，而在蘇聯東部地區，零售商品流通量於衛國戰爭初期之所以略有減少，則是由於市場上消費品之減少，被減少的消費品中，部分是用以供給蘇軍了。

隨着糧食及其他廣泛必需品生產之增長，國家與合作社零售商品流通於戰時經濟後期亦有所增加，一九四三年較一九四二年增加了六十億盧布，而一九四四年則較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三百五十億盧布。但零售商品流通量始終是低於戰前水平的。零售商品流通量減少之基本原因：

第一、由於蘇軍及軍事工業需要的增長，不入市場的商品在我國商品生產中所佔之比例增大了；

第二、由於某些地區之被德寇佔領，使消費品生產與農業商品之生產水平較戰前降低了。

在消費品的分配上，市場上的糧食及其他廣泛必需品作了有利於軍事需要的縮減。市場上的白麵與精米在此類商品生產總量中所佔比重，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八十六降為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七十二。市場上的肉類在整個肉類商品生產中所佔之比重，在同一時期由百分之四十三降為百分之二十二。市場棉織物在棉織商品生產總量中所佔比例，亦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四十六，減為一九四二年

的百分之九。在皮鞋商品生產中，入市場出售的比重則由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七十九，減為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七。與市場商品之減少同時，市場以外的商品數量（其中包括軍需品）則增加了。

由於商品生產中不入市場的商品比重之增加，所以加強地方蘇維埃在發展商品流通中的主動性這一任務，遂具有特殊意義。在零售商品流通中實行若干經濟措施的結果，遂使各地分散的物資之比例，由一九四一年的百分之十二增至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十七，其中在中部地區則由百分之十三增至百分之二十四，在伏爾加流域，則由百分之十四增至百分之十七點五，在西部西伯利亞，由百分之十六增至百分之十九，在外高加索，由百分之十一增至百分之十五。在零售商品流通方面的這些變化，應認為是極有積極意義的。無論在國營貿易和合作社貿易中，都必須多方鼓勵吸引各地分散的物資進入商品流通，不管這些物資是勞動者私人消費的工業品與穀物商品，抑或是工人，集體農民與職員私人住宅建築用的建築材料。

爲了保證穩定勞動人民的私人預算，蘇聯政府嚴格執行了自己的職務，維持了糧食及其他頭等必需品固定零售價格的穩定水平。固定的國定商品零售價格政策之基礎，就是工業品批發價格之穩定。根據蘇聯政府的決議，一九四二年國家發售的工業產品批發價格指數，僅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軍工產品，僅爲戰前水平百分之七十二，機器製造業產品僅爲百分之八十七，重工業產品（機器製造業不算在內）則爲百分之九十八，輕工業與食品工業產品批發價格指數，則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二十。

定量配售之糧食與工業品的國定零售價格指數，在戰時經濟期間幾乎沒有變化，至一九四三年，仍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點五。定量配售之糧食與工業品的國定零售價格並沒有提高。酒和烟例

外，其價格是提高了。酒類飲料價格之提高，乃是對於部份需酒過多之居民收入所課之特種間接稅。

在資本主義的美國，政府的管制却未能將物價維持在戰前水平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農產品批發價格增至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九十六，食品批發價格，增至百分之一百五十一，紡織品價格增至百分之一百四十四。批發價格的這一增長，無可避免的會影響零售價格水平及工人的工資。

根據保證城鄉勞動人民正常生活水平的原則，蘇維埃國家確定了國定商品零售與批發價格。主要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國內流通商品之大部集中於國家手中，商品之有計劃的分配，對外貿易之壟斷，所有這一切都保證了戰前蘇聯政府所規定的國定零售價格在戰時經濟期間之穩定。

在集體農民市場上，則實行了另外的法則。在那裏，價值法則是在市場供求法則的形態下實現的。結果，各城市集體農民市場上的物價指數，在一九四三年，植物產品增為戰前一九四〇年水平的十二點六倍，動物產品則增為十三點二倍。一九四二年與一九四三年（戰爭年份）集體農民市場上零售商品流通量之所以較戰前一九四〇年有所增加，這是因為在市場上供不應求的影響下，零售價格提高了的緣故。隨着農業之恢復與集體農民市場糧食出售之增加，自一九四四年起，市場價格便開始了顯著的下降，而在一九四五年，此一市場貿易之物價指數已較一九四三年下降了二點三倍。

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集體農民市場零售價格之下降，同樣與一九四四年組織了按照業已提高的價格出售商品的國營商業有關。實行了國營商業，便保證了集體農民市場上零售價格的下降。此外，國營商業使蘇維埃知識分子和部分最熟練的工人能夠用自己較多的工資與獎金獲得超過規定數量的糧食及其它必需品。

但兩個國定價格（配售價格與商售價格）的存在，特別是在保存着基於供求關係而定物價的集體農民市場情況下，是有其消極的一面的，而且只能是暫時的措施。同一物品有兩個價格，遂造成了一

種投機的機會。在消費品的國定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存有過大差額，遂使那些殘存於蘇維埃社會的投機分子能够自人民與國家身上發財並大量地進行不勞而獲的金錢積累。

對於千百萬蘇聯勞動人民實行的糧食與其他消費品之國家供給，是蘇維埃國家在戰時經濟期間，按固定的國定零售商品價格（即配售價格）組織的。不論商品底生產費用或其實際價值如何，戰時經濟期間，蘇維埃國家使定量分配的各主要消費品之零售價格保持了戰前水平。

由於保持了消費品國定零售價格與郵電及公共交通等費用的穩定水平，遂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保證了城鄉勞動人民的必需的生活水平。此外，戰時經濟期間蘇聯職工的物質生活水平，也以提高工資，吸收未參加生產的人們從事生產（這可提高家庭總的工資收入和職工底私人預算）等方法給予了保證。由此可知，食品及其它頭等必需品的定量配售制，於蘇聯戰時經濟期間，保證了各主要經濟部門職工與知識分子相當優越的供給條件。蘇聯政府所執行的，各主要糧食與廣泛必需品的固定價格政策，在衛國戰爭時期，保證了實際工資的穩定水平。

預算、信用與貨幣

蘇聯戰時經濟期間，蘇維埃國家底財政制度和貨幣流通經受了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戰爭底嚴重考驗。蘇聯戰時經濟的成長與鞏固，保證了蘇聯財政與貨幣流通之相對穩定。衛國戰爭時期的蘇聯預算、信用與貨幣流通狀況，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革命前的俄國及內戰時期的蘇俄財政和貨幣流通狀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俄羅斯的財政經濟與貨幣流通遭受了完全的破產。爲了醫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以後的內戰創傷，蘇維埃俄羅斯曾不得不在恢復正常貨幣流通前，實行了若干根本改革。在一九二四年實行貨幣改革時，一九二二年發行的舊盧布與新盧布的兌換率是五百萬比一。雖然衛國戰爭是過去一切戰爭中最苦重的一次戰爭，但戰後恢復蘇維埃盧布本價的任務，並不需要類似上述之根本改革。

戰時經濟期間，蘇聯財政經過預算，信用與貨幣，完成了下列基本經濟任務：

- 第一、經過動員國民資財，當時收入及部分戰前儲蓄的方法，爲支付軍費而重行分配國民收入；
- 第二、國民經濟的物質儲備與資源之再分配，以便利重工業，首先是便利軍工生產；
- 第三、根據戰時經濟之需要，實施貨幣對於社會產品之生產與分配的控制。

衛國戰爭期間國家預算之改變，自下列數字可以看出。國家預算收入自一九四〇年的一千八百億盧布，減爲一九四二年的一千六百五十億盧布，其中由社會主義企業所得之收入由一千五百八十億減爲一千零八十億盧布，或說是由全部預算百分之八十七減爲百分之六十五。同時，由國民繳納與捐獻者則由一九四〇年的一百九十億增至一九四二年的四百四十七億盧布，或說是由全部國家預算收入的百分之十點八，增至百分之二十七。

國家預算支出則自一九四〇年的一千七百四十三億增爲一九四二年的一千八百二十八億，其中軍費由五百六十七億增至一千零八十四億，或說是由全部國家預算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五，增爲百分之五十九。同時，國民經濟的用途則由五百八十三億減爲三百一十六億盧布，或說是由全部國家預算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三，減爲百分之十七。

由此可知，在國家預算收入總共縮減了百分之八的情況下，其由社會主義企業所得之收入，亦即利

潤，則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二，而國民的獻納則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九，或說是增至二又四分之一倍。國家預算支出增加了百分之五，其中軍費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一，國民經濟的開支則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六。一九四二年預算非如一九四〇年那樣，收入超過支出達三十二億盧布，而是支出超過收入達一百八十九億盧布；這一差額是依靠發行紙幣與經過信用機構動員蘇聯國民經濟中的戰前物資儲備與資源來彌補的。

一九四三年，隨着戰時經濟之成長，國家預算亦鞏固了。其收入增至二千零二十七億盧布，支出亦增至二千一百億盧布，而支出超過收入之赤字則減少到七十三億盧布，而這一赤字則由發行紙幣與上年之物資儲存彌補起來了。一九四三年由社會主義企業所得之收入，較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一百四十億盧布；由國民獻納所得之收入增加了一百五十四億盧布。國民經濟的開支仍保持在一九四二年的水平上。在一九四四年，國家預算和財政便大為鞏固了。在這一年內，雖然國民經濟的開支與蘇軍的費用均增加了，但國家收入完全保證了國家支出。所以說，在衛國戰爭過程中，國家預算收支間的裂縫，是由大縮小，而在一九四四年則完全消失了。

革命前的俄國戰時預算與蘇聯戰時預算則完全相反。一九一四年的大戰期間，俄國國家預算收入只能保證其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一九一五年只能保證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一六年則只能保證百分之二十二，到一九一七年，其收入就只能保證其支出的百分之十五了。所有預算支出的其他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俄國，則全靠無限制地發行紙幣的方法，與對人民進行間接徵稅來彌補，這就促成了財政經濟的破產，使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走向貧苦不堪的境地。

在蘇聯戰時經濟中，社會主義企業之資本積累（即利潤）仍保持了很高的水平，它於一九四二年佔全部預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四，一九四三年則佔全部預算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八；指出這一事實是極

端重要的。這種利潤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水平，因為它是建立在戰時社會主義生產的增長，生產費用與流通費用之降低的基礎上的。各工業部門生產成本於一九四一年減低了百分之六點九，一九四二年減低了百分之五點九，一九四三年又減低了百分之二點五，而機器製造業生產成本一九四一年減低了百分之二十四，一九四二年減低了百分之十七，一九四三年又減低了百分之九。

蘇聯戰時經濟時期，國家信用對於動員物資及將物質資源作有利於衛國戰爭的再分配，曾起了特殊的作用。在衛國戰爭的頭兩年，預算支出超過預算收入之赤字，大多是經由動員蘇聯國民經濟之物質資源與儲備來彌補的。動員國民經濟各部門各生產階段的商品儲備，都是經由蘇維埃各銀行信託機構進行的。這些銀行計算了這些商品，並在將物資儲備作有利於軍工生產的再分配方面起了工具作用。從而便利用了蘇聯各國民經濟部門之戰前商品積蓄以應軍工生產之需。

在衛國戰爭的頭兩年，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物質資源與儲備都減少了。這可從國家銀行短期信貸之減少上面看出來（雖然各軍工企業之信貸是增加了）短期信貸的減少，反映出商品與物資儲備的緊縮，其中包括季節儲備的減少；也反映出這些材料是用於軍工生產及軍需費用上去了。這也就說明了，必須根據國內商品材料的儲存而確定進行信貸之規模的再生產法則。

必須指出，自一九四二年後半年起，在戰時經濟中所存在的新現象，這種新現象就是保證擴大再生產過程的信用投資之增加。一九四三年，此種信貸之增加約達六十億盧布。如果說在衛國戰爭的頭兩年，國民經濟中之物資儲存是減少了，那末一九四三年下半年，隨着蘇聯戰時經濟之增長，物資的儲備已開始增加，而信貸關係亦隨之增加了。

蘇聯戰時預算及其信用制度之鞏固，多半是由戰時經濟期間曾在構成方面與數量方面有過巨大改變的貨幣流通狀況決定的。大量貨幣開始停滯於流通界，而國民貨幣收入經過集體農民市場部分地由

城市轉入了鄉村。

一九四〇年，城市（非從事農業的）居民貨幣支出超過其收入達三十六億盧布，而一九四二年則超過二十二億盧布，這就是說，城市居民手中的現款減少了。但如果說在戰前一九四〇年，城市現款之減少，就是意味着流通貨幣總額之減少，那末，在戰時，一九四二年，貨幣之由城市流入鄉村，則是意味着國內流通貨幣總額增加了。由於一九四一年被動員參軍的職工工資之同時大量支付，及由於一九四三年工資基金之迅速增長，遂使城市商品流通之擴大落後於城市居民之貨幣收入。因此，在上述年份內，流通貨幣數量，在城市裏也增加了。

一九四二年與一九四〇年相較，農村居民的貨幣收入，由於農民出售其剩餘農產品的集體農民市場零售價格之提高，而大大地增加了。農村居民的貨幣支出，一九四二年也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但較其貨幣收入之增加數量爲少。農村居民貨幣收入超過其支出，這就意味着部份貨幣停滯於流通界。在戰爭中的一九四三年全年內，這一過程在鄉村中仍然繼續着。因此，在衛國戰爭期間，與發展商品流通同時，動員居民的貨幣，乃是一件有特殊意義的任務。

除經由稅收系統動員居民貨幣外，還必須指出蘇聯城鄉居民在認購戰時公債與其他形式的自願捐獻方面表現出來的高度愛國主義熱情。蘇聯居民個人的與集體的自願捐獻國防基金之熱忱，在蘇聯人民各階層代表與斯大林同志的來往信札中鮮明的表現了出來。蘇聯人民的志願獻金，在戰時經濟的四年間，曾交出了九百四十五億盧布以應衛國戰爭之需。

蘇聯戰時經濟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即是，雖然由於戰爭的需要發行了大量紙幣，但仍保持了貨幣流通的相對穩定。這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俄國經濟顯然不同的。衛國戰爭時期蘇聯貨幣流通之比較穩定，是由於：

第一、保持了糧食與頭等必需品的固定價格；

第二、在大大減低成本條件下，保持了生產手段與軍械之穩定的批發價格；

第三、不受市場供求法則的支配，按照計劃，集中地再分配了一切物資儲備；

第四、在大部農產商品集中於蘇維埃國家手中的條件下，穩定了農產品的國家採購價格；

第五、在戰時經濟期間，恢復與發展了工業生產，農業，交通運輸及商品流通。

可是，蘇聯戰時經濟期間，流通貨幣額，終究多於戰後和平經濟所必需者，如此，便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盧布的購買力。流通貨幣之過剩，乃是由於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期間為支付軍費而大量發行紙幣之故。同時又由於出售於居民的商品生產之縮減，用一般的方法——即經過商品流通的方法——已不能收回流通中的剩餘貨幣。此外還必須考慮到，在衛國戰爭期間被暫時佔領的部分蘇聯領土上，佔領者還發行了大量偽幣。

在革命前的俄國，流通中的紙幣數量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十六億盧布增至大戰結束時的二百三十億盧布。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三年內，俄國流通貨幣曾增至十四倍。結果，到一九一七年，貨幣大混亂便伴隨着革命前整個俄國經濟危機而降臨了。在蘇聯，衛國戰爭的三年間，流通貨幣只增至二點四倍，雖然戰時經濟期間，通貨超過了商品流通的數量，但在整個衛國戰爭期間，他仍舊是比較穩定的。

流通貨幣的數量是不能無限制增加的。因為流通貨幣數額之過度增加，就會破壞那藉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物質刺激力，在農業中尤其如此。通貨過剩就會使商品需要增加，但却沒有足夠的商品供應，這就會降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物質刺激力，並釀成集體農民市場物價之過分增長。但在戰時經濟期間，不多發行紙幣是不可能的。雖然比起生產利潤與國民資財之動員來，發行紙幣只是一個很小

的來源，但它總是支付戰爭費用的來源之一。

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貨幣也盡了它作為經濟工具的機能，蘇維埃國家利用這一機能，實行了其對於社會生產及產品分配的控制。作為生產及流通費用尺度的貨幣，乃是對生產成本、生產費用與價格實行核算與監督的工具。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就是要用來保持頭等必需品之穩定的國定零售價格。作為支付與儲蓄手段的貨幣，則要用來動員勞動人民的儲蓄以應衛國戰爭的需要。

由此可知，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預算、信用，會起了動員居民資財和再分配物質資源以利衛國戰爭之有力槓桿的作用。雖然通貨發行增加，超過了戰時經濟期間商品流通之需要，但依靠於國定的價格，蘇聯幣制仍是比較穩定的。

生產的計劃性

有計劃的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基本特點，對於蘇聯戰時經濟期間也是適用的，這些基本特點就是：

第一，整個社會生產在社會主義制度鞏固基礎上的迅速增長；

第二，以增加國家基本基金與保證技術進步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資本積累；

第三，隨着國民經濟之增長，而擴大消費基金；

第四，沒有生產週期性與經濟危機，並通過計劃確定生產力的新的分配比例。

在蘇聯戰時經濟一切部門普遍上昇與有決定性的轉變的一年——即戰爭中的一九四三年的經濟總

結中，特別明顯地看出了列寧——斯大林黨，蘇聯政府，蘇聯全體人民，蘇聯工人階級，集體農民和知識分子在組織與計劃戰時經濟方面的偉大成功。在這一年的經濟總結中，很明顯地表現出了有計劃的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之各種基本特點。在一九四三年，蘇聯已有『……內部協調一致與迅速增長的戰時經濟』（斯大林語）。

一九四三年，全國工業及工業合作社產品總量，較一九四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七。軍事工業的發展尤為蓬勃。一九四三年，飛機生產較一九四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自動砲台的生產增達七十七倍，高射砲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大口徑機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七六公厘砲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一二二公厘砲彈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一五二公厘砲彈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航空器材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八二公厘迫擊砲彈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一，一二〇公厘迫擊砲彈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八，飛機用瓦斯彈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子彈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

一九四三年各發電廠電力生產，較一九四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其中在烏拉爾，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煤產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銑鐵增加了百分之十七，鉛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鎳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阿摩尼亞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汽車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發電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九，滾軸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熔鑄爐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七。重工業的發展速度有了特別顯著的增加，為整個戰時經濟的上昇創造了鞏固的基礎。

一九四三年，工業部門內的工人勞動生產率，較一九四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其中在軍工生產部門內，則增加了百分之十三。職工數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工資基金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工業產品成本減低了百分之二點五，為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造成了真正的源泉。

一九四三年集中進行的基本建設規模共合一百九十五億盧布。新開工者計有：動力共達一百零八

萬八千基羅瓦特的渦輪一百一十九個，年產煤共達二千三百七十萬噸的煤坑若干，新鑿石油泉眼五百八十六孔，年產銑鐵共達九十五萬五千噸的熔鐵爐五座，年產鋼共達二百零四萬七千噸的馬丁爐四十七座，年產焦炭共達一百五十三萬噸的焦炭爐十五座。

一九四三年的鐵路運輸較一九四二年的晝夜平均運輸量增加了百分之七，其中煤運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經山伏爾加河的石油運輸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經山裏海和遠東地區的水運，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八。

一九四三年各種農作物的播種面積，較一九四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其中穀物播種面積增加了百分之五，洋芋和菜蔬播種面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向日葵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三，糖蘿蔔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恢復拖拉機站和提高農作物收成方面，曾展開了巨大工作。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共和國各解放區內，開始了廣大規模的國民經濟恢復工作。

上面所說在蘇聯戰時經濟普遍上年份內戰時經濟發展的情形，說明了服務於衛國戰爭的國民經濟之有計劃的擴大再生產的內容與速度。

蘇聯戰時經濟上昇的動力，乃是社會主義國家，布爾塞維克黨——列寧、斯大林黨所領導的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勞動。在蘇聯經濟中，人民的積極性被動員去完成國家計劃，每個勞動者的勞動，歸根結底是服從於一個目的的。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國家計劃，一貫是服從於社會主義國家當前時期的一定目的的。在衛國戰爭時期，戰時經濟計劃的目的，就是集中國內一切物力以澈底粉碎德國佔領者並將他們逐出蘇聯國境。

這裏還必須指出社會主義內容的國家經濟計劃的幾個特點；因為這些特點已將國家經濟計劃變為蘇聯國民經濟發展的規律。這些特點就是：

第一，社會主義計劃力量的基礎，乃是蘇聯人民、列寧——斯大林黨和蘇聯政府積極的創造性活動。國家計劃之所以具有經濟發展規律的力量，是因為它依靠國內蘇維埃全體人民的信仰與實踐，如果沒有人民、共產黨和國家底每日的創造性活動，國家計劃就成爲一堆死數字了。

第二，國家計劃力量的基礎，乃是國家集中了國內一切物資後備，用以解決聯共（布）和蘇維埃國家所提出的總任務，用以鞏固社會主義和生產手段之社會公有制，自資本主義包圍下保護蘇維埃經濟的獨立，而在衛國戰爭時期，則用以保證戰時經濟的需要。

第三，社會主義計劃之勝利決定於正確分配勞動力與物資基金，擁有足以消滅完成計劃中可能發生的生產中斷所需之資源，及保有物資生產與分配、生產與運輸之間的正確關係。不能保證這些正確關係，沒有估計到生產與分配法則的計劃，是註定要破產的。

實際上，無論戰時經濟期間或平時經濟期間，在製定社會主義計劃時所必需估計到的關於生產與分配的經濟法則是否存在呢？當然，這些法則是存在的，而且是不能不估計到這些法則的，只有了解這些經濟法則，才能利用這些法則以利於社會主義。生產費用與產品分配這一最基本的法則，在蘇聯經濟中，乃是另一種形態的價值法則。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法則即是意味着不僅要進行實物計算而且必需實行貨幣計算，必需計劃生產費用，即計劃生產社會產品的社會勞動量。這一點極爲重要，因為社會主義要求嚴格的生產計算與計劃。當還存在着國營企業與集體農莊中的勞動差別，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的差別，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時，當產品是按勞動的數量與質量進行分配時，也就必須把各種各樣的勞動折合成同一的單位——即由社會必需勞動量決定的價值。

蘇聯社會產品的價值，亦即當前國民經濟生產的總值，是以其生產費用來決定的。社會產品的實

際價值，是由社會對該產品生產所支付的費用組成的。而這些生產費用，則是由蘇聯人民對生產整個社會產品所支付的社會必需勞動量決定的。

蘇維埃經濟中的國家計劃，正就是利用這一價值法則，來在社會勞動與社會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製定必要的比例，以求符合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之任務。而蘇維埃國家則本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與解決當前任務的精神，在勞動與物資基金分配中，確定並保證執行此種必需的一定的比例。蘇聯戰時經濟基本上改變了平時的比例；在勞動力與物資基金分配中，軍事生產及與之合作的各戰時經濟部門佔據了優勢的比例。隨着經濟、政治任務之改變，勞動力與物資基金分配比例也會改變，但為解決當前任務，必須堅決遵守規定之比例。

價值法則不僅在生產範圍內有效，而在產品交換過程中亦同樣有效。如衆所週知，產品交換是藉物價之助而進行的，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物價只是產品價值或其生產費用的貨幣形態，歸根結底，也就是社會必需勞動量的貨幣形態而非其它。社會主義企業的工作者，以其工資或其它貨幣收入購買消費品，即是以其消費於生產中的一部分勞動量，去交換投入消費品中的同等勞動量。

當然，各個商品的價值與價格不相一致也不可能一致，但當前蘇聯國民經濟全部產品價格總數，却不能不與這些產品的生產費用，亦即與總的社會勞動量相一致。因此，不可能分得與換得較所生產者，或者說是較諸社會所支付於社會產品生產上的勞動為多的東西。

價值法則不僅在產品分配中有效，而且在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間勞動本身的分配中亦同樣有效。在這裏，國家計劃即利用價值法則，爲着社會主義的利益而在各經濟部門間正確分配社會勞動。在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計劃中，亦即在蘇聯國民經濟的國家計劃中，必須遵守工業與農業間的，生產手段的生產與消費品的生產間的，生產之增長與運輸之發展間的，資本積累與消費間的一定的對比。

如果將蘇聯社會主義生產分作生產生產手段的第一部分與生產消費資料的第二部分，那就顯然可以看出，蘇維埃國家爲第二部分企業所支出的生產手段之價值，在計劃所規定的相當程度上，必須符合於爲第一部分企業所支出的消費資料的價值。實際上，如第一部分企業沒有消費資料，而第二部分沒有生產手段，則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遂成爲不可能。因爲如此，則生產生產手段的企業之工作者就沒有消費資料，而生產消費資料的企業之工作者們也沒有生產手段，即沒有燃料、原料和裝備。

由此可知，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法則乃是服務於國家計劃的，別種形態的，產品生產費用、分配、交換底最基本的法則。

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價值法則與資本主義各國價值法則間，有着原則的區別：

第一，在蘇聯，在創造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與創造價值的抽象的社會必需勞動間沒有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一矛盾則是危機的胚胎。在蘇聯，在創造一定使用價值的工人具體勞動與創造價值的社會必需的抽象勞動間沒有矛盾，是因爲具體形態的勞動，老早即根據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的利益，在各生產部門間按照計劃分配妥當了，因此，它是社會所必需的，是社會必需勞動總量之一部分；

第二，在蘇聯，在生產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各企業間沒有利益衝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這種衝突是由生產手段的私人佔有造成的，它總是要導向破壞性的競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歸根結底則導向危機。蘇聯社會主義各企業間的產品交換，乃是商品的價值交換。每個社會主義企業都有事先按照計劃預定的買主，產品之出售是有保證的，它與資本主義的競爭相反，而實行合理的合作與競賽。然而各種形態的具體勞動——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國家企業中的勞動與集體農莊內的勞動，只能作爲價值，作爲投入產品生產，表現於蘇聯貨幣中的社會必需勞動的凝固物而交換。

第三，在蘇聯，在直接用於私人消費的社會產品價值部分，與用於擴大生產或資本積累的另一部

分社會產品價值之間是沒有矛盾的，因為二者都屬於全體勞動人民。因此，在蘇聯，用於資本積累的價值部分，是爲了擴大再生產的，是經濟上所必需的，沒有它就不可能發展經濟。

第四，在蘇聯已消滅了產品價值與利潤率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這一矛盾總是使得許多企業，甚至許多工業部門，由於經濟危機，其商品價值，或商品的生產費用不能獲得平均利潤，因而垮台了。如衆所週知，在蘇聯，平均利潤率却不成其爲法則，它也不能決定社會主義各企業或整個生產部門的發展。

第五，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價值法則在其發展中總會引起矛盾與衝突，而這些矛盾與衝突，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盲目運動的唯一源泉。資本主義的盲目矛盾，如同一個肆無忌憚的巨人，把人民從這一危機驅向另一危機。在蘇聯經濟中，國民經濟運動與發展的源泉，乃是製定計劃的社會主義國家。它代替了那些盲目的矛盾與運動力量，解決和消滅那些發生於蘇維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主義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與所達到的生產水平之間的矛盾。解脫了私人佔有制之束縛的蘇聯人民的需要，乃是發展生產與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的巨大動力。

這就是爲什麼在蘇維埃經濟中，與資本主義經濟不同，產生了前所未聞的新課題——即生產計劃及與之有關的在整個國民經濟範圍內組織生產的問題。與論述運動之自發規律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相反，社會主義底政治經濟學（包括戰時經濟期在內）則是研究組織生產與製定計劃之經濟法則的。因此，基於合理利用與採取生產與分配諸經濟法則的社會主義計劃性本身，就是發展底社會法則，因此它乃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91
衛國戰爭時期蘇聯經濟發展規律，有時不得不強加和賦予以片面的軍事性質。如很顯然的，同樣商品零售價格的不一致（這與定量配售制有關）是與價值法則矛盾的。戰時經濟時期結束以後，定量配

售制已無必要，價格的不一致已經成爲有害的東西，於是便要拋棄它，而保證商品流通之正常發展，最後便要按商品的價值規定物價。

蘇聯戰時經濟對於社會主義的計劃及組織企業生產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在戰後時期，爲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應仔細研究並充分利用這一經驗。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是正確地選擇與配備幹部開始的。斯大林式的選擇幹部，即是說根據幹部的才能，專長和其對於工人階級事業及祖國的忠實性來選擇幹部，反對依『親友關係』或挑選『自己人』的原則來選擇幹部。

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各工業企業的計劃與組織生產中，必須指出其下列特點：

第一，改訂計劃，保證對計劃的執行作實際有效的檢查，保證首先滿足軍工生產各決定性部門，特別是重工業和運輸部門的需要。

第二，全力發展冶金與鍛冶及壓榨工場，有了這些工場就保證了各企業生產的迅速改造以完成前綫定貨，例如擁有自己的冶金企業及鑄造場與鍛冶場的軍械工業就是如此。

第三，發展工具和車床生產，在各工廠企業中組織強大的工具生產和車床生產的車間，這就能保證我們迅速獲得新的生產品與創造出增加生產所必需的速度。

第四，組織對各企業所需材料之不斷供給，保證各企業在其各個生產階段中所需之原料、五金、燃料、半製成品之儲備；對整個生產過程都要供給原料、半製成品和各種零件。整個生產過程中這一階段或那一階段之最小的中斷，都會影響到產品的出產和整個企業以後的工作。

第五，在生產中採取按進程表工作的方法，這種進程表不僅規定製成品之出產，而且規定其零件與半製成品之出產；只有計劃了技術過程所有階段中零件與半製成品的生產，才能在生產各階段中保證各企業完全按照規定的進程表出產製成品。這種進程表的技術基礎，乃是在戰時獲得了廣泛發展的

流轉式生產組織法。

第六，各製造廠間的先驅與模範作用。各先進企業中各製造車間的工作總是走在各裝配車間之前，並推動產品的出產；沒有強大的製造車間，保證供給各個生產階段以半製成品、鍛冶品、與零件，各企業之各裝配車間便注定要發生歇工現象。

第七，遵守經濟核算，計算盈、虧，減少生產費用。經過與共同方針和共同任務結合的獎勵個人積極性的方法，全力提高產品之出產，乃是增加生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只有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千百萬人的自動性與積極性的社會主義競賽才能獲得巨大力量。

成熟的生產計劃與生產組織之最重要的標幟，乃是在生產與流通，動力與製成品，勞動力與機器各方面都建立了後備。蘇維埃政府，首先是斯大林同志，對積累國家物資後備，給與了特殊意義。衛國戰爭前，根據斯大林同志的直接指示，曾製訂與實行了國家積蓄與動員後備資材，特別是儲蓄與動員石油產品，有色五金，糧食的計劃。經驗證明，在現代戰爭中，誰擁有生產後備，誰擁有人力、原料及其他物資後備，誰就能獲勝。

衛國戰爭前的一年半期間，蘇聯國家物資後備，由四十億盧布增至七十六億盧布，在衛國戰爭初期，曾將這些物資後備——其中包括糧食和燃料——轉移至蘇聯東部地區。在衛國戰爭時期，這些國家物資後備對於蘇軍與蘇聯國民經濟會給予了巨大幫助。

在生產與流通方面有了後備，這就保證了蘇聯國民經濟發展的穩定的計劃性。沒有這些後備，價值法則就要施展其盲目活動了。有了這些後備，就使社會主義國家有力量在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利盆下管理這一法則。由於缺乏足夠的後備，首先是燃料，五金和原料等，使很多企業在冬季，當原料與燃料之運輸困難時，屢次地大大地減低了生產的發展。

由於許多企業的器材儲備不足，因而在冬季減低生產發展速度的結果，使國家損失了大量產品，其價值，較之於因積存之燃料、五金、原料等備而未用的損失還大。戰前一九四〇年第一季工業產品總量較上年（一九三九年）第四季減少了百分之十二。一九四三年戰爭年份內第一季工業生產總量，較一九四二年第四季減低了百分之十二。因一九四〇年第一季較上年——一九三九年第四季生產減低的結果，蘇聯國民經濟損失了三十七億一千萬盧布的工業品。一九四三年第一季與一九四二年第四季水平相較，則損失了三十四億三千九百萬盧布的工業品，並且在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四三年中，僅只在其第二季中達到了上年的生產水平。由此可知，有半年的時間是損失掉了，而沒有能使生產發展。產品與生產速度之這一巨大損失，是能夠以在工業與運輸部門內建立真正的物資後備與原料、燃料和五金儲存的方法來克服的。儲存的物資基金之暫時凍結，是完全可以用提高一切工業部門生產速度的辦法來補償的。

在建築方面，由於基本建設規模在每年第一季均較上年第四季減少的結果，蘇聯國民經濟也遭受了不小損失。在一九四一年第一季中，基本建設規模較一九四〇年第四季減少了五十五億盧布。在一九四三年第一季中，基本建設的規模較一九四二年第四季減少了二十六億盧布。因此，在一年的頭三個月中，大部建築機械殲化了，建築工人歇工了，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的速度受到了限制。結束這一惡劣現象的方法，就是在一年之初，一定要在建築者手中儲存器材，轉向工業建設，教建築工人學會兩、三種相近的業務。

因此，生產計劃的任務就是增加工業與運輸中的器材儲備，首先是消滅冬季期間建築與生產發展的減低。這就可以為蘇聯國民經濟創造出另一增加國民財富的補充源泉，並加速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的速度。

由此可知，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之前提，就是了解生產與分配的經濟法則和善於爲社會主義的利益而利用這些法則。蘇聯國民經濟計劃的經驗，要求建立正常的器材後備與儲存，作爲消滅生產發展中的季節性減縮和加速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速度的條件。

國民經濟底損失

擊潰希特勒德國之後，蘇聯人民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即是戰後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的問題。而戰後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就是說要在戰後發展的短期內，完全恢復各解放區國民經濟，並超過蘇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之戰前水平。

蘇聯人民肩負了非常重大的歷史任務——即於短期內恢復各解放區國民經濟，治癒希特勒帶給我國人民的創傷。曾被敵人暫時佔領過的蘇聯地區，在戰前蘇聯全部領土中佔居相當大的一部份，其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工業總產量佔百分之三十二，播種面積佔百分之四十七，牲畜（按大牲畜計算）佔百分之四十五，鐵路綫佔百分之五十五。

由於希特勒德國進攻我國的結果，蘇聯國民經濟所受的物質損失如下：

- 第一，直接的財產損失，即被佔領者毀滅與劫掠之基本基金與流動基金之損失；
- 第二，直接的軍費與因戰爭及國民經濟改造所引起的額外開支；
- 第三，被佔領區因生產停止而引起的產品及國民收入之損失；
- 第四，由於作戰傷亡及佔領者虐殺蘇聯居民所造成的人力損失，及隨之而來的戰時和戰後國民收

入之減少。

希特勒德國及其衛星國給予蘇聯國民經濟的物質損失，首先表現在被佔領區內部分蘇聯居民之被虐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達維亞、拉托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卡里利亞——芬蘭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解放區域鄉居民，在被敵佔領時期大大減少了。被佔領區的城鄉居民有的疎散至蘇聯東部地區，未及疎散至國家後方的，爲免於德佔領者的虐待，即隱藏在森林中打游擊。雖然如此，但在被希特勒德國佔領過的各區域中，由於德寇之虐殺及因被佔區之飢饉、疾病而造成的高度死亡率，使許多蘇聯人死去，或者被驅至德國作奴役，遭受恐怖、飢餓與疲憊不堪的勞動。

蘇聯人民之死亡及由此引起的蘇聯勞動後備之減少，使得戰後國民收入亦受到了損失。如以戰前國民收入水平及居民壽命率爲基準來衡量，那末，在被德寇佔領區及在德國服苦役中因大批虐殺及居民死亡而引起的無可挽回的國民收入之損失，乃是一大筆賬。而受過德寇奴役的各區蘇聯人民的苦痛，則是無可衡量難以計算的。

希特勒德國及其衛星國給與蘇聯國民經濟之物質損失，還表現在對各被佔區的蘇聯基本基金及流動基金的破壞與劫掠上面。在被佔領過的各地區中，被全部或部分毀壞與劫掠了的工廠，工場及其他工業企業數達三萬一千八百五十所，（小企業與小作坊尙未計算在內；）蘇維埃農莊一千八百七十六處，機器拖拉機站二千八百九十處，集體農莊九千八百處，商店、食堂、飯館及其他商業企業二十一萬六千七百處，鐵路車站四千一百個，郵電機關、電話站、無線電站及其他通訊連絡企業三千六百處，病院六千處，醫療處、診療所和門診處等三萬三千處，療養院九百七十六處，休養所六百五十六處，小學及中學八萬二千所，各種專科學校及機械工程學校一千五百二十所，高級學校三百三十四所，科學研究院及其他科學機關六百零五處，博物館四百二十七所，公共圖書館四萬三千所，戲院一百六十七處。

被德佔領者及其幫兇毀壞或自被佔區劫掠之截鐵機十七萬五千台，鍛錘和壓榨機三萬四千件，鑿孔機二千七百件，氣鑽一萬五千具，發電動力五百萬基羅瓦特，熔礦爐六十二座，馬丁爐二百一十三座，織布機四萬五千架，紡錠三百萬錠。給予了蘇聯最寶貴的基本工業基金以物質損失。

對於蘇聯農業也給予了不少的物質損失。在各被佔領區，自總數一千一百六十萬匹馬中，七百萬匹被德寇宰殺與劫走了，自總數三千一百萬頭牛中，一千七百萬頭被宰殺了，自總數二千三百六十萬口豬中，二千萬口被宰殺了，自總數四千三百萬隻羊中，二千七百萬隻被宰殺了。破壞了農業機械化的冶金基地：在各被佔區，佔領者毀滅及劫掠了十三萬七千架拖拉機，四萬九千架複式收割機，四萬六千架穀物播種機，三萬五千架複式及半複式打穀機。毀壞了二十八萬七千個集體農莊的牧畜建築，五十萬五千海克脫果園及十五萬三千海克脫葡萄園。

在各被佔地區，交通運輸及郵電通訊被德佔領者破壞了，交通工具被毀壞與劫掠了。在戰前蘇聯各地區十二萬二千公里鐵路中，有六萬七千公里的鐵軌被佔領者破壞或劫走了。毀壞了一萬五千八百個機關車，四十二萬八千節車廂。佔領者毀壞，沉沒與劫去了四千二百八十艘內河客、貨輪船，技術輔助艦隊船隻及四千零二十九隻曳引船。二萬六千座鐵路橋樑中有一萬三千座被破壞了。被佔區所有二百零七萬公里之電報電話綫均被德寇毀壞或掠走了。

蘇聯人民之住宅則遭到炸毀或焚毀等野蠻毀壞，被佔各城市二百五十六萬七千所住宅中，有一百二十萬零九千所被毀壞了，按其所佔住宅土地面積，則佔上述各城市住宅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被佔區一千二百萬所鄉村住宅中，有三百五十萬所被德寇破壞或毀滅了。

德佔領者毀滅與劫走了儲存的商品，農產物，半製品，原料，燃料，器材，製成品及其他寶貴物資。被佔區居民家產有一半以上被德寇毀滅與劫去了。

總計起來，蘇聯財產損失，即基本基金與流動基金的損失，或說是由於在戰爭時期各被佔區內國家財產，合作社與私人財產之被毀壞與被掠奪而給予國家及人民之直接損失，按戰前國定價格計算，共達六千七百九十億盧布或一千二百八十億美金。與各被佔區戰前所有蘇聯國家財產相比，財產損失約佔三分之二。

此外，蘇聯國民經濟所受之物質損失還有：

1、直接的戰費及因戰爭與國民經濟改造而引起的額外開支，其中包括軍事建築及軍工生產費用，防空費用，各企業之往返遷移費用及軍隊薪俸。

2、衛國戰爭時期，由於被佔區生產停頓而造成的居民收入及社會主義企業收入上之損失。這種物質損失，即直接的軍費及因戰爭而引起的額外開支，衛國戰爭時期國民收入及社會主義企業收入上之損失等，按戰前國定價格計算，共達一萬八千九百億盧布，或三千五百七十億美金。

希特勒德國及其幫兇給與蘇聯國民經濟之物質損失，還表現在蘇聯各被佔區因生產停頓而造成的產品、國民收入及國家收入上之損失。衛國戰爭時期，在被德寇佔領的大塊地區內，國家企業與合作社企業都停止了生產。這些被佔區被蘇軍解放後，其生產規模於長時期內仍低於戰前水平。結果使得蘇聯大量商品生產不足。

在衛國戰爭期間，僅就生產不足額，亦即被佔區及被佔之各蘇聯企業中國民經濟之損失計，即有三億零七百萬噸煤，七百二十億瓦時電力，三千八百萬噸鋼，十三萬六千噸鋁，五萬八千架拖拉機，九萬架截鐵機，六千三百萬生丁納糖，一百一十億普特穀物，十九億二千二百萬生丁納洋芋，六千八百萬生丁納肉和五億六千七百萬生丁納牛奶。即令這些被佔區域與被佔企業的生產，仍停留在一九四〇年的水平，也可以產出這樣大量的商品。

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在其整個過去歷史及在此次世界大戰中，都沒有像我國一樣，遭受如此巨大的損失及侵略者如此野蠻之破壞。

蘇聯人民正在以其英勇的勞動恢復蘇聯國民經濟，超過戰前生產水平並要在經濟方面趕過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蘇聯人民正在表現出非凡的勞動意志與緊張的精神力量，勝利地解決着這些歷史任務。

希特勒德國給予蘇聯人民的物質損失，僅以自德國遷往蘇聯之工業裝備，得到微乎其微的補償。這一機器裝備的價值，總共僅佔衛國戰爭時期蘇聯直接財產損失數目的百分之零點六。重新達到並在較高程度上超過戰前物質與精神文化之繁榮這一任務，蘇聯人民正在以其創造性的英勇勞動解決着。恢復蘇聯各解放區之生產與消滅德寇佔領遺跡的工作，正在那於衛國戰爭時期業已證明其鞏固性與對資本主義經濟之優越性的社會主義生產基礎上進行着。『我們必須完全消滅各解放區內德寇統治的遺跡。這是一件巨大的全民的任務。我們可以而且必須於短期內解決這一困難任務』（斯大林）。

要恢復各被佔區工業生產之戰前水平，便需要將解放區整個工業生產，較一九四四年這些地區所已達到之水平增加至五倍半，煤產增至四倍，電力生產增至六倍以上，特等鋼增至九倍以上。蘇聯各解放區工業恢復工作，特別是生產工具之生產恢復工作規模就是如此。

為要將解放區農業生產恢復到戰前水平，必須使這些地區的穀物收穫總量較一九四四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向日葵增加百分之六十，亞麻纖維增至三點三倍，糖蘿蔔增至四倍以上，牛必須增至一九四四年水平之一倍半以上，豬必須增至四倍，山羊和綿羊必須增至二點二倍，馬必須增至二點六倍以上。為保證這一任務之完成，需要全力鞏固集體農莊與機器拖拉機站底組織與經濟，需要供給農業以機器，拖拉機與肥料。

爲要恢復解放區的鐵路及河運，保證國民經濟的運輸，必須將這些地區鐵路的晝夜平均運輸量增至一九四四年的二點三倍，內河運輸量增至九倍，必須完全恢復起鐵路，交通工具，船隊並盡力增加機車、車廂和造船生產。

爲在解放區創造居民正常的物質及文化生活條件，爲恢復城市、鄉村及戰前住宅建築，僅在解放區各城市中，即須修復與建造六千萬平方米以上面積的住宅。如若高度工業化的，從事大批生產的各工廠不建立起住宅或其主要建築，就不能期望於數年內實現這一任務。

只有在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及勞動人民廣泛發揮其自動性與積極性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於短短的歷史時期，解決恢復各解放區國民經濟的這一如此巨大的任務。蘇聯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正在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及壟斷資本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實施着。但蘇維埃國家並不拒絕參加各種國際組織，只要它們不強求干涉蘇聯內政，不與蘇聯國民經濟的經濟制度相抵觸的話。

可是，當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果的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經驗證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了財的美國底『援助計劃』，實際上，乃是奴役歐洲，使西歐各國經濟服從美國壟斷資本統治的計劃。

蘇聯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過去是，現在也仍舊是脫離資本主義世界而獨立，依照自己的特殊法則而發展的。蘇維埃經濟之發展是決定於國家的社會主義計劃，並受其指導的，這一計劃之居於統治地位，是基於主要生產手段及商品儲備集中於國家之手。蘇維埃經濟之發展，決定於蘇聯國民經濟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經濟獨立政策，決定於旨在全力發展本國生產力的政策。蘇維埃國家經濟之發展，是建築在因生產手段之社會主義所有制佔統治地位而產生的國家統治對外貿易的基礎上的。誰若想與蘇聯發展經濟關係，他就應當考慮到蘇聯經濟的這些特點。

由此可知，擊潰了德帝國主義的蘇聯國民經濟，曾付出了因戰時損失及戰時費用而引起的巨大開支。由於社會主義制度之優越性，蘇聯將於短期間消滅德寇佔領的痕跡，各解放地區的國民經濟恢復工作，正在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法則的基礎上進行着。

社會主義底經濟勝利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蘇聯抗德的衛國戰爭中，受過了檢查及偉大的考驗。蘇聯在衛國戰爭中證明，了自己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對資本主義德國的優勢。帝國主義德國底軍事失敗不僅意味着蘇聯對希特勒德國的軍事、政治勝利，同時也是蘇聯對希特勒德國的經濟勝利。『如同紅軍在長期而殘酷的單獨對德作戰中取得了軍事勝利一樣，蘇聯後方勞動者們，在其與希特勒德國及其幫兇的殊死鬥爭中，取得了對敵的經濟勝利』（斯大林）。

希特勒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較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帝室親王們的德國動員了更爲巨大的物質資源。希特勒德國在其掠奪戰中，利用了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曾長期被德寇奴役的整個歐洲大陸的生產力。資本主義德國既然已被摧毀，這就證明在單獨對德作戰中取得了勝利的這一力量，乃是新生的最偉大的力量。這一力量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是工、農社會主義國家。

必須記住，保證蘇聯獲得對希特勒德國經濟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底各種歷史特點。這些特點之一，就是由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產生的，建築在消滅了主要生產手段之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希特勒德國則是生產手段私有制的國家，是資本主義經濟上層與國家政治機關之結合表現得

最明顯的國家。在蘇聯，在列寧、斯大林的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政策基礎上，建立了主要生產手段之社會公有佔居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社會。建築在經濟發展之計劃法則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保證了動員國民經濟底一切後備力量從事於反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事業。

社會主義國家底另一個特點，就是剝削階級之消滅及蘇聯各民族間有着不可摧毀的兄弟般的友誼。在衛國戰爭時期，蘇聯各民族精神上、政治上之團結較諸任何時候都鞏固。在前綫，在後方，蘇聯各民族團結成爲一個統一的英雄戰士的營盤。而希特勒德國後方則完全是另外一種景象。如衆所週知，歐洲各被奴役民族中最積極的份子之反抗希特勒德國的游擊運動，是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的。這不能不削弱希特勒德國的基礎。

工人、農民、蘇維埃知識份子英雄主義的勞動，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底特點。紅軍後方的勞動者們，爲保衛自己祖國的自由與獨立，在保證前綫需要上，表現了英雄主義的奇蹟。工人、農民、蘇維埃知識份子底勞動，如同英勇紅軍在前綫的戰鬥功勳一樣，也將作爲偉大的功勳而載諸衛國戰爭史。工人、農民、蘇維埃知識份子英雄主義的勞動之所以成爲可能，是由於在蘇維埃國家中消滅了剝削階級和社會主義取得了勝利的緣故。與蘇聯人民這種統一及勞動功勳相反，受德國資本主義剝削的德國工人的勞動，以及希特勒德國在其佔領區及被奴役的各歐洲國家內動員起來的新奴隸們的勞動則是奴役的不自由的勞動。

社會主義經濟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而在技術、經濟上的獨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底一個特點。蘇聯並不拒絕參加世界勞動分工與國際貿易。但蘇維埃經濟制度鞏固的基石則是其經濟的獨立，及在危急時期動員全國巨大後備和以本國生產保證本國需要的能力。沒有任何一種現代機械、機器，與原料是蘇維埃經濟所不能生產的。蘇聯已完全不受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盲目性、危機、失業、貧困之影響。

由於希特勒德國戰時經濟曾利用了幾乎整個被其奴役的歐洲之生產力，所以社會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勝利就顯得更爲巨大了。希特勒德國在法國、荷蘭、和比利時掠奪了約八百八十萬噸石油產品，此外還強佔了年產五百五十萬噸的羅馬尼亞石油工業。它攫取了法國的戰略物資儲備——四萬二千噸銅，二萬七千噸鋅，一萬九千噸鉛。歐洲被佔領各國大大地增加了希特勒德國軍事工業的生產力。僅只捷克什科達一地企業之軍工生產即可供給約四十至五十個德國師的各種裝備。希特勒德國利用了意大利及各被佔領國年產約六十萬輛汽車的汽車工業之生產力。希特勒德國自各被佔領國中還掠奪了大量的機械裝備及鐵路交通工具，而且僅在其佔領的頭二年，即自法國運走了五千個火車頭和二十五萬節車廂。希特勒德國自被其奴役的各歐洲國家中掠奪了豐富的工業原料與糧食儲備。

據美國戰時經濟管理局估計，到一九四一年爲止，希特勒德國在其佔領區所掠奪的財富總數，計達九十億英鎊，即等於戰前德國每年國家收入之二倍。此外，希特勒德國在其國內還利用了數達一千二百萬的外國工人，補充了它自生產中大量抽調參軍的工人。

到蘇德戰爭爆發時，希特勒德國會急劇增加了自己的軍事、經濟後備，在以後，一九四二及四三年兩年戰爭期間，歐洲各被佔領國又作了希特勒德國在蘇德戰場上損失的實際補給基地。

那種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德國底破產首先乃是德國『經濟不斷衰退』之結果的斷言（如一個時候某些經濟學家所『論證』的），是與實際毫無共同之點的。這一斷言，與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法則是不相容的，這一法則並不否認在總危機與蕭條的背景上，藉助於對被奴役的歐洲各國之掠奪及其工人階級之貧困，希特勒德國會有其暫時的繁榮與富裕。可是自『經濟衰退』論中却不能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德國獲得暫時軍事勝利之原因。而蘇聯爲摧毀希特勒德國所作的非凡努力也成爲不可理解的了。實際上，希特勒德國之所以被摧毀，是因爲它遇到了較它更爲強大的敵人——蘇

聯，這是一個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都非常強大的敵人。

英勇的蘇聯紅軍，不僅是加速了希特勒德國底『經濟衰退』，並且是摧毀敵人經濟基礎的原因及主要力量。『在目前戰爭中的德國及其法西斯軍隊，是較過去歷次戰爭中的德國及其軍隊都更爲強大，更爲兇惡，更有經驗的敵人。並且，德國在這次戰爭中還利用了幾乎整個歐洲的生產力及其衛星國相當龐大的軍隊。儘管德國有這些有利的作戰條件，但它終於走向了不可避免的死亡，那末，這就必須以其主要敵人——蘇聯在力量上超過了希特勒德國這一理由來解釋。』（斯大林）這一論點，就推翻了那種關於德國之潰滅乃是其什麼『經濟衰退』之結果的斷言。

在曾被德寇暫時佔領過的部分蘇聯領土上，其戰前生產佔全國工業的百分之三十三。這裏還須再加上臨邊前綫地區或直接作戰地帶的百分之三十三的工業。由此可知，在衛國戰爭中，有百分之六十六的蘇聯工業生產遭受破壞或者停工了。可是蘇軍每日却自蘇聯軍工生產部門獲得日益增多的武器、坦克、飛機、彈藥，而戰時經濟則不斷地鞏固起來。所有這些都說明，社會主義國家底經濟基礎，較諸資本主義的希特勒德國底經濟機構是無可比擬地穩固而富有生產力的。

蘇聯國民經濟雖然受了巨大損失，但在戰時經濟期間，仍進行了巨大速度的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關於這一點的證明就是，一九四四年戰爭期間，蘇聯東方各區工業生產總量曾增爲一九四〇年的二點八倍，在同一時期，軍工生產則增爲六點六倍。關於衛國戰爭時期擴大再生產速度之高，可由蘇聯於戰時經濟的四年間，對國民經濟之重要投資計達一千一百三十億盧布一事來證明。

蘇聯戰時經濟底生命力是建築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這一基礎之上的。可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價值法則、市場價格、盈虧核算等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的作用。蘇聯經濟學家嚴格地遵守着馬列主義這一基本原則，即社會主義社會的標幟，就是剝削階級與主要生產手段私有之消滅。因此，社

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並不是取消而是允許勞動收入、住宅及家產、私人消費品等的私人所有的。非但如此，而且私人儲蓄、住宅、私人用具等的私有權，乃是蘇維埃經濟發展的補充刺激劑。

在蘇維埃經濟中，價值法則僅在社會主義的生產與再生產方面有其相當的作用。在價值法則及其供求法則的影響下形成的集體農民市場的市場價格，並不能取消在蘇維埃經濟中，大部商品由蘇維埃國家根據社會主義生產與再生產的利益，根據提高勞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而決定價格的原則。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盈虧核算不僅不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相抵觸，而且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真正刺激，因為它可以促進利潤的增加，因之也就是促進資本積累之增加，沒有資本積累是不能發展生產與再生產的。

外國經濟學家們，常以必需保存自由競爭作為經濟動力的說法，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辯護。在蘇聯，資本主義競爭被消滅了。可是蘇維埃工業的發展速度却大大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發展速度。可見是有新的更有力的刺激經濟發展的東西。在蘇聯計劃經濟中，這些刺激物就是蘇聯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及不斷增長的滿足這些需要的物資。同時這也包括工人、集體農莊莊員、知識份子們的強有力的社會主義競賽和對社會主義勞動者的物質獎勵制度。蘇維埃勞動者們應當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來保護和發展自己生活的基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為要使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不可能再發生反對社會主義祖國的新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和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必須解除各帝國主義侵略國之軍事武裝與經濟武裝，必須團結反帝國主義的民主國家陣營。不應忘記，各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就是產生侵略戰爭及其指導者的。帝國主義戰爭，歸根結底不過是物資生產中野蠻競爭的表現。帝國主義之侵略蘇聯，乃是階級鬥爭在國際舞台上的繼續。由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各帝國主義侵略國家，正企圖將各民族拖入新的血腥的戰爭——第三次世

界大戰。鑒於這種危險性，蘇聯人民應當表現出高度的警惕性，以衛國戰爭的英勇傳統精神教育蘇聯青年，研究戰時經濟的經驗並保證蘇聯國民經濟的動員準備。

由此可知，社會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勝利，乃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底偉大生命力和進步性的表現，是意味着它有其偉大的將來。保護這一制度與發展其強大的生產力，乃是蘇聯各族人民的神聖職責。

戰後社會主義經濟

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的偉大保衛祖國戰爭，以澈底粉碎希特勒德國而勝利地結束了。隨着歐洲戰爭的停止，遠東戰爭也以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而告終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後，便開始了由戰爭轉向和平的過渡。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這一過渡通常是以危機與大批失業而完成的。但蘇聯經濟却具有這樣一個優越的特點，使蘇聯國民經濟之戰後改造既不會發生危機，也絕不會發生失業現象。

在蘇聯，由戰時經濟過渡到和平經濟，並沒有發生危機與不景氣，因為蘇維埃國家有計劃地解決了國民經濟戰後改造中的下列任務：

第一、確定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各企業間的比例，與戰時經濟期間不同的新比例。

十分顯然的，戰前和平時期蘇聯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比例，是不會完全重複於戰後時期的，但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之基本法則，仍是戰後恢復與發展蘇聯國民經濟中所必須遵守的。這些法則表明，必須首先並儘快地恢復與發展冶金業，燃料業，電力工業，鐵路運輸業，以及保證我國在技術、經濟上

獨立的本國機器製造業。

第二、重新分配勞動力與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基本基金與流動基金。

這就是說，較諸戰時經濟期間，必須更提高蘇聯國民經濟平衡中的重工業與鐵路運輸業的比重，同樣必須建立國民經濟中的，首先是工業與運輸部門的物資儲備，保證消滅增產中的季節性停滯，並防止國民經濟中各部門失掉平衡的現象。

第三、利用大部軍工生產動力以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

這就是說，在衛國戰爭期間，從事於軍工生產的成千成百的大企業改而生產重工業與交通運輸的機器裝備，生產拖拉機，農業機器與肥料，生產廣泛必需品。

第四、增加國民收入中的資本積累部份，因為沒有資本積累，要迅速恢復與加強國民經濟的發展是不可想像的。

這就是說，由於軍費的縮減，作為資本積累與再生產用的社會產品增加了。戰後蘇聯經濟的發展，將要遠遠地超過戰時經濟期間資本積累與基本建設的規模。

第五、提高勞動人民的消費水平，使工廠工人恢復和平時期正常的工時制度。這就是說，要取消義務加班工作，恢復職工正常的休息，增加消費物品。

戰後蘇聯國民經濟的改造，一般地表現在蘇聯預算的構成比例上。如果說在戰前一九四〇年蘇聯軍費的開支佔整個預算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五，那末在戰時一九四四年則增為百分之五十二了。自那時起，軍費在蘇聯預算中所佔比例即減少了，到一九四六年，軍費僅佔預算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九。由於國民經濟的改造，蘇維埃國家會額外支出了相當多的費用，因為當各企業在由軍事生產過渡到和平生產時，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這時間內，許多工人不能充分發揮其勞動生產力，機器也不能充

分發揮其生產能力。與在生產改造期間解僱工人，將工人驅入失業大軍的資本主義企業不同，社會主義企業則幫助工人提高技術，並在生產進行改造期間支付給工人以平均工資。

我們的任務在於將進行國民經濟改造所需之費用減至最低限度，縮短進行改造所需之時間，保證進行高速度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之高速度增長，主要是賴於各物資生產部門之間，生產與消費，資本積累與國民收入，工業與農業，生產與運輸之間的正確關係（比例）。國民經濟發展上的不平衡，就會降低生產與再生產的速度。例如，生產水平與運輸規模之間的不平衡，就可能使國民經濟陷於停滯。爲要防止這種不平衡，就必須經常關心交通運輸事業，建設新的交通運輸路線，生產並增加交通工具，改進運輸技術。

爲要迅速消滅既已發生的不平衡現象，或克服經濟困難，在國民經濟中必須具備大量的物資後備。要是否認在蘇聯經濟發展中發生各部門間不平衡或困難的可能性，那是很幼稚的。避免這種部門間不平衡與困難的保障，就是要在國民經濟中具備物資後備。有遠見的計劃與蘇聯國民經濟平衡，必須考慮到這些物資儲備與物資後備的積蓄。

對於防止國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與解決新的經濟任務說來，有遠見的國家計劃是有重大意義的。對於蘇維埃經濟，這乃是一條經過考驗的，有計劃的擴大國民經濟再生產的道路，是有組織的強有力的發展生產的道路。

戰後恢復與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規定，要完全恢復蘇聯前被德寇佔領各區之國民經濟，並消彌希特勒德國帶給蘇聯國民經濟與蘇聯各族人民的損失。戰後五年計劃規定，在恢復各解放區生產，與更進一步發展蘇聯全國各區，特別是西伯利亞與遠東生產的基礎上，全蘇國民經濟要超過戰前發展水平，其中工業品的生產，則要增至一倍半。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保證首先恢復與發展重工業與鐵路運輸業，因為沒有重工業與鐵路運輸，就不可能迅速地、順利地恢復與發展蘇聯整個國民經濟。必須克服鐵路運輸落後於蘇聯國民經濟日益增長的需要之現象，必須以改造交通運輸的機器裝備，在最重要的鐵路綫上採用內燃機車與電力機關車的方法消滅鐵路運輸所遭受的季節（冬季）困難。

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廣泛開展被希特勒德國破壞的各蘇聯城市與鄉村之恢復與建設工作，為此須先建立高度工業化的生產基地，大量建築住宅，與生產各種建築材料。

戰後恢復與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規定，要提高農業生產與消費品工業，並在此基礎上，於五年內把國民經濟提高至戰前水平的一點四倍，在國內生產大量糧食與廣泛必需品，保證提高蘇聯人民的物質生活，取消商品的定量配售制。

在人民物質生活提高，保證普遍學習與經由電氣化及自動化以發展物資生產技術的基礎上，我們必須在提高工人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先進的領導力量底文化技術水平方面更前進一步，使之達到工程師技師的工作水平。

必須在費勞力的生產部門高度機械化，國民經濟更進一步電氣化，城市與工業瓦斯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蘇聯工業、運輸業與農業技術。必須保證廣泛發展國民經濟的現代先進技術：巨大動力的經常地遠程輸送，生產技術過程中採用氧氣與電流，利用與發展自動機械、噴射機械與原子能，儘量發展無線電設施，利用與採用赤外線裝備，發展各種合成物的生產。

戰勝敵人結束戰爭以後，蘇聯即進入其經濟和平發展的新時期。現在擺在蘇聯人民面前的任務，就是鞏固已得的陣地，並繼續向新的經濟繁榮推進。我們不能以鞏固這些陣地為限，因為這樣就會停滯不前，我們必須更向前推進一步，為國民經濟之新的更高的繁榮創造條件。我們必須於最短期

內，醫好敵人帶給我國的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的戰前水平，以便於最近期間，大大超過這一水平，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狀況，並更進一步鞏固蘇維埃國家的軍事、經濟力量」（斯大林語）。

各資本主義國家在過去與現在曾不止一次地企圖竊取蘇聯國民經濟計劃的經驗。很難找出一個國家是不曾企圖計劃自己的國家經濟的。各外國嚮往於計劃經濟，並不是偶然的事。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周期重複着的工業危機中得來的教訓。蘇聯國民經濟計劃與各資本主義外國國家經濟「計劃」的原則區別，在於蘇聯的國民經濟計劃是建立在生產的社會方式這一基礎之上的。在這裏，組成蘇維埃國家的人民掌握了社會發展規律，其經濟計劃是有科學根據並有法律力量的。但建立在生產手段私有制基礎上的各資本主義外國的「計劃」，則只是一種無任何現實經濟力量作依靠的願望。

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間，曾制定過美國戰後經濟建設計劃的「美國國家物資計劃局」的命運，是值得注意的。該局於一九四三年即已不復存在了，因為美國國會拒絕支付該局用費。然而該局停止工作的主要原因，與其說是經費無着落，還不如說是該局工作方向不能令國會滿意。國家計劃局曾建議製定一個六年社會工作計劃，按照這一計劃，在失業者因經濟危機而增加的情況下，即立刻按照預定目標展開社會工作。這就必須保證國民有工作做。由此可知美國國家物資計劃局並不能消滅生產過剩的危機，不景氣與失業。相反，這個計劃就是估計到危機，不景氣與失業，不過企圖以社會工作，以工人自己的社會保險金來減輕資本主義生產的這些不可避免的現象。然而，就是這樣的計劃，美國國會也以爲是過分的，爲了滿足資本主義的貪婪鬼，因而拒絕撥付該計劃局的經費，於是在一九四三年，該計劃局便壽終正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政府爲了遂行美國壟斷資本統治者的意志，便停止了一切計劃生產

與流通的企圖。代計劃而起的，則是美國總統開始勸告壟斷資本家們，降低一下過高的，爲人民所無力購買，並且仍在不斷上漲的物價。但當這種勸告的虛偽性被揭穿的時候，這種煽動民心的說教也就終止了，於是美國統治者便開始要求人民縮小需要，勒緊腰帶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國外許多國家內，背棄壟斷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傾向加強了。在美國全部軍事定貨總值的四分之三是集中在幾百個資本家集團手中。這些定貨，因有美國政府保障其市場，而暫時地控制了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但到戰後，政府的軍事定貨與對戰時生產所進行的國家資本主義「調節」結束了。資本主義企業與康采恩的定貨，便又開始受盲目的平均利潤法則，盲目的供求法則與經濟危機規律的支配了。

雖然有很多戰後發展計劃，但資本主義的美、英二國人民，却抱着很大的懷疑視着自己戰後的未來。在這些國家內，關於戰後經濟危機，不景氣和失業增加的談論與憂慮是不少的。戰後美國工業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要縮減工業生產的總水平，因爲在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純粹軍工生產估計每年爲六百億美元。這一縮減可能要剝奪一千多萬美國工人的工作，若美國工業不能保證將軍火生產改造爲民用生產，而且不能爲這些產品找到新的市場的話。

一九三八年在美國會發生週期性經濟危機的一年，因而該年生產較經濟危機前一九三七年減低了百分之三十一，而一九三九年則減低了百分之四。與此降低了的一九三九年的生產水平相較，一九四三年美國生產指數會增至百分之二百一十九。但在一九四五年又降至百分之一百八十六，到一九四六年已經降至百分之一百五十六，並且在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結果的資本主義佔有方式間衝突日益增長的情況下，美國生產仍在繼續降低。

在英國，白維里支（被推崇爲「消滅貧困」方策的製定者）計劃是極享盛名的。這一計劃所根據

的原則，如白維里支在其『消滅貧困』一文中所說，就是『誰繳納費用，誰就有權得到補助金，而不是直接由國庫支付補助金』。這就是說，在職的工人與職員，要以每週或經過幾週繳納一次保險費的方法，繳納出一定的費用。從這些費用中可以給失業或失掉勞動能力的職工以保險費，給解僱職工以補助金，支付職工的醫藥費，葬殮費。

因此，白維里支底『社會保險』計劃，是依靠在職職工於自己被剝奪工作，變成失業者或因失掉勞動能力或因疾病而失掉工作之前，延期使用其工資。就是說，職工們以緊縮其目前的消費，而為自己準備下在失業，生病或年老時的最低限度的生存物資。這是英國工人一生窮困之特殊分期法。實際上，白維里支計劃是指望縮減職工就業期間的最低生活費，以維持他們失業期間的半飢不飽的生活。

白維里支『社會保險』計劃的出發點是，根據他對英國許多大城市社會條件的親身觀察，認為英國的貧困，通常是由於工作中斷，即失業所引起。這個計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規定與維持英國職工在失業期間的最低生活費。由此可知，這個『消滅』貧困的計劃的出發點，乃是在於保有與維持英國工人階級中廣大階層失業者，而不是尋找消滅英國社會貧困的主要基礎——經濟危機，消滅貧困與失業的方法。

白維里支先生的『消滅貧困』計劃是很難引起蘇聯工人階級與全體勞動人民的什麼興趣的，因為它是建築在維持生產手段私有制的基础上的。蘇聯工人階級與一切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保證，是建立在消滅人民『貧困』的根源——剝削階級與生產手段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它是建築在消滅工業危機及其產生的原因，消滅城市失業與鄉村人民貧窮的基础上的。它是建築在蘇聯人民的物資生產與文化之普遍繁榮的基础上的。最後，它是建築在國家對人民的醫藥保障，國家對多子女的母親給予補助金，及國家對年老或暫時失掉勞動能力的勞動人民給以各種救濟的基础上的。

在戰後恢復與繼續加強國民經濟之發展的基礎上，蘇聯人民恢復了被偉大的衛國戰爭所中斷了的建設運動，恢復了循着完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建設，並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的運動。

蘇聯現正沿着提高生產力與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勇敢前進，不怕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在恢復蘇聯國民經濟並達到戰前生產水平後，我們將走向更高的發展階段，實現蘇聯總的經濟任務——在經濟方面亦即按人口計算生產水平上趕上並超過各大資本主義國家，其中包括美國。

蘇聯人民不願帝國主義國家的新的戰爭煽動，正充滿信心地解決着自己的歷史任務。反對德、日戰爭中的同盟國（一方面為蘇聯，另一方面為美、英）間，對戰爭與戰後和平建設目的之矛盾，於戰後時期已變成兩個不同的政治路綫之公開鬭爭。

蘇聯正在與其他民主國家結成聯盟執行着反帝國主義的民主的政策，這一政策的目的是在於摧毀帝國主義，鞏固與發展民主秩序，肅清法西斯殘餘。帝國主義美國則與其衛星國結成聯盟執行反民主的帝國主義政策，這一政策的目的是在於爭取美帝國主義底世界霸權，與破壞全世界的民主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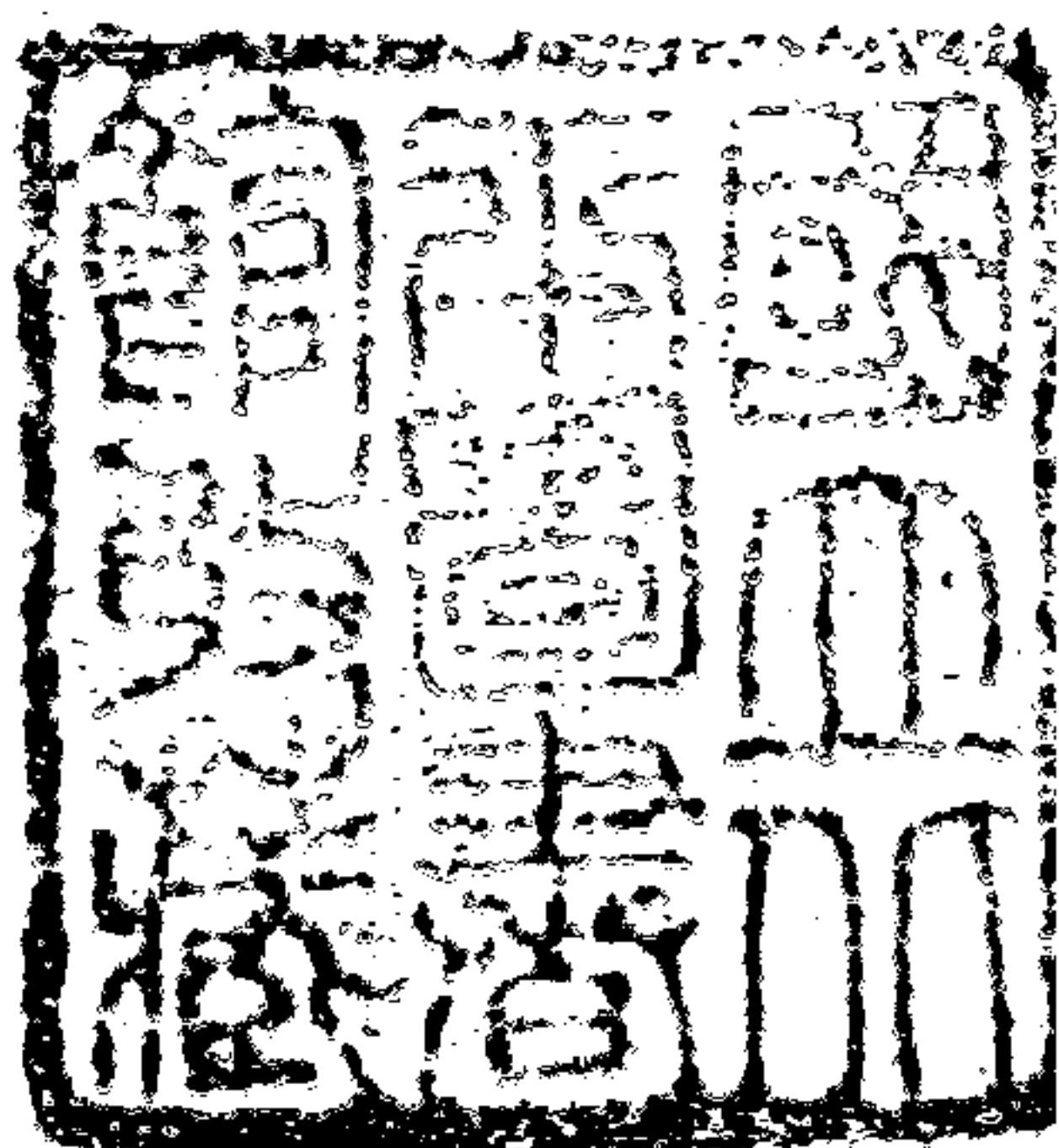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吸取人民的血液而自肥了的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現在是反民主的帝國主義陣營的首腦，是全世界帝國主義擴張的魁首。美帝國主義實行擴張的目的，在於發動新戰爭，並以此作為其爭取世界霸權的手段，作為其窒息民主，防止經濟危機與反對本國工人階級的手段。

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正在進行鬭爭，反對帝國主義擴張與新的戰爭威脅。能否破壞侵略者與戰爭煽動者之計劃，取決於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的力量與團結。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資本主義失掉了它在俄國的統治權，在蘇聯出現了並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來到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東歐諸國實行民主改革的結果，出現

了許多新的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國家。世界資本主義又在許多民主國家內失掉了它的統治權。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力量增長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也更加尖銳化了。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不能不考慮到國際環境的戰後變化。在與資本主義國家並存下發展着的，蘇聯社會主義再生產底特點，要求蘇維埃國家一定要在生產中保持必需的軍工生產之動力水平，與鞏固自己的軍事經濟力量。當還存在着資本主義的包圍時，就需要準備以防萬一。祇要帝國主義存在，進攻蘇聯的危險與產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也就存在。這種危險，只有擁有強大生產力的武裝的人民才能予以防止。

由此可知，戰後發展蘇聯經濟的任務，就是於最短期間內恢復蘇聯各解放區被德佔領者破壞的經濟，並在全國範圍內超過戰前生產水平。於解決恢復和更進一步加強蘇聯國民經濟之發展的任務時，我們就正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與實現總的經濟任務——在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各大資本主義國家——中大步向前邁進。



戰時蘇聯經濟 1948.11.初版

著者 沃茲涅辛斯基

譯者 施 賓

出版者 東北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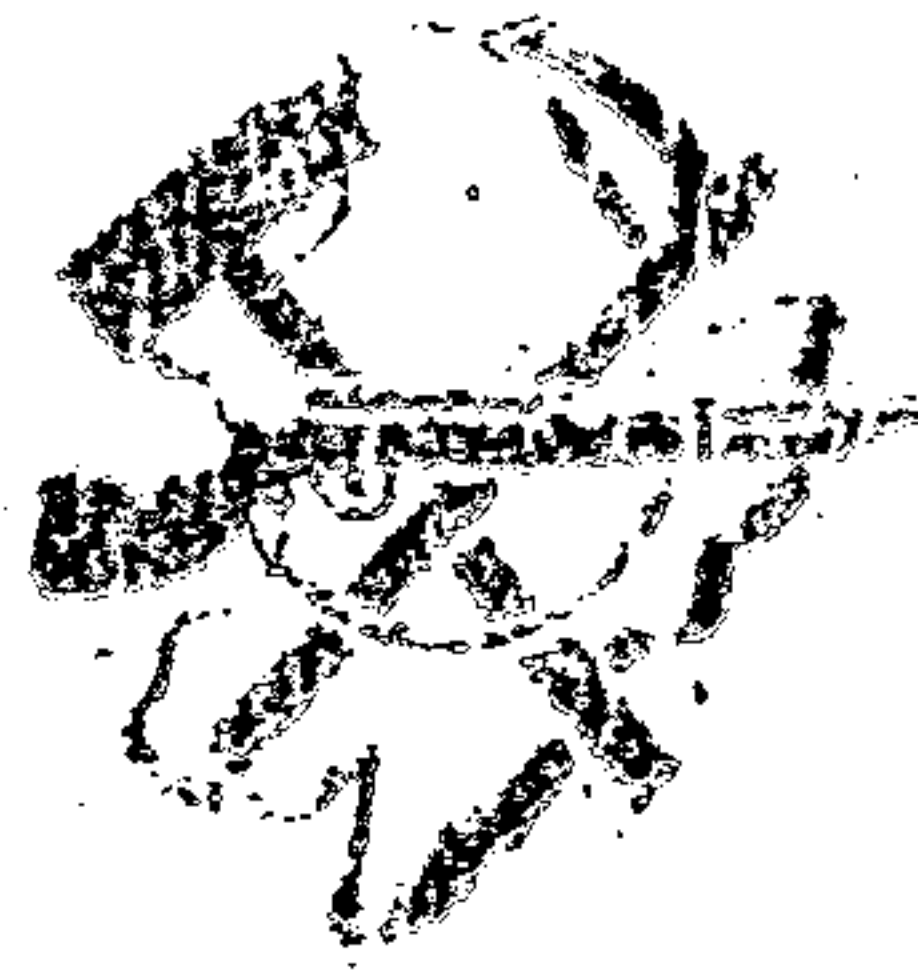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

總店 哈爾濱道里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赤鱗 梅河口 通化

佳木斯 安東 鄭家屯 北安 白城子 熱東

佳. 1—5000.



48
3

時蘇聯經濟

1948. 11. 初版 佳. 5000.

定價：300元